

第八章 参加新中国建设

一、开国大典

中共中央最先设想在东北举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体地址在哈尔滨。因为东北最先解放，那里是稳固的共产党解放区。随着战争形势快速发展，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守军很快被歼灭，所以中共中央重新规划，最终把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确定在北平。

1949年6月22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时阐明：“新政协为长期组织，也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¹周恩来的这番讲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说明未来的新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由各党派组成，将长期存在。全国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各党派的协议机关。这一政治安排，延续至今。

1949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中共党组会上，进一步说明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同时指出：革

441

1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周恩来年谱》。

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与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怎样搞好合作？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决“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¹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时说：“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²

黄琪翔相信：共产党是人民支持的政党，它将带领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1949年9月21日下午六时，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参加这一会议的代表人数为662人，黄琪翔作为特邀代表参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走上主席台，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提出了政协会议的任务。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一共召开了八天，即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

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人员，当时被称为代表，而非我们后来习惯称之为委员。黄琪翔所在的政协小组共有9人，另外的8人是李明灏、张元济、张难先、李书城、胡子昂、宁武、张醅村和周怀孝，他们全都住在六国饭店。

在即将举行开幕式的当天上午9时，该小组会议在黄琪翔的

1 《周恩来年谱》。

2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p1467。

133号房间内举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相识。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怀孝言与余向不参加任何党派，亦不问外事，此次系特别情形，应于发言时为之说明。张（难先）、胡（子昂）、李（明灏）、宁（武）、张（醅村）自称昔年曾入同盟会。黄（琪翔）似未声明。李明灏则言本为老国民党，近决脱离云。”¹黄琪翔与张难先有过交往。早在1927年10月，黄琪翔率领第四军返回广州时，张难先就去欢迎他们。当时张难先是广东省的省委委员兼省土地厅厅长。

黄琪翔所在的政协小组9名委员，相处得很融洽。年龄最长者是张元济，此年已经82岁，最小的则是黄琪翔，才51岁，所以一旦大家有事要商量，均到黄琪翔的133号房间来碰头。

黄琪翔在大会进行到第六天，即9月26日²，他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黄琪翔说：“首先要声明的：我是站在个人立场说话。这次人民政协所提出的三大建国方案，虽然是到现在才完成它的法律手续，可是，它的雏形早就在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以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告中可以看见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三大文件，完全反映出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成果。他们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感谢的。二十多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也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樣的错综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深相信：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的走上了光明伟大的前程了。”他接着说：

“也许有人怀疑：方案虽然是好，谁能保证它不会变成空头支票呢？我的答复是：不要人民支持的政权，是可以随便开空头支票的，但结果必定被人民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共产党是靠人民支持长大起来的党，它所领导的

1 商务印书局2009年7月版《张元济全集》第七卷日记。p389。

2 参见1949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册》之“每日程序”，p34。



1949年9月26日，黄琪翔在第一届全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人民政权，直接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支票是不可能不兑现的。”¹

黄琪翔在发言中，重点谈到国际形势，谈到了新中国在美、苏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他说：“更有人说：‘对外关系为什么要一边倒呢？我们站在苏美中间，利用它们，调解它们，做一座桥梁不很好吗？’各位代表先生，我也曾经这样想过。我前年到欧洲去，就是想实际观察战后苏美两大强国的政策，到底有无协调的可能，欧洲各国的实情又是怎么样？我希望从欧洲问题上去了解世界问题，同时也就帮助了我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到柏林后，我看得很清楚，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向战后的欧洲横冲直撞，但是它给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挡住了。虽然盛气凌人的美帝内心焦虑，以致老羞成怒，叫嚣战争，但它没有把苏联吓倒。苏联坚定地把握住和平政策，不侵犯，也不退让。西欧各国战后贫

1 1949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册》，p311至p312。

困不堪，希望美帝的救济，是迫切的。但是美帝的所谓马歇尔救济计划，实际上等于一面输血，一面抽血。除了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外，大多数西欧国家人民是洞烛美帝的奸谋而力加反对的。对于德国问题，美帝国主义者是丝毫没有解决的诚意的。它的大欲，是想把西德变成经济和军事的堡垒，以便进攻苏联。现在我明白了：只要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是不会和苏联及任何其他人民国家合作的。这样，我们还能调解他们吗？再拿它对中国的政策来说吧，为什么它一定要援助国民党反对派呢？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根本上和帝国主义利益尤其是和美帝国主义利益不相容。我们还能利用它吗？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者的财富是从内外外剥削得来的，如果说，它愿意帮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那便是等于它自动放弃侵略和剥削的对象，它们会那样愚蠢吗？今天美帝和苏联，一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决不能对它们作等量齐观之想，我们要反对敌人的一边，就应该倒在朋友的一边，这是很合理的，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他还说：“美帝鼓励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政策，我们也不怕它。一百年前帝国主义者就曾经用大炮打破我们的国门，夺取市场，要求通商，来达成它侵略和剥削的目的。现在，眼看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不能继续剥削下去了，便要求封锁我们，这种无耻而又矛盾的行为，充分表现出帝国主义政策的破产，受害的将不是我们而是美帝国主义自己。让它们封锁吧，我们惯于刻苦的中国人民，正好利用这机会自己创造起来，建设起来。”

他还说：“各位代表，去年此时，我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驻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济南解放以后，蒋介石的所谓‘必胜信念’是动摇了，于是他调我回国，希望我提供情报，证实他的幻想——就是说，第三次大战即将爆发。我的报告是使他失望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说不尽的百孔千疮，你疑我诈；而苏联所领导的和平堡垒，又是那样的坚强稳固，无懈可击；加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劳动人民都一致的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第三次大战是不会到来的。”

“最后，我请求各位代表注意，一九四九年的九月，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有两件大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苏联公开宣布有了原子武器又是一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都是直接和今后世界命运攸关的。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郑重的宣告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和苏联永远站在一起。我们要反对战争，我们也有力量反对战争。我们要保卫和平，我们也有力量保卫和平。”

黄琪翔的这个讲话，距今已近 70 年，世界万事，白驹过隙，可是他表达的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依旧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他于 1949 年冒着牺牲的风险投奔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是因为他“深深相信”：“共产党是靠人民支持长大起来的党，它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直接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支票是不可能不兑现的。”这是他在政治圈里摸索二十多年来所看到的真正希望，这就是他对新中国的期望！

9 月 28 日是休会日，眼见会议快要结束，黄琪翔小组的代表们相互间产生了感情，于是大家提议去王府井大街的同生照相店摄影留念。团体照一张，个人照一张。黄琪翔又对张元济提出，他们俩是该小组的一老一少，应该另外再单独合影照一张，以资留念。

在同生照相店里，他们又遇到了慈善家赵朴初和巨赞法师，也来拍合影照。赵朴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巨赞法师系大和尚，是唯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僧人。

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这就是黄琪翔所赞美的“三大建国方案”。

在这个大会上，代表们还一致通过了四个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京。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当年为 1949 年；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确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会议选举出 63 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人员构成上，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以及政务委员，党外人士都占半数或半数以上；政府委员党外人士约占 48.3%；部委级单位正职党外人士则占 44.1%。具体情况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 6 人中，党外人士 3 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其余委员 56 人，党外人士有何香凝等 27 人；政务院 4 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为郭沫若与黄炎培；15 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谭平山等 9 人；在政务院所辖 34 个部、委、院、署、行中，有 15 个正职由党外人士担任。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誉。”¹

10 月 1 日下午 3 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将正式举行。

下午 2 点 55 分，毛泽东与中共开国元勋以及民主党派领袖们沿着天安门西侧的台阶拾阶而上。这里的台阶共有 100 阶。董必武、吴玉章、李济深等上了岁数的老人们，则由警卫人员抬了上来。

毛泽东刚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军乐队高奏起《东方红》乐曲。广场刹那间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后，毛泽东按动了电钮开关，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

1 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中国共产党 90 年史话》2015 年 5 月第一版，p206。

与此同时，54 门礼炮齐放 28 响。¹

下午 4 点，阅兵式正式开始……

这一天，黄琪翔登上了天安门。

这一年，黄琪翔 51 岁，人生半百。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黄琪翔感同身受。这“天命”是什么？就是他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就意味着天下人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这天晚上，黄琪翔将军给远在香港的妻子郭秀仪发去了一封电报：“秀仪，变卖所有财产，不留一根草！速来京。琪翔。”² 京，当然是指北京。1928 年北伐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把北京改名为北平。如今，共产党又还原了北京的旧名。

当时，黄琪翔的次子黄正明、三子黄向明正在英国留学，也被黄琪翔召回国内读书。

10 月 18 日，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就要返程了。会议招待处发给每位代表零用钱一万六千元。张元济在原单据上注明“不敢领受。”然后，老先生拿着一幅自己已经写好的屏幅书法作品，赠予黄琪翔，与之殷殷道别。³

其实，会议招待处发给每位代表的零用钱一万六千元，是旧币，实在微不足道，以张元济从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票款计，每人每张是“十二万弱”。由此可见，前辈学者为人做事讲原则，一分一厘都不肯突破自己的处世底线。

1 54 门礼炮，代表了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45 个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的 9 个小组。28 响礼炮，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28 年的革命历史历程。

2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4。

3 商务印书局 2009 年 7 月版《张元济全集》第七卷日记。P407。

二、北京的初春

郭秀仪在香港接到丈夫电报之后，立即行动起来。搬家，把自己的家搬到北京去！人们对新生活的期望，总是充满了激情。

在香港太子道，黄琪翔家有一座花园洋房。黄琪翔此前已经脱离国民党政府，没有了收入，再加上花园洋房面积很大，善于持家的郭秀仪就把多余的房间出租给因内战而逃去香港的大陆客，再拿租金的收入，补贴家用。

搬家很繁琐，确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但最难的是变卖房产。这些事，均由郭秀仪一人包办。当时，一些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仍滞留在香港，没有收入，黄琪翔不仅支持他们的反蒋活动，还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郭秀仪回忆说：“卖掉了位于香港太子道的花园洋房，共得款 12 万元港币，（其中）资助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生活费 3 万元，支付房客搬迁费 3 万元，律师费 5 千元。”剩下的钱，全部拿来北京。¹

449

郭秀仪赶到北京时，已是 1950 年初春。冬天的寒意还没有散尽，古老的北京城里，那些成行的柳树儿，已经悄然吐露出鹅黄色的嫩芽儿。

家人来到北京后，黄琪翔搬出了招待所，与家人团聚。他们

1 《流金岁月》P23。



五十年代初，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合影于北京。

在北京的第一个家，就在北京东城乃兹府胡同。¹ 这条胡同，也叫乃兹府大街，黄琪翔家的门牌号码是 16 号。这是一处租赁来的房子，房主人姓梁。之所以来此安家，是罗隆基先生推荐的。罗隆基（1896—1965）是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批政务院委员、首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之所以推荐乃兹府大街 16 号，是因为罗隆基的家就在它对门。

乃兹府胡同的历史大有来头，在明代名气很大，本叫作“礼仪房”。明代皇室孩子的乳母们一律住在这里，所以被百姓俗称为“奶子府”。这个“奶子府”地名一直叫了几百年，可到了民国就出了问题。当时民国政府为了给路人指路，需在胡同口设立木牌楼，上书地名，而“奶子府”三个字实在太不雅观，于是经贝勒爷载润（1887—1963）的提议，采用谐音字取而代之，“乃兹府”就这样沿袭下来。

黄琪翔家对面是 12 号，那是罗隆基的家。不远处就是名作

1 乃兹府胡同的位置，是今天北京著名商业区王府井大街北面的路西，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因地处灯市口西侧，现在的名称叫灯市口西街。



1989年7月，老舍夫人胡絮青给郭秀仪去信，信内就附有这张照片。胡絮青在信中说：“今遣家人送上为美籍友人画一幅，翻印你们伉俪照片一帧，请收下。”胡絮青还特意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1938年，在武汉，老舍与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碰杯所照，得自郭老家所存照片。胡絮青题记于己巳年。”胡絮青所说的郭老家，即郭沫若家。

家老舍的家。1938年黄琪翔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时候，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以政治部的名义，经常邀集文化界知名人士举行抗战文艺活动，老舍当时在武汉，所以他们时常能够见面，因此熟悉。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黄琪翔夫妇和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军政要员均应邀出席酒会。老舍是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还兼任总务部主任。在这次酒会上，老舍端着酒杯前来敬酒，这一场景被记者拍了下来，照片为郭沫若收藏。

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的老舍家，是1949年老舍夫妇花500美金买下的。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北京当时有两个丰盛胡同，其一于西城白塔寺附近，其二则是东城乃兹府的丰盛胡同。为区别这两个丰盛胡同，当地政府把乃兹府的丰盛胡同改名为丰富胡同。老舍故居的门牌号现为丰富胡同19号。

黄琪翔家位于乃兹府大街16号，是一个老式四合院，中间有座雅致的假山，用太湖石营造。正房是黄琪翔夫妇的卧室，左右厢房的一边，住着黄琪翔儿子黄龙（黄向明），另一边则住着黄琪翔的母亲刘桂五和女儿莉莉（黄莺）。儿子黄龙的卧室之外，还有一间书房。

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新中国诞生，黄琪翔的政治新生活由此开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地经历了黑暗的百年岁月，国家终于迎来一个安定的环境。新中国的呱呱坠地，使所有人见证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看到了国家的新希望。人们都在翘首期盼新中国能够立即转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新征途。黄琪翔为此欢欣鼓舞。他告别了旧时代，觉得自己仿佛获得新生，将以全新的面貌走进这个崭新的新天地。

1949年11月12日，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农工民主党同中共合作得很好。一个革命的党不必害怕自己（被）消灭，但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它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¹ 黄琪翔当时是中央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还没有回到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黄琪翔回忆说：“我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不代表任何党派而以特邀身分（份）参加的。会议闭幕以后，我没有打算参加政府方面工作。（共产）党把我安排为中央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照例每周出席会议，通过些法令条条，我自己对此没有什么智（知）识和研究，提不出什么意见，觉得很苦闷。”²

1949年12月2日，中央政府任命五大行政区、十个省（自治区）和五个重要大城市的政府委员，由他们分别组成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其中，五大行政区的主席是：东北政府主席高岗；华东军政

1 《周恩来年谱》。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贾拓夫、陈锡联分别被任命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重庆市市长。¹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毛泽东一生共两次到访苏联，此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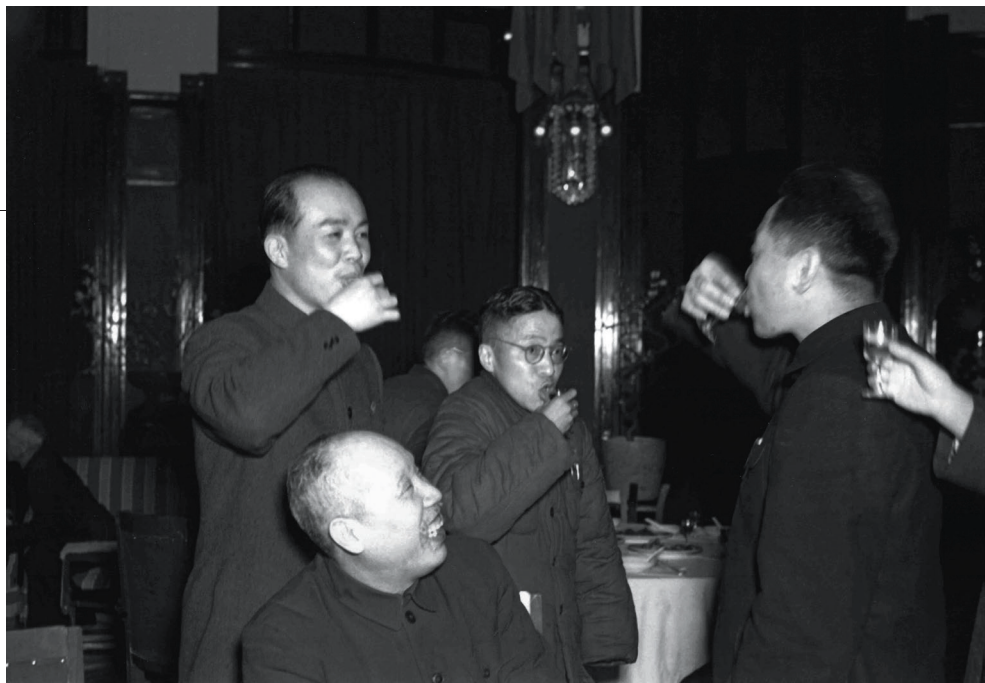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这次访苏之行，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为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月14日，苏联政府以优惠条件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百分之一）。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北京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黄琪翔应邀出席，和董必武等同坐一桌。周恩来端着酒杯走过来，与大家打招呼，然后和黄琪翔等人一饮而尽。这一情景，被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拍了下来。

在此前一天，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指出：这次新签订的中苏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固定下来，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实行密切的合作”。对照黄琪翔在一届政协的大会发言，可知黄琪翔对于中共制定的这一国策是有预见的，而且表示衷心拥护和欢迎。

不久后，黄琪翔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那时，他夫人郭秀仪和家眷已经来到北京。中南军政委员会

1 所谓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军政委员会，是指比该区所辖的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1952年11月，中央撤销了五大行政区和军政委员会，统一设立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六个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



1950年3月11日，毛主席、周总理（右一）访苏归来，在欢迎宴会上黄琪翔（左一）与周总理干杯。前者为董必武。

的驻地在湖北武汉。

黄琪翔前往武汉履新之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北京设宴招待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为他们饯行。¹这显然是一次私人性质的家宴。权威的《周恩来年谱》中没有记载。1938年周恩来、黄琪翔同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期间，两家人曾经是珞珈山的近邻，来往密切，经常相聚。但自此之后，他们虽有多次机会见面，却从来没有能够如此安静地单独坐一会，尤其是两家人、两对夫妻的独自相处。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时间。黄琪翔本人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而周恩来则给予满腔热忱的鼓励。

纵观黄琪翔将军的一生，对他命运影响最大者有四位历史人物。其一是张发奎。从1922年至1927年，黄琪翔在大革命时代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黄琪翔传》p154。

追随张发奎，从团附一直做到“铁军”第四军的军长，成为名扬四海的北伐战争功勋；其二是邓演达。黄琪翔追随邓演达，参与组织了与蒋介石的殊死斗争；其三是陈诚。1937年黄琪翔应陈诚之邀返国，几度作为陈诚的副手，在抗日战争中从中将晋升为上将，成为名闻中外的抗日名将；其四是周恩来。1949年以后，加入新中国阵营后的黄琪翔，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保护，即自此开始。

1950年黄琪翔前往武汉上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后不久，位于北京的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领导班子发生调整，嗣后，黄琪翔的组织关系重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兼任党派的领导工作。

黄琪翔的这次组织关系变动，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有直接联系。1950年11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统战部招待会上对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代表的讲话，强调要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对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巩固与发展问题提出建议。周恩来说：“我们需要朋友，而且朋友愈多愈好。根据局势和工作的需要，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要把巩固与发展结合起来。照现在的情况看，各党派的基础还不够宽广，这是因为过去受了蒋介石统治的压迫。建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需要有一个发展。”还说：“我们诚恳希望各民主党派向这个方向努力。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因此在发展中应经常提高警惕，对于异己分子和坏分子必须严防其混入。”¹周总理这次与民主党派领导人谈话的地点在北京饭店。

黄琪翔在自己的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周总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约请各民主人士谈话，讨论民主党派工作有关问题，我亦被邀参加。周总理在讲话中，建议原与各党派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归队，以便于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从此以后，

1 《周恩来年谱》。

我便回到农工民主党来了。”¹

黄琪翔还说：“1950年，农工民主党进行整理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以章伯钧为主任，我为付（副）主任，但实际工作，则由季方与郭则沉负责，我因为情势不熟悉，基本上对工作没有过问。同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我被派为委员，前往武汉参加成立会议。会议并任我为司法部长。在此以后，我又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中央的秘书长。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从此往来于北京和武汉之间。”²

此刻，海外媒体一直在追踪着黄琪翔的身影，关注着他的动向。有关他的消息，海外媒体的报道五花八门，但大都是谣言和污蔑。

1950年4月，叶剑英受中央委派出任广东省省长。由于在大革命时期，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时，叶剑英是第四军的参谋长，于是海外媒体从叶剑英的行踪上联想到了黄琪翔。

1950年8月8日，《大华报》别有用心地刊登了《黄琪翔未完成使命》报道，云：“黄琪翔轻佻而盲动，身跨三党（第三党、国民党、共产党），论者称为国民党之左派，共产党之右派，第三党之中坚……今黄（琪翔）居北平，一事无成，其乱臣贼子之使命，真个未有完成也……最近黄琪翔奔走甚力，亟谋有所建树于广东。”

有何建树呢？9月9日，台湾《呼声报》率先刊登《黄琪翔真的返港》文章，说：“年前在香港随民革人物北上靠拢的黄琪翔，稍留意过去军坛事迹的，相信都会想起这样一个人。他生得仪表不凡，谈吐也很温文，有‘靚仔将军’之称。他虚负了天生仪表，空负了肚内才华，竟弃明投暗作了闯王的走狗。”

11月7日，台湾《呼声报》报道：“官方透露：中共于公开参加援助北韩，对联合国军作战行动后并拟计划在某埠举行暴动，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策动学生工人罢课罢工，威胁当地政府。是项计划，乃叶剑英主持之‘广东省人民政府’之秘密会议所贡献于毛泽东、周恩来所决定者。由前国民党政府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现任中共之‘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黄琪翔所领导，将与广州共军向新界进军，同时发生。一旦实行暴动之际，则将试图释监犯，予以武器，从事地下工作，攻占政府各建筑物。此种惊人消息，台湾政府所办之《新生报》，已略有记载，当不致没有根据的。”报道中说的“某埠”，很明显就是指与广东比邻的香港。随后，世界上有名的大通讯社美联社也发布了这条假新闻。

在这条假新闻的推波助澜下，被指为“实行暴动”的领导者黄琪翔，再次成为海外的新闻人物。这件事被证实是台湾策动的所谓“新闻战”。

谣言毕竟是谣言，只要稍待时日，谣言必定不攻自破。12月8日，香港《远东新闻》开始辟谣，说：“最近台湾《新生报》放出一个谣言，说中共在香港举行暴动，这暴动计划由黄琪翔领导。传播这谣言的是美联社。”事实上，黄琪翔在1950年根本没有去过广州，更没有到访香港。

三、重返农工党中央

进入新中国以后，黄琪翔内心的确渴望融入这个时代，不仅从自己的行为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是学习。学习是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灵魂深处的窗户。所以，黄琪翔在新形势下，“立意从头学起，读了不少经典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述，做了许多读书笔记。”¹

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回忆说：“解放初，一直到1957年春以前，我一年中总有几次到他家去闲聊，我看他书桌上放着的《学习》杂志，重要文章中的主要句子都画下红杠，足见他很是用心学习的。我自愧不如。”黄药眠还说：“有一次，为了抚育后一代的事情，他曾写信对我说：他将负责把孩子抚养成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忠于社会主义的公民……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

从1950年起，黄琪翔身兼多职，经常来往于北京和武汉之间。除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位于武汉的中南司法部的工作之外，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会的工作也须就近指导。后来，经农工民主党中央决定，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改组成立

1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黄琪翔、郭秀仪在武汉合影。

武汉市委员会，黄琪翔兼任主任委员。¹ 不过，他的工作侧重于北京，所以大多数时间仍然身在北京，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在武汉办公。

1951 年间，武汉发生了一起震动中南海的大案。这个案件就是著名的“纪凯夫案件”。其实，说它是大案有点勉强，因为纪

¹ 见《黄琪翔传》，p154。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改组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员会，时在 1953 年。

凯夫不过是武汉市一家医院里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诬告偷窃了人民币 1200 万元。¹ 问题是诬告他的人是中共党员，而且是中共的领导干部！

1951 年 4 月的一天，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职工纪凯夫从食堂吃饭后回办公室的途中，看见走廊过道上散落着一些钞票，急忙回到办公室，发现医院总务科的保险柜被打开，钱被盗了。他和医院的另外一个职工追寻到办公室外面的晾台，看到一个装着钞票的布包挂在电线上，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转业军人、团级干部）在晾台的一边站着。纪凯夫感到王清形迹可疑。

事后证实，王清就是盗贼。他做贼心虚，企图逃脱罪责，便与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宋瑛串通一气，向武汉市公安局诬告纪凯夫政治历史问题和偷窃嫌疑，要求公安局拘留纪凯夫。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医务科科长孙麦龄反对将纪凯夫拘留，向市公安局和中南局反映情况，随即纪凯夫被保释。

宋瑛不同意释放纪凯夫，便直接去找武汉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周季方单独汇报。宋瑛不谈王清的可疑和医院群众反映的情况，只说纪凯夫社会关系复杂，保释后不好控制等等。周季方听信宋瑛片面之词，立即下令将纪凯夫逮捕。后经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半个多月的密查暗访，查遍整个武汉市修配钥匙的锁匠，最后查到一个人，该人证实王清在一个多月前让他配过这样一把钥匙（指医院保险柜的钥匙）。这样，人证、物证证实盗款人是王清，而且“纪凯夫案件”就是王清与市卫生局副局长、医院院长宋瑛合谋制造的假案。

“纪凯夫案件”发生后，正是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时期，毛泽东主席视其为“一个典型事例”。1952 年元旦，毛泽东又打电报正式指示中南局。电报原文如下：“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随后，中南局对武汉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追责，以犯严重官僚主义，

1 旧币，即现在 1200 元。下同

分别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市委书记张平化，给予当面警告处分，降为副书记；
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吴德峰，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
市委第二副书记、纪委书记谢邦治，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
王清、宋瑛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法办。¹

1952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局刑事审判庭判决如下：王清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词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6年。宋瑛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2年。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9个月。彭其光制造伪证，违反政策，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1年。

所谓“三反”“五反”运动，是指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期间，新中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1952年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形成高潮。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纪凯夫案件”的审判属于中南局司法条线上的事，中南局驻地就在武汉，而黄琪翔是中南局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司法部长，还是知名民主人士，因此黄琪翔对“纪凯夫案件”的详情是了解的。他说“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我正在武汉。”²这个案件也就成为黄琪翔在新中国经历的第一场运动。他对共产党政府做事有理有节的政策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都有了深刻的印象，表示完全拥护。为此，黄琪翔在当年的《长江日报》上发表题为《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盗窃案的处理给了我们哪些教训》的文章。武汉

1 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8月版，彭树华著《潘汉年审判前后》，p8。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市立第二医院盗窃案，所指的就是“纪凯夫案件”。这些文章的观点与党中央的精神完全一致。

黄琪翔在武汉亲身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为此，他还撰写了《斥资产阶级的各种谬论》和《贺衡夫大盗窃案的破获告诉了我们些什么》等文章，也都发表在湖北的《长江日报》上。

《长江日报》1949年5月23日创刊，报头由毛泽东题写，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办，也是中南局的机关报。

“贺衡夫大盗窃案”，也是“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个名闻全国的重要案件。贺衡夫（1888—1968）¹时任武汉市工商联主任，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兼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4月，政务院第131次会议通过命令，撤销大盗窃犯贺衡夫在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并逮捕法办。他一夜之间成为了阶下囚。据1952年4月9日《群众日报》登载的政务院命令指出，贺衡夫的罪名是“组织并领导大规模的盗窃集团，进行隐匿大宗敌产；派遣坐探深入政府机关，勾结和贿赂政府工作人员，盗窃经济情报，盗窃大量国家财产；贩卖大宗毒品；盗窃巨额黄金出口；并在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拒不坦白，又阻止该盗窃集团中其他犯罪分子坦白。”

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初期，黄琪翔于1951年参加了中央组织的革命老区慰问团，任副团长，²前往革命老区去慰问那里的人民群众。在湖南湘潭期间，黄琪翔第一次参观了毛泽东主席的故居。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的六位亲人先后牺牲了生命，³使他深受感动。

这一时期，黄琪翔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利用自身的社会

1 贺衡夫原名良铨，汉阳黄陵人。早年在汉口创办衡昌油盐店、衡昌油行。1931年任汉口总商会主席，后历任中华大学校董，重庆庆华颜料公司董事长，国大代表。解放后，贺衡夫任武汉市工商联主任，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兼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

2 《黄琪翔传》，p154。

3 为革命而牺牲的毛主席六位亲人是：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和长子毛岸英。最晚牺牲的是长子毛岸英。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总部秘书。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不幸牺牲，年仅28岁。

影响，撰写文章，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政策。1951年5月7日《长江日报》发表了黄琪翔题为《为贯彻婚姻法而斗争》的文章。1951年11月7日《长江日报》发表黄琪翔《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水平》的文章。1952年3月3日《长江日报》发表黄琪翔《声讨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

到了1952年的春末夏初之交，湖北省开始实施一项举国瞩目的水利大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任命荆江分洪委员会李先念任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任副主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30万军民参加了工程建设，以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包括右岸沙市对面上游15公里处的虎渡河太平口进洪闸、黄山头东麓节制闸和分洪区南线大堤等主体工程。荆江河道安全泄洪能力由此得到显著提高，缓解了与上游巨大而频繁的洪水来量不相适应的矛盾。前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也于1952年3月、5月先后两次到工地勘察，并对工程设计与施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工程完成后，政府组织大规模的验收工作，黄琪翔被任命为验收团的副团长。黄琪翔与验收团的其他成员一起，抱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工程进行全面而认真的检验和验收。事实证明，荆江分洪工程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大工程。¹

尽管中南区公务繁忙，黄琪翔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工作。他说：当时“我的时间在北京为多。我的活动以在上层为多。当时的民主党派工作，转到农工民主党（内），主要是安排人事等工作。农工（民主）党内部经常为着人事问题争吵不休，我从中做些调解工作。郭则沉曾经告诉我，要我在农工（民主）党发生‘甘草’作用，我觉得这也近似。”²郭则沉（1906—1973）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时任中国农工民主

1 2006年5月25日，荆江分洪闸（北闸）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党第五届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建国初期，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在工商界开展统战活动，曾将工商界爱国人士郭增凯及“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引见给周恩来。

黄琪翔认为，作为民主人士，既然大家已经加入到新中国民主统一战线，就应该团结合力，和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不应再搞内耗，窝里斗，所以他处处以团结为重，凝聚力量，即发挥着所谓的“甘草”作用。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内部，黄琪翔大胆任用新人，放手让农工民主党中央副秘书长李伯球（1904—1986）去真抓实干。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且俱身兼多个重要职务，因此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1951年12月后为农工党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的黄琪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不少党务工作，特别是事务性工作。

黄琪翔回忆说：“1953年，李伯球调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付（副）秘书长以后，我对党部内部工作完全依靠着他。对日常工作，几于没有过问。我对李伯球是没有认识的……但总以为他还有一点能力和干劲，党部少不得要有这样一个人，因此遇事多顺从他……我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²

为了工作，黄琪翔逼迫自己改变生活习惯。因为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是叱咤风云的昔日将军，不需要他像在战场上那样果断地指挥战斗，声嘶力竭与人喊话，于是他变成了一位耐心、和善和忍让的人，处处关心他人，与人为善。

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内部，黄琪翔以“人和”著称。“他与人无争，遇事谦让，与同志们相处，心怀坦荡，乐于助人。凡

1 李伯球为著名民主人士，广东梅州人。李伯球与黄琪翔、叶剑英等均是同乡，历史上多有交结。1949年李伯球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应叶剑英省长的电召，由北京返回广州，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农林厅副厅长。1952年调来北京，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工商局局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执行局委员兼副秘书长。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有事找到他的，他总是尽力帮助。很自然，他的家成了议事的场所。农工党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常常聚集在他家里，谈论各种问题。他的夫人郭秀仪是他的贤内助，无论是在艰苦困难中，还是和平环境里，一直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工作。对有困难的同志，同样是慷慨相助。黄琪翔从建党以来，解决和缓和了党内许多矛盾，增进了党的团结。”¹

黄琪翔的所作所为，处处流露出他内心善良的本质，这让人感到他与许多一心想当高官的政客截然不同。黄琪翔“对干部的生活和健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一次，他到办公室，看到有些办公桌比较矮，他就让总务部门的同志找木工将桌腿接高一些，以免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有的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同志，安家有困难，他亲自把卧具、衣物送去。干部生孩子，他同他的夫人前往看望，并送去婴儿需要的东西。逢年过节，他都要到干部的家里，询问有什么困难。同志们患病，不论是住在医院里或是家里，他都要探视，并送去慰问品。在他因工作忙脱不开身时，也要派工作人员代表他去探视。每年在气候宜人的春、秋季节，他们夫妇约请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的全体同志到公园或他们的家，设便宴或自助餐招待，使干部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次轻松的聚会。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敞开心扉，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团结。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无论因工作或个人私事来京，黄琪翔也都在家里招待，了解地方组织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一切活动、招待的费用，都是他自费，从来不从公款中开支。黄琪翔能够亲密无间地和同志们在一起，他受到同志们的衷心的尊敬和爱戴。”²

465

章伯钧与黄琪翔的关系有点特殊，因为黄琪翔是资历极高的老同志，系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尤其是在邓演达牺牲之后，他力挽狂澜成为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曾是章伯钧的领导。眼下

1 《黄琪翔传》p159。

2 《黄琪翔传》p160。

黄琪翔居章伯钧之下，他依然开朗面对，从不摆出老资格的样子，而是真诚待人，无怨无悔地工作。这是他赢得党内“同志们的衷心的尊敬和爱戴”的主要原因。

“黄琪翔和其他兄弟党派的领导人接触也较多。他总想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尽到自己的力量。”¹他们夫妻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例如贺龙、陈毅、习仲勋等经常见面，并约他们到家中聚会，议论国际形势、国家大事和统一战线的工作。²

1950年6月25日，中国近邻朝鲜爆发内战。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子弟兵奋勇杀敌，后方努力捐款捐物，发动群众抓生产。”中国文联捐献一架名为“鲁迅号”的飞机，徐悲鸿画马20幅，所得款项全部捐赠“鲁迅号”。梅兰芳也于6月在汉口举行两场京剧义演，捐出演出的全部所得1亿元（旧币）。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义演170余场，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一架。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0亿元（旧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万余元，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

国家的强盛，全民的富裕，这是人民追求的目标。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竭尽己力向国家捐款捐物，其中包括向国家捐赠两套房产等财物：

其一，1951年，黄琪翔夫妇出售位于南京上海路上的一栋花

1 《黄琪翔传》p158。

2 《黄琪翔传》p158。

园洋房，随后将售房款项捐赠国家，支援抗美援朝。¹原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孟庆厚此时在南京工作。他回忆说：“1951年抗美援朝时，人民捐款捐物。黄老把在南京的花园洋房卖掉，款项捐献给政府。此事是黄老委托给农工民主党南京负责人邓昊明，是我经手办理的。”²；

其二，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之际，黄琪翔夫妇又将位于广西桂林桃花江边甲山脚下的整套别墅捐赠给了国家，包括20多亩土地。这是1938年由著名建筑大师林乐义营建，毗邻李宗仁公馆，人们现在把它编号为5号公馆。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捐赠房产的时候，连同家里收藏的古董一齐捐赠给了国家。其中，郭秀仪平时所喜爱的一对花瓶，有半人高，上面是手工绘制的五彩人物画，据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官窑作品。此时，国家严重匮乏外汇，于是通过文物商店往海外销售中国古董，以换回国家急需的外汇。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是上海文物商店，国家就把各处收集的古董调拨给上海，供文物商店和友谊商店出售。此间，郭秀仪曾去上海，在友谊商店里邂逅自家捐赠的那对康熙五彩人物大花瓶，上面连黄琪翔捐赠的标签编号还没有撕掉。标价是每只花瓶25万元旧币，二只花瓶即50万旧币。而它旁边悬挂出售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大幅《奔马》，标价是20万元旧币。³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同中、朝两国代表签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

1953年10月4日，贺龙率领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黄琪翔以副总团长身份随同前往。这个慰问团共有5448人组成，下辖40个分团。

467

1 据黄琪翔郭秀仪外孙于峰先生介绍：该房产系1948年以郭秀仪的名字购买的。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此材料共23页，由张新荣女士亲笔撰写，现存黄琪翔后人处。作者据原稿摘录。后同。

3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黄琪翔传》，p151。



1953年10月黄琪翔赴朝慰问志愿军。前排（左二）为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右一）为黄琪翔。

10月13日，慰问团总团首先到达平壤，参加了朝鲜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金日成与慰问团贺龙总团长参加宴会。

10月25日是中国志愿军出国参战的纪念日，慰问团总团在贺龙团长率领下，到达志愿军总部。贺龙与其他副团长一起，检阅了志愿军的仪仗队，并接受志愿军文工团同志的献花，同时接受手举鲜花的志愿军干部战士的夹道欢迎。

12月18日，赴朝慰问团圆满完成任务，黄琪翔随团回到北京。

第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公布。这个《决定》是在1954年6月19日中央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指出：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撤销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行政区。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便结束了它

们的历史使命。

中南局撤销之后，黄琪翔告别武汉，回到了北京。

1954年9月，黄琪翔当选广东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于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广东省代表一共有46名，包括叶剑英、蔡廷锴、蒋光鼐、周扬、廖仲恺之女廖梦醒、谭平山、曾生、雷洁琼、陈其尤、李伯球等知名人物外，还有教育家陈垣、红色版画家古元、文艺理论家黄药眠、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蔡楚生、舞蹈家戴爱莲、著名报人徐铸成等。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政务院即在此时改称国务院。

大会决定，国家不设立中央军委，而是设立国防委员会。根据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是咨询和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会议选出的第一届国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委员共102人，主要是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在这次会议上，作为著名爱国将领黄琪翔也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国防委员会的任期是1954年至1959年。

同时，黄琪翔还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4年11月，黄琪翔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与黄琪翔一起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民主人士，还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蔡廷锴（1892—1968）和卢汉先生（1895—1974）。主任是贺龙。贺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不仅兼任国家体委主任，还兼任着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1954年10月18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出席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们合影，第三排（右四）为黄琪翔。

黄琪翔心情愉悦。他对祖国的发展信心满怀。他说：“在报纸上接触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则十分欣赏，认为十分正确，认为按照这个方针做下去，中国便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富裕繁荣的国家了。假如说，我当时对共产党有信仰、有信心，也就止于这点。我这种思想，直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自从建国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通过恢复经济阶段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各方面事业都大有进步，国际地位亦大大提高。我感觉到十分满足。”¹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响应中共的号召，回到北京定居。卫立煌在同年9月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发表了“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卫立煌说：此时“许多旧友如李济深、张治中、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翁文灏、何香凝、傅作义、龙云、黄琪翔等都纷纷来访，并邀我等游宴。”

1955 年的年中，国家推行等级工资制，黄琪翔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被评定为行政五级，属于副部级中最高级别。

这种等级工资制的改革背景，源自于 1955 年全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国家于是决定实行新一轮的工资改革方案。1955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全部工资制和改行工资制的命令。其中，党政机关实行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 30 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 8 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例如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教师、医务工作者等也建立相应的等级系列。

党政机关实行的 30 个行政级中，“当时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是行政一级，她的工资是 579.5 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行政二级，工资都是 404.8 元。”“各级别都有相应的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大约是 21:1。”¹

在部级领导干部中，黄琪翔被评定为行政五级，属于不高不低，介乎正部与副部之间的交叉点上。正部级别是由三级到五级，而副部则为五级到八级。以著名人士论，茅盾当时是文化部长，他的级别是四级，比黄琪翔高一级；而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是六级，又比黄琪翔低一级。套用上将、大军区、省、部级别的工资是 400 元，而每一级别工资之差最大是 50 元，最小是 5 元，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黄琪翔当时的工资水平应该接近于 400 元。

1 《中国那些年（1949—1978）》团结出版社 2014 年第一版，p126。

四、黄琪翔夫妇与齐白石的交往

黄琪翔投奔新中国怀抱之后，他的夫人郭秀仪来到北京，再没有参加工作，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期间，郭秀仪曾向齐白石拜师学画，被赞誉为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最喜爱的入室弟子。

1950年春，黄琪翔和老舍家成为乃兹府大街的邻居。本是旧友如今又是近邻，两家的交往自然频繁起来。黄琪翔当时在中南区任职，要隔三差五往武汉跑，但他们夫人之间几乎天天都要过往，闲聊家长里短。黄琪翔家、老舍家和罗隆基家，都是在1950年初先后搬入乃兹府大街的。

老舍夫人胡絮青（1905—2001）是个文人，知书达理，性格比较内向，属于传统知识女性。而郭秀仪热情奔放，性格开朗，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属于新时代的女性。她俩在性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好构成互补。闲暇时，郭秀仪经常去老舍家做客。胡絮青当年45岁，郭秀仪39岁。

老舍家是一座北京常见的四合院，一进门是一个玲珑小院。小院里种植了两棵柿子树，每到金秋时节，橘红色的柿子挂满枝头，漂亮极了。胡絮青为这个小院取名“丹柿小院”。西向是一座三合院，东西各有三间厢房。北房三间，左右又各有一间耳房。明间和西边的次间为客厅，在这不大的客厅里，周恩来总理曾三

次到访，就坐在靠西边的沙发上，与老舍倾心交谈。西耳房是老舍的书房兼办公室。老舍的书房不大，却十分素雅。从1950年至1966年的十六年时间里，老舍在这里写下许多名篇，如人艺的保留节目《龙须沟》、《茶馆》。还写下大量小说、戏曲、杂文、诗歌和散文等作品。

老舍出门之后，胡絮青有时也会使用老舍的书房，在那里画画。胡絮青自幼嗜好绘画，曾受著名画家汪采白（1887—1940）、杨仲子（1885—1962）、孙诵昭（1878—1968）诸先生的教益，于1938年结识了北平大画家齐白石，倾心于齐氏艺术。只是直到1950年以前，她仍然没有拜师齐白石。¹

郭秀仪第一次看见齐白石的画，就是在老舍家里。老舍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收藏的书画挂在书房和客厅里，每隔一段时间再换一遍，然后利用闲暇时间细细品味，算是放松大脑的一种休息方式。郭秀仪去老舍家串门的时候，看过齐白石作品，非常喜欢。²此时，新中国政府对齐白石礼敬有加，使之成为中国画坛上的不二大师，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其艺术影响如日中天。

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院长徐悲鸿特聘齐白石为名誉教授。

能够收藏到齐白石老人的作品，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在建国初期，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朋友圈主要是民主人士，而这些人也大多是齐白石艺术的拥趸，收藏了齐白石许多重要作品。这些人中包括章伯钧夫妇、老舍夫妇、罗隆基、杨虎、吴祖光夫妇等。受此影响，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也开始陆续收藏一些齐白石的作品。

最初，黄琪翔夫妇是跟着老舍夫妇一起去过齐白石家几次，开始购买齐白石的画。齐白石作品被选为新中国邮票《牡丹图》，

1 胡絮青在北师大学习期间，上过杨仲子、孙诵昭的书画课。杨仲子是齐白石的好友，而孙诵昭则是齐白石早期的著名女弟子。

2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之子黄向明先生证实，当初母亲郭秀仪第一次在老舍家看见齐白石的作品，是一幅名曰《水趣》的群虾图。

就是黄琪翔夫妇于1950年购买的。这幅《牡丹图》的上款是：“秀仪夫人清属，庚寅九十岁白石。”不过，在当初设计邮票时，邮票设计师把上款挖掉了。

1950年底的一天，郭秀仪陪同胡絮青去拜见齐白石，或许是胡絮青她们事前已向老人“汇报”过郭秀仪有画画天分的事儿，齐白石老人突然问郭秀仪，说：“听说你也想学画？”

这冷不丁儿的提问，着实让郭秀仪措手不及，但机智的郭秀仪马上回应道：“您看，我今年都快40岁了，还来得及学画吗？”

齐白石说：“学画哪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的，只要你心有此念，什么时候都可以学。我30岁以前是木匠，30岁以后才开始学画。你今年还不到40，假如人能够活到100岁的话，你还能够画60年哩。”其实，齐白石学画时的岁数不是30岁，而是27岁。齐白石于1889年在老家湖南时拜胡沁园先生为师学画。27岁以前，齐白石的确是个木匠。

在老师的鼓励下，郭秀仪终于决定向齐白石拜师学画。郭秀仪至此成为齐白石入门的女弟子。

中国传统画家纳徒，有一定之规。一般来说，学徒需要交纳一定的礼金，曰“拜师费”，也称之为束脩，然后还要举行拜师礼仪，即师傅和师娘端坐高堂，徒弟行跪拜之礼。最后的程序是宴请，即请师傅及同门人一起吃饭。齐白石这次纳徒，全是女弟子，一共是四位。除了胡絮青、郭秀仪之外，另外两位女弟子是高尚谦和陶圣安。拜师的地点在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齐白石家里。此处是齐白石早年自购的平房，老人家自称“铁屋”。

年轻貌美的高尚谦女士是一位花鸟画家，湖社会员，解放后一度是北京画院的画家。在1950年至1953年间，她正在与罗隆基谈恋爱，俩人的感情不错。也正是缘于罗隆基的介绍，高尚谦才与胡絮青、郭秀仪和陶圣安成为好朋友。陶圣安女士则是国民党中将杨虎的夫人。

胡絮青、郭秀仪、高尚谦和陶圣安这四位女弟子，正式拜师齐白石的时间是在1951年的1、2月间，是1951年的春节之前。

郭秀仪为此准备了一份很重的拜师礼。她的孩子回忆说：“1951年春节，我爸爸从武汉回北京。妈妈就立即告诉爸爸说，我给齐白石磕头了。爸爸问为什么要磕头？妈妈说，我拜齐白石为师学画啦，现在是齐白石入室女弟子。爸爸就笑，说，拜师磕头是应该的。爸爸还鼓励妈妈说，女人学学琴棋书画，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是件好事。妈妈还说，我从小到大是在上海读书，读的是洋学堂，除了家里的长辈以外，还从来没有给别人磕过头。妈妈当时对她们说自己出拜师礼金好了，头就不磕了。胡絮青她们不同意，说哪有拜师不磕头的？妈妈就给齐白石磕了头。妈妈说，胡絮青磕头的姿势最标准，像拜菩萨似的。还说，地道的北京人真的是很讲究礼数，指的就是老舍夫妇，他们都是北京人。爸爸随即表示说，找个时间，咱们请你的老师吃饭吧。”¹

郭秀仪自述：“1951年，我在北京拜齐白石为师，学习国画。平时我在家里练习，每星期和老舍夫人胡絮青大姐同去向老师请教一次。我们两人是白石老人的关门弟子，也是他最宠爱的学生。”²

齐白石老人习惯上午作画，下午休息。郭秀仪与胡絮青、高尚谦等人就在下午去老师家作画。画完了，老师午睡醒了，就来看她们的画，在她们画上题字，加以批点。这些由学生作画老师题款的作品，现在一概被视为齐白石与弟子的合作画，其实，这些画就相当于学生交给老师的作业。老师看了，觉得满意的，才写上表扬之语，或者记事之类的话。出乎意料的是，郭秀仪刚开始学画，就受到齐白石的高度表扬，说明她确有绘画天分。

郭秀仪正式拜师齐白石以后，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应齐白石的请求，去替齐白石卖画。因为齐白石非常清楚，以黄琪翔将军的经历、影响和高位，再加上郭秀仪的机智、善良和交际圈，一定能够帮齐白石的作品卖个好价钱。90岁以后的齐白石老人，头脑一点也不糊涂。

1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25。

2 《流金岁月》，p69。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



齐白石在家中教授女弟子绘画。左起：高尚谦、胡絮青、郭秀仪。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琪翔夫妇的许多亲友避居香港，没有回内地，但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而当时民众往来香港仍然很自由，郭秀仪便利用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帮老师齐白石卖画。这些朋友也都乐意帮忙，其卖画的价格之好，大大超过了齐白石的期望，令老人喜出望外。

476

1951年4、5月间，郭秀仪去武汉与丈夫团聚，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齐白石托人带来了13张没有裱的画，请郭秀仪代卖。郭秀仪先是在武汉把13张画裱好，然后自己还亲自跑去香港一趟，把这些画全部卖掉。齐白石当时的润格每平方尺2.5元，这13张画的市场价值总共能卖一二百块钱，而郭秀仪却帮他卖了5000多元。她回到武汉写信给齐白石，汇报自己完成卖画“任务”的情况。齐白石给郭秀仪写了回信。齐白石的这封回信侥幸



白石老人和郭秀仪合影。

地被保留了下来。

477

信封上的收件地址，是黄琪翔在武汉的住址：汉口，六合路军委会新建房子第一间；收件人：郭秀仪女士启；寄件地址：北京跨车胡同十号；寄件人：齐白石。

信札的内容如下：

秀仪夫人女弟子鉴：老身无恙，勿劳悬念。得汝函，

知琪翔弟吉祥。汝来函三两次未答，甚谦。每由高尚谦处得见汝函，无不问及老翁也。汝五月一日与函，收到，为卖画之事，日后汝来京时带来奉上云云，甚感。老人旧有少年时所作工笔虫子册页，及大小诸幅，颇精，多，数幅，亦候汝来京时交赠吾女弟也，赠琪翔弟并有画。承汝代裱画十三幅，裱钱不用琪翔弟管理，老人自宜。劳神足矣。老人家穷，忌言多钱，愿弟慎之慎之。

这封信除问候酬酢之外，齐白石说，收到你5月1日武汉寄来的信，内容谈到替我卖画的事，非常感激。我准备把自己年轻时画的工笔虫子册页和大小不一的作品赠你，这些都是精品，还要赠送给黄琪翔几幅画。关于裱画的钱，由我自己出，别再麻烦琪翔管理，你们为我劳神就足够了。齐白石最后说，你老师家里贫穷，很忌讳说有钱，所以希望你以后说话要特别谨慎。

1951年6月，黄琪翔回京办事，携夫人郭秀仪回到北京。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卖画的钱给老师送去。齐白石也把赠送他们的画，交给了郭秀仪。

1952年，黄琪翔、郭秀仪又搬了家，就是从乃兹府大街16号院搬到了宽街2号院，也是租来的房子。宽街2号院是个大宅门，是五四运动时被全国人民痛骂为“卖国贼”陆宗舆（1876—1941）的家。

陆宗舆的家，原是四进四出的四个完整的四合院，靠北的第一进院住的是许德珩（1890—1990）家，¹南向就是黄琪翔、郭秀仪的家，再后面是陆宗舆儿子住的院子，第四个院子住的是吴奇伟将军。

吴奇伟将军与黄琪翔是老哥俩，在陆军小学就是同班同学。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下

1 许德珩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他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从师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5年与劳君展结婚。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

任 36 团中校参谋长，团长就是黄琪翔，所以黄琪翔是吴奇伟的顶头上司。在汀泗桥战役中，吴奇伟在团长黄琪翔的率领下猛攻军阀吴佩孚部主力扼守的汀泗桥而立功。吴奇伟后来当过湖南省主席。1949 年 5 月，在黄琪翔的影响下，吴奇伟与李洁之、曾天节等人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随后至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¹

郭秀仪搬到宽街 2 号院不久，迎来了一位管她叫“仪姐”的香港客人，这个人就是香港著名摄影家、画家和教育家陈海鹰先生。陈海鹰曾是老画家李铁夫的学生，现在是香港美术专科学校校长，也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

1952 年陈海鹰的北京之行为郭秀仪带来了快乐。当陈海鹰得知郭秀仪已是齐白石入室弟子，便希望去拜访齐白石，仪姐一口答应。陈海鹰认为当时的香港，是个“荒芜落后”的地方，普通人很少知道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艺术成就。

在北京，陈海鹰随同郭秀仪去拜访齐白石，为齐白石拍摄了许多照片，还采访了齐白石的好友、画家胡佩衡，听胡佩衡讲解齐白石的生活和艺术。齐白石还为香港美术专科学校题写了校名。最后，陈海鹰还翻拍了郭秀仪收藏的齐白石作品多幅。

1953 年 12 月 26 日是毛主席的 60 岁生日。郭秀仪拿起画笔，画了《寿桃和万年青图》。那鲜红的桃子，碧翠的绿叶，令人赏心悦目，远远一看，就知道是齐门风采。随后，她将此画赠予毛泽东主席。

这幅《寿桃和万年青图》，尺寸不大，30cm×30cm，只有 0.81 平方尺。画中的寿桃和万年青用色非常鲜艳，使用的洋红鲜嫩欲滴，视觉效果上佳。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郭秀仪在 50 年代创作的寿桃，其视觉效果与老师齐白石的寿桃非常相似，一方面说明郭秀仪继承了齐门的绘画技法，还有一个秘诀是，郭秀仪所使用的洋红颜料，是老师齐白石赠送的，也就是说，她与老师所使用

1 吴奇伟将军 1953 年 7 月病逝于北京，终年 63 岁。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琪翔夫妇在北京大羊宜宾胡同3号家中与香港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著名画家陈海鹰、雷耐梅夫妇合影。摄于1957年。

的洋红颜料是一样的。¹ 郭秀仪说：“因为老师齐白石看我喜欢画寿桃，就偷偷送了我一包洋红，我画了好几年。其他人（师兄妹）都不知道。”²

郭秀仪于1953年为毛主席绘画祝寿的事，一直不为外人所闻。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型画册《毛泽东珍藏名家画集》第一集出版，其中赫然刊载着郭秀仪的作品《寿桃和万年青图》。如今，这幅作品已经成为国家的文化财富，收藏在中南海里。

在1954年6月至9月间，由于国内撤销了行政大区，黄琪翔告别武汉，赋闲在北京的家里。此间，黄琪翔、郭秀仪又搬了

1 郭秀仪生前将这一趣闻告诉过本书作者。查各种资料，似乎齐白石的其他门人并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2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61。



1952年郭秀仪赠送毛主席的《寿桃和万年青图》。

一次家，就是从宽街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大羊宜宾新居。这次他们不再租借别人家的房子，而是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黄琪翔、郭秀仪于解放初期购买的私产房，占地有三亩多。它的位置在今天东长安街附近，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这所房子不是老北京四合院，而是由十几间平房组成，仅对外开的门就多达四五个。大门内是一个大花园，黄琪翔的书房正对着这个大花园，挨着书房是一个大会客厅，然后是黄琪翔、郭秀仪的卧室等依次排开。在花园的左方，是门卫和车库。但是，车库内不停放汽车，因为司机不住在黄琪翔家，而是每天上午开车来接黄琪翔上班，所以车库里堆放的是杂物。国家当时给黄琪翔配备的是苏联产华沙牌小轿车。

在1954年之前，房子一直是租借给新中国的友好国家保加利亚的驻华大使馆使用。黄琪翔被调回北京后，他们就收回了房子，供自己使用。

北师大的蔡彻女士，是黄药眠先生的夫人，经常陪伴黄药眠到黄琪翔家里来做客。多年后，蔡彻回忆说：“他们的宅院前耸立着两扇高大的红漆大门。我们进门后，琪哥和郭大姐已在客厅前伫立迎迓。这时，客厅中传来一阵阵笑声和谈话声。走进客厅，一幅盛开的牡丹画卷迎面映入眼帘。厅堂中已有十多位客人在座。对如此众多的亲朋好友，郭大姐盛情款待，笑容可掬，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大家谈笑风生，友好温馨的气氛盈溢整个厅堂。我走近红牡丹画卷前一看，上面题款：‘秀仪弟子属画，九十二白石’，原来郭大姐还是名画家齐白石的高足呢。无怪乎他们家高朋满座，谈诗论画，风雅多趣。”¹

黄琪翔回到北京后，心情非常舒畅。他和朋友们来往更加频繁，而且每周都要约上朋友们去跳舞。其中，与好友黄绍竑将军（1895—1966）来往最为密切。黄绍竑家，在北京的小雅宝胡同，离黄琪翔家很近。

黄琪翔是出了名的美男子。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女士在她的文章《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中，记录了章伯钧曾说过：“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美男子，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²

在解放初期，全北京城跳舞最出名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北京饭店的舞厅，毛主席去过，周恩来总理也经常去；一是西郊民巷的国际俱乐部。这两处地方都不对普通民众开放。

张新荣女士回忆说：“1954年我在北京读大学期间，我和我丈夫（当时尚未结婚）经常到黄绍竑伯伯家度周末和假日，我和

1 《流金岁月》，p225。蔡彻文章《一代名将黄琪翔的夫人——全国政协常委郭秀仪》。

2 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事并不如烟》2004年1月版，p52。



1951年，齐白石在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家中合影。

齐白石在照片上题字：“后左者女弟子秀仪，右者友弟琪翔。九十一岁白石自题”。

振文姐（黄绍竑伯伯的女儿）也常到黄琪翔伯伯家去玩。我们很喜欢黄伯母的古雅的书房，知道她还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女弟子。有时，我们还一起到西交民巷的国际俱乐部看电影、跳舞。有一次，我喊黄伯伯时，两位黄伯伯同时答应了。这时黄绍竑伯伯说：‘你做我的干女儿吧，以后叫我干爹。叫他（指黄琪翔）黄伯伯。’黄琪翔不同意，说：‘我看还是让她做我的干女儿，叫你黄伯伯好啦。’而后也常以此为说笑之话题。”¹郭秀仪也回忆说，“在50年代，周总理多次邀请我和黄琪翔去北京饭店跳舞。”周恩来总理请她跳舞后，总夸她说：“黄夫人，你的舞姿很专业哩。”可见，黄琪翔夫妇当时的心情非常之好。

郭秀仪拜师齐白石之后，学习绘画的热情高涨。白天，她经常邀请大师兄、画家王雪涛和黄养辉先生来家吃饭，请教绘画方面的问题。她从学王雪涛先生，主要是学习画花卉的技法，而跟

1 《流金岁月》，p262。张新荣文章《缅怀往事》。



齐白石的弟子、郭秀仪的师弟娄师白夫妇（前排中间）的婚礼合影。
齐白石（第二排左起三）、郭秀仪、黄琪翔（第三排四、五）等。

黄养辉先生学习素描。因为老师齐白石说过“学我者死”，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所变化，要画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她要跟随不同的老师学画。如果闲来无事，郭秀仪就抱着她的素描本去花园，去画写生。同时，郭秀仪还跟着溥雪斋先生学习书法。

每到休息天，黄琪翔夫妇会提前给老师齐白石打电话，邀请老人家出来玩。玩，其实就是请齐白石吃饭。他们吃饭的地点除了翠华楼饭店、北海仿膳和北京饭店以外，就是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款待。

黄琪翔夫妇宴请齐白石，总会邀请那些喜欢齐白石艺术的朋友、弟子等，这其中包括老舍、杨虎、章伯钧、罗隆基、吴祖光等人，还有 50 年代一起随白石学画的师姐胡絮青、师弟娄师白等。

有一次，齐白石到黄琪翔、郭秀仪家里来吃饭，非常开心。黄琪翔、郭秀仪就请老师画画。老师不推辞，取来弟子郭秀仪平时用的笔墨纸砚，对着黄琪翔家里的一尊瓷塑老寿星立像，画了一幅《寿星图》，非常精彩，是齐白石晚年的名作。



齐白石与女弟子郭秀仪（后排左三）、胡絮青（后排左二）、新风霞（后排左四）在一起。

师弟娄师白先生后来回忆说：“尝忆齐师于秀仪家中作客，见一瓷制老寿星，鼓额长眉，一手执龙杖，一手托仙桃，造型颇为生动。秀仪夫妇遂请齐师为之造像。老人欣然应若，寥寥数笔，寿星神貌毕肖，跃然纸上。老人兴起，又于人物衣服上勾勒云形饰纹，更笔笔不苟以藤黄填实云纹以外之空白。此幅画堪称白石老人晚年难得之人物精品，于今想起，竟恍如昨日也！”

人物画是齐白石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越是到了晚年他的人物画就画得越是洗练、越是写意，往往只需要几笔衣线，面目也不作细致刻画，造型稚拙凝练，颇见生动、幽默与智慧，而他给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画的这幅《寿星图》，就是齐白石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可是，这幅《寿星图》后来不知怎么从黄琪翔、郭秀仪家流失了。黄向明先生回忆说：“瓷器老寿星送人了，白石老人画的

老寿星请裱画大师刘金涛装裱后镶入镜框，在家中客厅挂了十多年，直到‘文革’中不知去向”。

五、慰问西藏

1956年初，黄琪翔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问题始终是中央高度关注的民族问题，受到万众瞩目。众所周知，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制度，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由达赖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掌握。这种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在雪域高原上延续了上千年。在这历史转折关头，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抵京谈判，并于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但尚未进行政治改革。

三年之后，1954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四方代表汇聚一堂，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这不仅是西藏的地方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它预示着西藏自治区诞生在即。

1956年1月3日，国家民委向中央请示报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于4月在西藏拉萨成立，建议中央组织代表团前往祝贺和访问。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委的报告作了批复：

确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4月22日正式成立，并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专程前往祝贺。1月25日，中央正式对外宣布：命名陈毅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

西藏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这是中央向西藏派出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代表团。陈毅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高职。中央批复中明确指出：“拟请陈毅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组成名单和各项准备工作由陈毅主持和指导。”因此，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张经武、汪锋、黄琪翔、天宝、王再天、栗再温、巩天民等人选，是陈毅与各单位协商之后，经深思熟虑才由其本人拍案确定。

挑选黄琪翔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并且在副团长中位列第三，显然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我们先来看看其他几位副团长的资历和背景：

排名第一位的副团长是张经武将军（1906—1971）。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负责处理西藏事务，历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排名第二位的是汪锋（1910—1998），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协助陈毅处理西藏事务，并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针对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其他副团长的背景也都很特殊，如天宝（1917—2008）是藏族人，藏族名为桑吉悦希。193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0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入川，继而随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先遣支队进藏，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藏工作团团长，西康省政府委员，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康定、阿坝藏族自治区主席。1955年11月起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

王再天（1907—2006）是蒙古族人，蒙族名为那木吉乐色楞，

又名王星三。他12岁进达尔罕王府当奴隶，1926年逃出王府加入旧东北军，后毕业于东北军讲武堂炮兵科。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王再天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委员、政法委主任兼公安部长，内蒙古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内蒙古公安部队司令员、政委。1954年至1967年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栗再温（1908—1967），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后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直属党委副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委书记。

巩天民（1900—1978）的公开身份是银行家、著名民主人士，这个身份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其实，巩天民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共早期在东北地区建立秘密情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中央代表团的任务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西藏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联系，增进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加强汉藏和其他民族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帮助西藏工委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保卫西藏疆域。总的方针是：广泛接触、谦虚谨慎、加强团结、促进进步、建设和保卫西藏边疆。

代表团成员主要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总政治部等干部组成，他们分属17个民族。“代表团正式代表57人，加上工作人员及文艺工作者，共800多人，带有90多个精彩的文艺节目和70多部电影。随行汽车300余辆，携带足够的生活用品和所需物品，还有准备赠送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级僧俗官员的礼物，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向西藏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¹随团工作的还有翻译组、新闻记者组、电影摄制组、电影放映队和一个包括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在内的文艺工作队。礼物中，还包括一本《伟大的祖国》（藏文版）画册，其内容系介绍新中国在最初几年间所取得的最新成

1 据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之一李国柱回忆文章《陈毅副总理到西藏》，载2015年09月11日《人民政协报》。



中央慰问团赴藏途中，副团长张经武（中）、汪锋（右）、黄琪翔在帐篷中共进晚餐。

就。画册扉页钤印“中央代表团赠”红色印章，附有毛主席、朱德以及文物古迹、京剧武术、民族团结等摄影图片，共精印700册。

就在中央代表团启程之前，1956年2月5日，在拉萨祈祷大法会期间，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散发大量传单，叫嚣“西藏独立”，反对改革，诬蔑进藏的人民解放军，意在迎合美、英等反华势力，破坏中央代表团进藏的政治气氛。

1956年3月15日，中央代表团按照预定的时间启程。由于内地至西藏的飞机尚未通航¹，代表团只能乘火车离京，先到兰州，然后换乘汽车到青海省西宁市，再从西宁经新近建成的青藏公路入藏。途中要翻越平均海拔高度在4500米以上的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越荒漠雪山、风沙雪雨，路途十分困难。1956年3月，陈毅在兰州临洮作诗《过临洮》，说明此时中央代表团还没

1 西藏当雄机场是于1955年始建、1956年投入使用。

有进入藏区。¹ 临洮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省会兰州的南大门。4月，中央代表团沿着青藏公路入藏，陈毅作诗《昆仑山颂》中云：



陈毅团长(右二)与代表团领导黄琪翔(右一)等合影。

“我车日行三百里，七天驰骋不曾停。昆仑魄力何伟大，不以丘壑博盛名。”² 写的正是中央代表团过昆仑山的情景。55岁的团长陈毅元帅，身患高血压症，中央特别安排其夫人张茜（1922—1974）陪同前往。

黄琪翔自述：“从兰州西行，全团二百多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汽车组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行军长径足有四十余里，走起来浩浩荡荡，就和万马奔腾一样。我们飞驰在青海境内，跃过了西宁，走上了当年文成公主出关的日月山，访问了解放前班禅活佛曾经住过的香日德，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上欣赏了青海的风光，一望无际的草原里，千百个牛羊群在蠕动着，江山如画，一片太平景象，足令人心旷神怡！特别值得感动的，是穿着盛装的藏族同胞，沿着路旁，天真的和我们招手，表示欢迎，从他们笑逐颜开的表情来看，汉藏一家，今天是真正成为事实了！”³

4月14日，陈毅率中央代表团抵达藏北重镇黑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派遣噶伦朵噶·彭措饶杰、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38—1989）的代表罗桑楚尼以及黑河藏族群众二千余人，列队夹道欢迎，随后，随同中央代表团前往的文艺团体与当地群众一起举行联欢大会。陈毅在欢迎大会上接

1 陈毅 1956 年 3 月作诗《过临洮》：“陇头无复呜咽水，汉藏自由过临洮。煮豆燃其伤往昔，而今团结乐淘淘。”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北京版《陈毅诗词选集》。P172。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北京版《陈毅诗词选集》，P174。

3 原载 1956 年 10 月 1 日香港《大公报》，黄琪翔文章《我从西藏归来》。



1955年4月14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黄琪翔（右二）陪同陈毅团长检阅部队。

受了藏族男女青年赠献的切玛盒——这个精制的斗型木盒中，分别盛入炒麦粒和糌粑，并插上青稞穗、红穗花和酥油花，象征着人寿年丰、吉祥如意。在藏族人民的传统礼仪中，切玛盒是举行重大的庆典仪式或者欢度藏历新年之时所必不可少的吉祥物。

一路上，黄琪翔十分兴奋。他说：“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我过去对于这个西北名城，思想上不知不觉地容易把它和落后、贫困、偏僻等形容字眼连系起来，甚至以为它快要接近祖国的边疆了。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我初次从地图上注意到，兰州原是整个中国的中心，假如你坐飞机从兰州起飞，到新疆、到上海、到东北、到西南，航程大约是不相上下。这里的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情形良好，特别是瓜果类如苹果、梨、白瓜等等很有盛名，因此兰州有水果城之称。在工业上，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其中包括二、三是个大工程。成千上万的从东南、西南各省来的青年男女和大批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热情地愉快地在这里劳动着，看来他们已经把这里当做是自己的

家乡。苏联专家们也在忘我地工作着，到处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新气象。兰州正在发挥作为祖国西北的经济中心的作用，我看见他光芒万丈的前途，不仅虔诚地为它祝福！”¹

4月17日，中央代表团抵拉萨，受到西藏党政军领导和拉萨市3万多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离城十华里，亲往“接官亭”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接官亭”院内，搭设了绣着彩色凤凰和八仙的大帐篷，挂着象征吉祥的佛像和锦幡。通向这座帐篷的道路上，按照藏族最隆重的礼节，用白粉撒成各种图案。下午13时，中央代表团的车队在藏胞一片欢呼声中到达“接官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向陈毅副总理敬献哈达，陈毅副总理也向达赖和班禅回赠哈达。在接着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陈毅副总理还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敬献的酥油茶和人参果米饭。

黄琪翔说：“当我们到达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和班禅率领当地僧俗官员和民众，万人空巷，郊迎数十里，仪仗之盛，充分表现出藏族领袖和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感激和拥护的心情。在过去很长久的历史时期中，少数民族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再加上外来力量的挑拨离间，汉藏民族的关系是有缺憾的。只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民族平等、友爱、互助和团结的政策，这种不幸的情形才改变了过来。在这次空前盛大热烈的欢迎会中，我体会到：汉藏兄弟民族是真正冲破了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障碍而亲密地团结起来了。任何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假如还不死心，想要在西藏内部来制造阴谋企图破坏的话，命运注定它们是一定会失败的。”²

4月18日，黄琪翔等各位副团长，在陈毅团长的率领下来到罗布林卡和大昭寺，分别拜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观看了大昭寺前唐朝文成公主亲手栽植的柳树。文成公主

1 原载1956年10月1日香港《大公报》，黄琪翔文章《我从西藏归来》。

2 原载1956年10月1日香港《大公报》，黄琪翔文章《我从西藏归来》。



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后，达赖喇嘛（左一）和班禅额尔德尼（左二）欢迎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黄琪翔（右一）、汪锋等。图为黄琪翔与达赖握手。

（625—680）是唐室远支宗室女，汉族，吐蕃尊称她甲木萨。藏语中“甲”的意思是“汉”，“木”的意思是“女”，“萨”的意思为神仙。唐贞观 14 年（640 年），唐太宗李世民封李氏为文成公主，唐贞观 15 年（641 年）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两百年间，凡新赞普即位，必请唐天子“册命”。

4 月 19 日下午，中央代表团全体代表出席了中共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联合举办的盛大欢迎宴会和欢迎晚会。

4 月 20 日下午，黄琪翔和中央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一起来到罗布林卡，拜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

4 月 21 日下午，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金色大殿（正直普照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央代表团全体团员，班禅亲临作陪。当天

下午，陈毅副总理带领张经武、汪峰、黄琪翔等副团长在拉萨接见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四品以上的僧俗官员。同一天，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姐姐卓玛热情接待了中央代表团中蒙古族、布依族、汉族女团员以及随队前来的维吾尔族、朝鲜族、汉族女演员。

4月22日，古城拉萨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布达拉宫前面新建的大礼堂隆重举行。

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国旗和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毛主席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画像。会场两侧挂着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题词。

成立大会上，出现了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盛况。那些把头发分成两股辫子缠在头顶、发结上戴着金质“格乌”、穿着滚龙大袍和红云绣靴的，是噶厦官员；身穿黄缎绣龙马褂、头戴圆顶金丝帽的，是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身穿用氍毹织成的宽袖大领“楚巴”的，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藏族领导人。而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们，则身穿中山装。在西藏的历史上，来自西藏各地区、各方面、各教派和各社会阶层的代表，济济一堂，这还是第一次。

大会开始。达赖喇嘛首先致开幕词，然后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任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筹委会主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1914—1972）任第二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为秘书长。陈毅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授印后，陈毅副总理作了大会讲话。

陈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密切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加强了。在短短的时期内，能够结束长时期以来为帝国主义者和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蓄意制造的汉藏两大民族的对立和西藏内部分裂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几年来最根本的最大的成就。”陈毅还指出：“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胜利。筹委会成立以后，西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至此宣告正式成立。

黄琪翔回忆说：“中央代表团，是以陈毅副总理为首，有十七个兄弟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真诚地表示了中央和各族人民对西藏的关怀和重视。中央代表团所到之地，藏族同胞都夹道欢迎，进一步改善了汉藏关系，在祖国民族团结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¹

他还说：“过去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反动统治的欺骗压迫，汉藏两大民族曾长期发生过严重的隔阂，即西藏内部也因此不能很好地团结。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订立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贯彻了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方针。入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在西藏的工作人员，不但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而且保持了艰苦朴素、谨慎耐劳的优良作风，并以具体行动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民族服务，取得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僧俗人民衷心的信任，从而增加了汉藏人民和西藏人民内部更好地团结。”²

早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分别发来贺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毛泽东在贺电中说：“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的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也都发来了贺电。

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从此有了统一的带有政权性

1 黄琪翔代表阮天民、孙云铸、吴觉民、何思源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 黄琪翔代表阮天民、孙云铸、吴觉民、何思源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质的领导机关。筹委会成立的当天，拉萨市民像过节一样，门上挂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地上、墙上用白粉画上吉祥图案。大昭寺、小昭寺点起成千上万盏神灯，僧人们在神灯下诵念经文，祈祷吉祥。中央代表团向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赠送毛泽东主席像章等纪念品。这些纪念品至今仍珍藏在藏族人民的家中。

5月1日，陈毅元帅检阅了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藏军。

5月2日，拉萨市的工人、农牧民、市民、学生、各阶层人士、各群众团体成员、筹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共三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中央还特派飞机飞临拉萨上空，撒下印有藏汉文字的彩色传单，祝福西藏人民。这是一种新奇的景象，市民们欢呼跳跃，争相传阅传单。

5月12日，陈毅率中央代表团第一分团抵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访问，受到班禅和日喀则军民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成立大会闭幕后，中央代表团分成三个分团，分赴西藏各地进行访问和慰问。第一分团到了江孜、帕里、亚东，第二分团到了昌都，第三分团到了阿里。代表团向西藏农牧区赠送了大批农作物优良品种和农牧生产工具，向西藏各界赠送了大量礼品、纪念品，向寺庙僧众发放了布施。随团的各文艺团体在西藏各地演出了精采的文艺节目。代表团各分团所到之处，受到西藏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受陈毅团长的委托，黄琪翔副团长带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前往哲蚌寺，看望僧众。哲蚌寺位于拉萨西郊更丕乌孜山下。哲蚌，藏语意为“米聚”，象征繁荣，藏文全称意为“吉祥积米十方尊胜洲”，它是格鲁派中地位最高的寺院。整个寺院规模宏大，鳞次栉比的白色建筑群依山铺满山坡，远望好似巨大的米堆，故名哲蚌。由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之弟子降央曲吉·扎西班丹于公元1416年创建。解放前该寺僧众超过一万人，是藏传佛教最大的寺庙，拥有141个庄园与540多个牧场。

5月31日，中央代表团圆满完成使命，大部分成员在团长陈毅的率领下驱车前往西藏当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首都。当雄机场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那时刚刚建成，而代表团所乘坐的这一航班也成为了拉萨至北京的首航。

黄琪翔随同代表团的专机离开西藏。他对乘坐首航飞机飞越冰雪群峰感到十分欢欣，说：“我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离开了拉萨，搭乘试航成功以后第一次的飞机，回到了西宁。七千尺的高空，四个钟头的飞行，安稳地飞过了万里冰山。从飞过空中禁区这件事，不仅使人想到，新鲜事物出现之快、之多，有时真令人难于相信啊！”¹

中央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

¹ 原载 1956 年 10 月 1 日香港《大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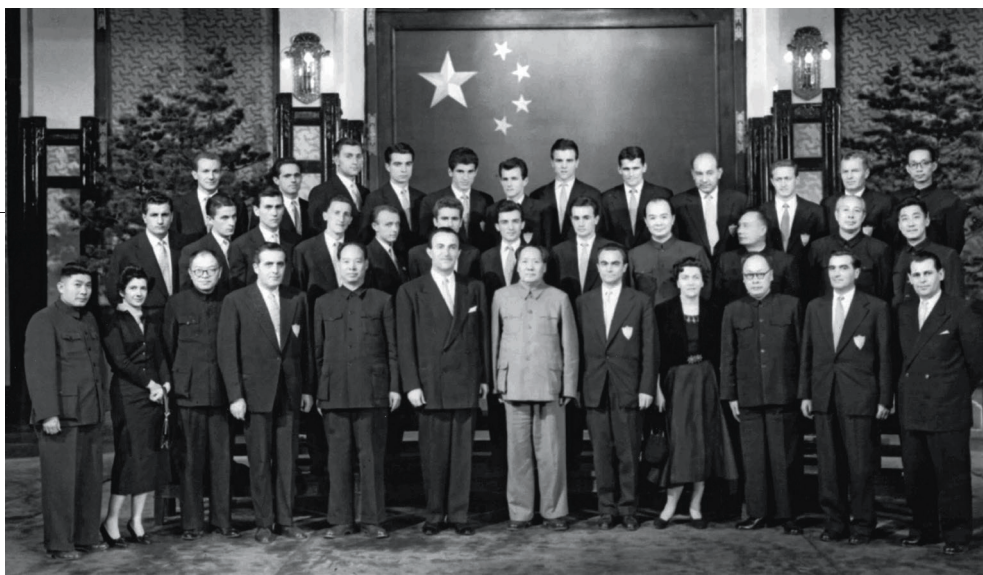
六、国家体委副主任

1954年11月,黄琪翔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黄琪翔干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即1954年至1956年,实足有两年多。

人民体育事业是新中国的一项新事业,尚处于初创时期。中共中央对体育运动非常重视,指出:“改善人们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而人民健康还远不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逐步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实是一种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

黄琪翔出任国家体委的领导后,从不摆虚架子,很快就进入角色,带头钻研业务,成为一个体育专家。

在国家体委工作的张彩珍女士,几乎与黄琪翔前后脚进入体委工作。她是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德语系高材生。1948年3月,由乔石同志(1924—2015)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点“女秀才”张彩珍到体委工作,说她是“文人进武庙”。张彩珍历任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国家体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所以她十分了解黄琪翔在国家体委的工作情况。张彩珍回忆说:“党中央、国务院把体



1956年2月6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黄琪翔（第二排右四）陪同接见。

育这项强国强民的大事委托这几位先生，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精诚合作。”¹

张彩珍说：“黄琪翔先生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虽然只有两个春秋，但他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年中，黄先生出席了1955年、1956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参与总结工作经验，商讨制定了发展体育事业的‘六项方针’。这‘六项方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基层体育协会相继建立，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各项竞赛活动相当活跃，促进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体育干部培训，国际体育交往也日益增加；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武术，亦开始挖掘整理和推行。”

张彩珍还举例说：“黄先生对我国体育教育事业也倍加关心，

1 《黄琪翔传》，p188。张彩珍文章《铭记黄先生对体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张彩珍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家体委担任副主任的女性。她的体委副主任任期是1985年5月至1991年9月，而且，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林匹克勋章的女性。

亲自听取了六所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的情况汇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向国务院、中宣部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学院工作的各项措施，都得到了批准实施。”¹

1955年10月2日至9日，全国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为运动会题词。运动会设有田径、举重、自行车、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国各产业工会的1700多名运动员参赛，并在田径、举重和自行车项目中创造了三项全国最好成绩。

1956年1月11日，国家体委公布1955年的102项全国纪录。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全国纪录。其中，78项是在1955年创造的，18项是在解放以后其他年份创造的，只有6项是在解放前创造的。1月16日至26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体育运动问题，确定1956年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世界水平。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联队同来访的前苏联队举重比赛中，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打破世界纪录的第一人。第二年的11月17日，在北京田径赛场上，郑凤荣用剪式技术以1.77米的成绩，打破由美国运动员M·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巾帼英雄，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的一只燕子”。

黄琪翔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心情畅快。

1956年2月，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来华访问。2月6日，黄

1 《黄琪翔传》，p189。张彩珍文章《铭记黄先生对体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1955年，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黄琪翔在给举重运动员颁奖。

琪翔陪同毛主席接见了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中国国家足球队访问印度、缅甸，中国田径队访问苏联回国后，黄琪翔不仅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还帮助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还曾经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副团长，出访过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国际业务交流访问。

那时候，与黄琪翔交往的领导人很多，如贺龙、陈毅、叶剑英、习仲勋、李维汉、郭沫若、徐冰、张执一、傅作义、章伯钧、李四光等，经常来黄琪翔家中做客。他们在一起畅谈中国体育的发展前景，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憧憬和自豪。席间，大家都知道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是齐白石的学生，非常关心郭秀仪的艺术创作情

况，而郭秀仪也十分高兴地把新作展示给大家看，于是主客一起欣赏、品评，其乐融融。

黄琪翔与友人交往时，和颜悦色，举止得体，非常注重礼仪。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尹明孝回忆说：“五十年代中，黄琪老要在家里宴客，宴请的来宾有叶剑英、贺龙、陈毅三位元帅，还有习仲勋等领导。让机关食堂的厨师李师傅去掌勺，让我去帮忙采购。当我来到黄琪老家时，他注视着我，说：‘你怎么连胡子也没刮？’然后就转身取出剃须刀，说：‘先把胡子刮干净，再忙工作。’我深受感动和教育。黄琪老待人从不高声厉色，可他的举动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国家干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仪表代表了对客人的尊敬。”¹

黄琪翔曾经笑谈自己家像个小展览室，常年为夫人郭秀仪举办美术展。而受到各方鼓励和支持的郭秀仪，学习绘画的热情更加高涨，天天笔不离手。北京城里举办的每一次美术展览，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她把看画展当作自己学习观摩的机会。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是黄琪翔家的近邻，也常来走动，对郭秀仪的新作总是啧啧称赞。

这期间，“黄琪翔、郭秀仪和周恩来总理、邓大姐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总理有时约黄琪翔夫妇到北京饭店跳舞。当周总理和郭秀仪跳舞时，常问到黄琪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问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情况。”²郭秀仪回忆说：“在50年代，周总理多次邀请我和黄琪翔去北京饭店跳舞。”³周恩来总理处事周全，知道黄琪翔是位旧式军人，不爱闲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通过其妻子郭秀仪之口来了解黄琪翔的近况，以示关心。

1956年初春的一天，郭秀仪在家中习画，突然，门卫跑进来说客人有急事在门外等她。郭秀仪来到大门口，看见一辆挂着中南海车牌的汽车。穿着军装的司机说：“黄夫人，周恩来总理请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2 《流金岁月》，p26。

3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65。

您去一下，特意派我来接您。”

郭秀仪很紧张，因为周总理从来没有亲自派车接她或者接丈夫黄琪翔，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更不方便去向司机打听，于是她立即上了车，跟着司机去中南海。郭秀仪平时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每次出门，都要精心打扮一番。但是这一次去中南海，郭秀仪没有时间再为自己梳妆打扮一番。¹

汽车直接去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就是周总理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郭秀仪没有看见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却见到总理端着饭碗在吃面，再往里面看，呦，自己的老师齐白石老人和他的儿子齐良迟也在里面吃面！

郭秀仪回忆说：“当初齐白石住在西城跨车胡同，他称为‘铁屋’的居所。房子比较小，前来访问他的外宾却很多。政府为了照顾这位誉满全球的老艺术家，特地为他购置了新居，并安排了护士、门房等服务人员。习惯于无拘无束生活的老人入住后，感到很不自在，而且还误以为是将他变相软禁起来，便和四子齐良迟一起到国务院求见周总理。当天中午总理派了一辆汽车把我接到中南海。我进去时，总理正端着碗站着吃面。他笑着对我说：‘黄夫人，你的老师来了，他不喜欢他的新居，吃完饭后我们一起把他送回旧居去吧。’总理匆匆吃完，便和我陪着齐白石父子同坐一辆车，回到了老人小别的‘铁屋’。接着他又和老师全家亲切倾谈了一个多小时，使老人深为感动。总理因要参加外事活动，向老人告辞。临行前，他嘱咐我说：‘黄夫人，你多陪一会儿，等他的东西都运回来以后再走。我给你留下一辆车和一名警卫送你回家。以后你每天都要来看老师，并且向我汇报情况。’自此我天天都去探望老师，并向总理汇报，直到一切安顿妥当，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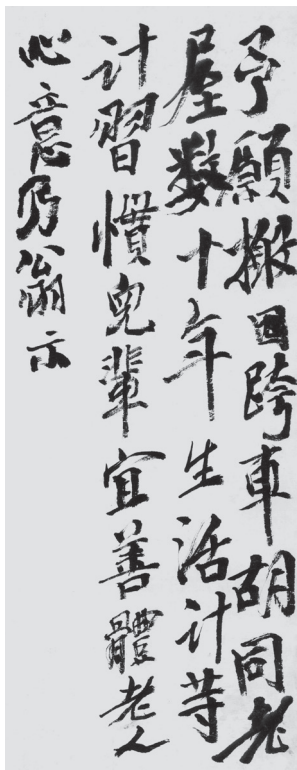
1 郭秀仪女士一辈子都是很讲究的女人，每当她要外出，一定要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她晚年。当她到了80多岁时，本书作者去访问她，时间约好是下午3点，我怕北京马路塞车，总要提前到她家。比如我是2点30分到，也要等到3点整她才会从里屋出来。有时我会问她家的保姆阿姨：“奶奶人呢？”保姆阿姨就会冲里屋（她的卧室）努努嘴，悄声说：“在里屋梳头哪！”

心情也平静下来为止。”¹

原来，文化部为了照顾齐白石的生活，把地安门外南锣鼓巷地区雨儿胡同5号的一所四合院整修一新后，于1955年秋天分配给他居住。这套四合院连同它两边的大院子，本属于一个大宅门，都是皇太极第四子叶布舒（康熙年间的辅国公）的官邸，后来成为民国时期北海公园董事长董叔平的家，再后来它又被一分为三，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院落。政府把中间的那套四合院买下后，进行修缮，分配给“人民艺术家”齐白石，还为他配备了饮食起居的服务人员。

可老人偏偏住不惯雨儿胡同的新屋，想搬回旧居，而其家属又认为跨车胡同的“铁屋”条件不如新屋好，起码新屋光线明亮，暖气也比“铁屋”舒适。因齐白石与家人的意见不统一，而文化部一时又不好表态。齐白石老人急了，亲自跑到中南海去请求共和国总理替他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书法经典·齐白石卷》收录了齐白石的一张“示儿书札”，写作时间为1956年初，内容为：“予愿搬回跨车胡同老屋，数十年生活计等计习惯，儿辈宜善体老人心意。乃翁示。”就是说的这件事。

周恩来总理离开后，郭秀仪就开始为老师搬家的事而忙碌。一方面，她要为老师搬家而忙前忙后，一方面，她还要分别找老师齐白石和他的子女们做安抚工作，同时，如果发现老师家里缺少什么生活用品时，她就亲自去商店里购



齐白石《示儿书札》，作于1956年，尺寸为34.5×16.5cm，收录在《20世纪书法经典·齐白石卷》。

1 《流金岁月》，p70。郭秀仪“往事拾遗”。

买。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秀仪从来没有出门工作过，也没有上班的概念，可自从总理交代这项任务后，她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上午，丈夫黄琪翔坐车去上班时，总理派来的车也在门口等她了；下午，黄琪翔下班回家时，又能碰到郭秀仪坐着车回来。有时，她比黄琪翔回家得还要晚。

晚年的郭秀仪曾在开玩笑时说：“解放后我也上过班，只上了一个星期，是周总理亲自给我安排的工作，让我负责给齐白石搬家！”说这话时，她总感觉特别自豪。

这样忙了一个星期后，老师齐白石总算安居了。老人家很开心。郭秀仪这才辞别了中南海司机，随后给总理办公室去电话，报告老师齐白石搬家的情况，是总理秘书接的电话。

当天晚上，总理秘书给郭秀仪打来电话，大意是：黄夫人，总理已经知道此事，并指示，让我们转达总理对你的问候和谢意。¹

郭秀仪师弟、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对于齐白石这次搬家记忆犹新。他在《丹青皆为本色酒，画笔常鉴墨痕新——忆画坛巾帼郭秀仪》的文章中，也有详述：“1955年秋，周恩来总理为使年过九旬之白石老人得一舒适宁静之生活环境以颐养天年，特委托文化部及美协人员，于地安门雨儿胡同购置一所旧时王府，作为齐师之新寓。老人入住时日未久，多觉不便，终因思念旧宅，竟于1956年春某日，亲往中南海见总理，将欲搬回旧宅之意告之。为安慰老人情绪，总理先陪老人用餐闲谈，并当即派车将秀仪接来，待饭后总理与秀仪一道陪同老人返回旧宅。总理离开前，并特交代秀仪定要待老人搬家诸事完毕后再行离开，且嘱她随时汇报老人今后之生活情况。秀仪遂按总理指示一一妥当安排，使齐师生活很快恢复正常。当总理获知老人情绪终归好转时，对秀仪工作深表满意赞赏。于此，秀仪于齐师晚年生活中之重要位置可

1 那套齐白石的四合院，位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雨儿胡同5号，如今已经成了“齐白石纪念馆”，门牌号码改为13号，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其实，国画大师齐白石在那里只住过3个月的光景。

见一斑。” 娄先生文章记错了时间，不是 1955 年秋，而是 1956 年的春天。

1956 年，齐白石荣获“国际和平奖”。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作家茅盾）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将证书、金质奖章和 500 万法郎的奖金颁发给了齐白石。500 万法郎折合人民币 3.5 万元新币，是一笔相当大的钱数。9 月 1 日，在北京台基厂 9 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齐白石荣获“国际和平奖”》，要在全美美协礼堂举行首映式，邀请了郭秀仪参加。在电影尚未开演之前，忽然，现场想起了热烈掌声，人们纷纷站立起来。郭秀仪也随着大家起身鼓掌，这才看见是周恩来总理也来观看影片。

“周恩来看见了郭秀仪，相隔很远，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对郭秀仪说：‘琪翔好哇？替我问候他！’使郭秀仪感到特别温暖和欣慰！觉得周恩来在那样繁忙中，仍然时刻关心着他们。”¹许多美协的人都不认识郭秀仪，于是侧过脸来看她，听了周总理喊了黄琪翔的名字，才知道她就是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

新中国成立之后，拥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安居乐业了，经济发展形势也蒸蒸日上，于是解放台湾的问题再次成为全中国人民关注的热点。

1954 年 12 月，黄琪翔发表告台湾旧友公开信：《不忍心老友走上没落死亡的道路》。他说：“国民党陆海空军将士们：自从大陆解放，你们逃到台湾以后，我们彼此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思想感情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我偶然想起你们，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我眼看着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竟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跟着卖国贼蒋介石走上没落死亡的道路。古人说得好，‘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这道理是容易了解的。我深恨蒋

1 《黄琪翔传》p158。



1956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来宾休息室陈毅与（左起）郭沫若、李济深、黄琪翔、史良、董必武合影。

介石为害中国，也深恨蒋介石误了你们！”¹

黄琪翔在这封公开信里分析说：“我们自从出了学校大门以后，三十年来，初而做了北洋军阀的工具，革命把我们火坑里救了出来。后来参加过大革命，参加过内战，也参加过抗日战争。时代是伟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过救国救民的抱负，立志要把国家搞好。可是，无情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不管你做的什么好梦，总是做不成的。相反的，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确是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终于，你们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对于这点，我是深为你们可惜的。”²

最后，黄琪翔呼吁：“现在，解放台湾的号召发出来了，历

1 原载 1954 年 12 月 23 日香港《大公报》。

2 原载 1954 年 12 月 23 日香港《大公报》。

史重新给了你们一个选择和考验的机会：作殖民地的奴隶呢，还是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糊涂到底死，还是及早回头？为蒋介石和美国而死呢，还是自寻生路？是非成败，是清楚的。流芳遗臭，也是清楚的。何去何从？你们必须认真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和我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取得联系，我们愿意等待最后的一分钟。祖国在向你们招手，你们赶快举起义旗归来吧！”¹

1956年2月4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黄琪翔作了如是发言。黄琪翔说：“对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我也想谈一下。我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之下，周恩来主席²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适时的，实事求是的。如果有人以为这只是一句话，值不得重视，那就只能说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面前是一个瞎子。在这里，我要对在台湾的那些对祖国还抱着善良愿望的旧朋友们讲几句话：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巨人般的姿态，勇敢地、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景象，也是任何拿旧眼光来看中国问题的人所永远不能了解的。根据六年来的建设成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任何力量都阻挠不了，不出十年，中国必然以繁荣富强的大国出现于世界舞台。而你们呢？请问还有什么前途？难道还真能打回来吗？这简直等于痴人说梦！作为一个叛徒老死台湾吗？那是可悲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奉劝你们，头脑冷静下来，想一下；想一想过去，想一想现在，也想一想将来，何去何从，道理就很明白了。在台湾的旧朋友们，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迟早是一定要解放的，祖国人民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周恩来主席又宣布了十分宽大的条件，这是你们脱离绝境回到祖国的最好机会了。希望你们下定决心，莫再迟疑，在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斗争中立下最后的功勋。”³

1956年9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黄琪翔作了对台录

1 原载1954年12月23日香港《大公报》。

2 自1954年起，周恩来连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

3 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黄琪翔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音讲话。他呼吁身在台湾的老同事、老部下以及亲朋好友们，能够认清现实，顺乎历史潮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大陆对台湾进行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当初，蒋介石于1949年败退台湾后，令美国甚为失望，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不予蒋保护”。蒋介石惶恐不安，非常担心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美国人视之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便将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为台湾壮胆，于是蒋介石进攻大陆的想法忽然膨胀了起来，他开始整编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二十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多的兵力，其中金门、马祖两座岛上就驻有正规军6万余人。随后，两岸的军事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

为了配合对台湾的军事打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设了对台湾广播的电台频道，还设立了福建前线广播站。中央统战部、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相关人士作对台的宣传工作。他们的讲话录音，以及文章、书信通过无线电波，飞越海峡。

黄琪翔曾是国民党军队的著名将领，也应邀参与了这一工作。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曾说：晚年的黄琪翔十分惦念身在台湾的旧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思念越发强烈。黄琪翔真心希望大陆与台湾能够和平统一，并期待旧友重逢的那一天。他惦念的台湾旧友中肯定包括陈诚。陈诚当时已经是台湾的“副总统”，权利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陈诚那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有一天，白崇禧在台湾遇到“副总统”陈诚，见他红光满面，就客套地赞誉他的身体好。陈诚说白崇禧在医学上是外行，并坦诚自己的“肝有毛病。”

台湾方面也十分关注身在北京的黄琪翔的一举一动。1957年3月，北京召开“两会”期间，黄琪翔作为政协委员，谈到了西藏问题。黄琪翔说：“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即使在现在他们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各民族间的团结。”这次谈话，

台湾媒体立即予以转载，并据此推断说：黄琪翔“虽没有说明所谓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在西藏如何从事破坏，但已承认了这一事实的严重存在。”¹许多身在台湾的旧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新闻报道，了解了黄琪翔的近况。

1963年12月，陈诚因病辞去台湾一切职务。1964年3月，他再度当选“副总统”，于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北去世，终年67岁。

陈诚去世，黄琪翔没有发去唁电寄托哀思。因为那时他已是摘帽“右派分子”，还在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与改造。

1 1957年3月31日台湾《大华新闻》第一版。

七、整风运动

黄琪翔真诚敬仰共产党，期望自己能够与其肝胆相照，思想上当然要紧跟形势，因而他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对中央的各项政治部署，都积极响应，迅速配合。但社会在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层出不穷。

1955年5月31日，黄琪翔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必须严肃处理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文章。

客观地说，黄琪翔不熟悉文化战线，即使与郭沫若、老舍等文人有交往，也仅限于私交而已，并不了解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真实情况。他之所以发表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种政治态度。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光明日报》，随后即被《人民日报》转载。但在不久之后，黄琪翔针对胡风案件进行反思，曾私下与他人说：“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小题大做。”¹

1956年2月5日，黄琪翔在公开的场合里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问题。他在全中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中说：“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这在今天，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问题是已经解决了。但是，也无庸讳言，能认识这条路，能走上这条路，不是不需要经过斗争的。我们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多人，

1 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4版。

过去是曾经想替国家做点事的。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掌握着真理，凭主观愿望出发，自以为是，这就使得行动常常走弯路，碰钉子，甚至迷失了方向，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上去，结果许多善良的愿望，终于不免成为幻想，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有通过斗争，只有在真理指导下的行动，才能使善良的愿望变为现实。”接着，他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讲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及邓演达牺牲等往事，说明：“血的教训使我们清醒了过来”，那就是“只有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后，才能在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有益的作用。”最后，黄琪翔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光荣的任务。”¹

黄琪翔的这篇讲话，语气是在帮助、鼓舞知识分子，因为他已经感受到当前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事实上，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1956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最为心花怒放的一年。中国各级民主党派集中了众多高级知识分子。据统计，当年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大约10万人，其中四万二千人在高校。这种状况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²国家决定要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不能忘记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常常被作为改造的对象，他们头上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中共中央对待知识分子这一政策在这一年里得到了改变，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便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国家的宝贝，开始受到重点照顾。“知识分子无不惊喜交集，奔

1 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2 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中国那些年（1949—1978）》，p149。

走相告，以为从此就可以告别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真的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了。”¹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经中共中央确定后，便成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举行报告会，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进行全面的阐述。

这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声春雷，所有人都为之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历史上著名的“大鸣大放”由此拉开序幕。

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毛泽东还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崇拜由来已久。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1908—1966）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在1957年3月18日是这样给儿子写信的：“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黄琪翔为提升自己思想修养，花过大力研读《毛泽东选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在《深切怀念黄琪翔同志》一文说：“黄

1 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中国那些年（1949—1978）》，p149。

琪翔同志勤奋读书，对马列经典著作作了系统的研究，并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形势。对此，黄绍竑对我说，实为吾人之所不能。”

1957年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黄琪翔被选举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至此他不再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职，而是专职主持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工作。

在黄琪翔专职从事民主党派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就赶上了“大鸣大放”。黄琪翔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他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文件，并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讨论了当时的局势，感到了时代的召唤。

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认为：眼下正是壮大民主党派的历史机遇，主张要大力发展组织，动员医药卫生、工程技术、文教、农业、文艺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组织，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才华。副主席黄琪翔赞成这一观点。副秘书长李伯球积极行动起来。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共产党内的一些干部对此怀有抵触情绪，毛泽东还在党内做思想工作。他对干部们表示，知识分子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我们不要太紧张，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不要太紧张，太紧了，知识分子就会疏远我们，松一点，知识分子就会向我们靠拢，有利于改造。他认为，过去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太紧了，现在要松一点。

沈沛霖回忆说：“毛泽东号召党外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所谓‘内外夹攻’之策。一语既出，使各界人士，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精神为之一振，誉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在随后召开的各级各类座谈会中，各界人士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对执政党之党政、党群关系，及经建、

法制，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偏差与失误，提出了大量切中时弊的意见。”¹

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如下发言，在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为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民主党派立即行动起来。

1957年6月12日，黄琪翔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的文章。

他写道：“整风运动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提出来的。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怀着兄弟般的热情和敬意来参加这一运动。我过去不是对共产党没有意见的，也曾或多或少地提出过。现在，当共产党虚心地正式要求我们批评的时候，我反复地考虑过应如何认真严肃地来对待这一问题。”

“到现在为止，在大鸣大放中，揭露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是不少了。例如涉及到制度的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如何协调党政关系问题、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人事问题等等。大多数的意见，是在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不矛盾、不迷失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原则之下提出来的，我乐意地加以分析研究，得到了不少知识。”

他在最后写道：“以前不敢鸣的现在鸣了，以前不敢争的现在争了，这是一种好现象。为着阐发真理，明辨是非，越是好朋友，越要争辩，越争越进步，越争越团结，面红耳赤，也不要紧。只有能把面子问题摆在一边，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我衷心希望整风运动继续健康发展下去。”²

然而在这个百花齐放、大鸣大放的年代里，国画大师齐白石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

1957年1月，齐白石受了点凉，医生为他做了诊治。老人食

1 沈沛霖《沈沛霖回忆录》，p324。

2 1957年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第2版。

欲不振，记忆力急剧衰退，走路很困难，睡眠也开始多起来。

5月，毛主席派秘书田家英和陈伯达到家中探望齐白石，他头脑还清楚，希望自己身体恢复后，能够与毛主席合影留念。当客人走后，齐白石老人激动地说：“毛主席太看得起我了！”

5月15日，北京画院成立，聘请齐白石担任荣誉院长。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闻知齐白石身体欠安，常常来看望老人。

初夏的一天早晨，白石老人没用别人搀扶就从卧室走到画室，像往常一样，挽起袖子，先看了看准备好的工具，又仔细挑选了一支大笔，接着用手摸了摸纸，分辨出纸的正反面，然后提起笔，对着纸想了许久，小心翼翼地蘸了洋红。站在旁边的人看到老人用大笔沾着洋红，马上明白他要画花中之王牡丹了。这幅《牡丹》是白石老人一生中最后一幅作品。¹

白石老人一生中最后的作品《牡丹图》是为谁画的？作品上题款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白石老人绘制的这幅《牡丹图》，就是为他晚年最得意的弟子郭秀仪画的，但是，白石老人还没有来得及题款就去世了。

黄琪翔的诗作里清楚地记录了这件事。他的原诗如下：

《忆齐白石老人》

七绝四首，七律一首，为题白石未完牡丹画稿而作。

黄琪翔

一

何幸逢君一代奇，声名金石画书诗；
天香百岁留遗爱，一片红心待接移。

二

曾是尊前学画时，几篇珍稿带温词；
淋漓点滴涓涓汗，难忘当年老画师。

三

1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0 年 1 月版吕立新《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p208。



黄琪翔夫妇陪同齐白石看画展。

518

未完画稿待临池，怕忆阶前话别时；
再见叮咛犹在耳，乱真不复命名题。

四

岁末寻师惜已迟，不题红叶画红旗；
星塘弟子多能手，大胆知我郭秀仪。

（白石号星塘后人，又号寄萍堂老人。白石老人曾以“好大的胆子”题秀仪画上）

五

寄萍堂上有书诗，金石铿锵画更奇。

绿菜蓬蓬舒正气，红花朵朵待扶持。

百年海内声名远，一别庭门色相离。

最是华章惆怅对，斯人如在早题词。（何故不题词）

黄琪翔《忆齐白石老人》这一组诗，写于1957年的年底，因为诗中说明是在“岁末”去“寻师惜已迟”。后来，黄琪翔在另外一纸上重新抄录“何幸逢君一代奇”诗中，把“一片红心待接移”的“红”字改为“丹”。并加注道：“齐白石为秀仪画牡丹，未成而溘然长逝。检读遗稿，不禁怆然，因占上绝。”

1957年9月16日下午4时，齐白石被送进北京医院，6时40分与世长辞。17日，齐白石老人的遗体入殓，按照老人的遗愿，把两方印着齐白石籍贯、姓名的印章和一根他用了30年的红漆手杖一同装进杉木棺材里。

9月22日，周恩来总理及首都400多人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的公祭，随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齐白石先生下葬在北京湖南公墓，与他的继室胡宝珠女士永久为伴。

八、著名的“右派分子”

1957年5月，包括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正当他们兴高采烈“鸣放”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但是，他们仿佛患上了夜盲症，根本没有察觉出苗头来。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¹毛泽东指出：“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他们反对扣帽，这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和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就是人们所说毛泽东所谓“引蛇出洞”、“阳谋”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原标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为1957年5月15日。此文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的由来。¹

5月2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尚未在党内下发之际，上海一个笔杆子姚文元（1931—2005），就已经从新华社发布的一条很短文稿中嗅出了“反右”的味道。这一文稿只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即：“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人民事业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之言论都是错误的。”6月10日，姚文元写就呼应文章《录以备考》，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第三版小角落里。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姚文元，并替他壮胆，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发表在6月14日《人民日报》上。于是乎，姚文元废寝忘食，在半年之内接连发表了五十余篇反右文章，成为天下闻名的“反右英雄”。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两次夸奖姚文元，因为他的文笔和思路令自己满意。²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兼任《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开始被批判。章伯钧成为了中国“头号”右派分子。

1 沈沛霖《沈沛霖回忆录》，p326。

2 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中国那些年（1949—1978）》，p177。

至此，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很快成为风卷全国的政治运动。

6月13日，章伯钧已经感觉到自己摊上事了，准备发表公开的检讨书，于是悄悄把黄琪翔接到他自己的家中，与他商量，并请他帮助自己来写检讨书。在数十年血雨腥风的交往中，章伯钧认为黄琪翔为人正直，值得信赖。

黄琪翔没有拒绝章伯钧的请求，他决定向这个“头号”右派分子施以援手。黄琪翔回忆说：六月“十三日夜里他（章伯钧）把我接到家里去，说有人告诉他形势紧张，应该赶快做检讨，以免农工民主党受影响，并且要我帮助他。当时我知道他思想上还不通，没法检讨，但又认为他表示承认错误是好的，‘堡垒’投降（章伯钧自己说的）也是好的，因此我没有拒绝帮助他。”¹章伯钧的这篇文章《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发表在1957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

到了第十天，6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黄琪翔署名文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从口气上看，这是一篇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企图划清与其主席章伯钧关系的文章。

该文写道：“读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感到格外兴奋。因为，我们正在与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而这篇讲演正是我们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章伯钧的言行是毒草。在过去，许多同志都不能识别，有些人还甚至认为是香花。因为识别不出是毒草，章伯钧就在农工民主党内散布了不少毒素，留下了许多错误的影响。这对农工民主党来说固然是一个损失，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他还说：“这场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因为农工民主党有过章伯钧的中间路线的影响。今天还不能说这种影响在某些同志的脑袋里已经不存在。不要‘讳疾忌医’。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既要承认我们的弱点，也要有

1 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

克服弱点的信心和决心，在不断克服弱点、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对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同志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克服任何社会主义建设前进中可能碰到的困难。”

在严峻形势下，这篇文章的基调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章伯钧已经被点名成为了中国“头号”大右派分子，黄琪翔只是说他“留下了许多错误的影响”，而非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也只“承认我们的弱点”。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名为“7·1社论”说：“党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是‘阳谋’”。右派分子“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将反右运动推向高潮。7月，毛泽东又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推动全党全民全社会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说的“阳谋”，至此进入攻城拔寨的阶段。

《人民日报》“7·1社论”发表时，罗隆基当时还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正在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¹会议结束后，回到国内昆明第一站，罗隆基就看到了“7·1社论”以及章伯钧在中国农工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

章伯钧已经承认了“章罗联盟”，这令罗隆基无比气愤，他立即愤慨地给章打来长途电话，对章大声叫嚷：“报纸说你我联盟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跟我说清楚，你什么时候和我联盟的，又是怎样联的？”章听罗的质问，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

1 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于1948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所建立的保卫和平组织。1949年4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有72国的代表参加，选出了常设委员会，大大推动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的柏林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要求五大国（美、苏、中、英、法）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达6亿多人，其中中国有3亿多人签名。本次会议上，李时珍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62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63年，齐白石先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说了一句：“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你回来再谈。”罗隆基回北京后，去了章伯钧家，大闹一场。罗隆基并把自己的手杖当场折断，表示决裂。¹

最初，对章伯钧的批判会在农工民主党内举行。黄琪翔回忆说：反右“运动开始后，在农工党内对章伯钧进行批判的时候，我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也不能理解。我错误地认为他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他恨不起来，相反的，对他还有同情。因此我强调对章伯钧的批判，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要治病救人。这充分表现出我的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章伯钧共穿一条裤子。”²章伯钧之所以“当选”中国“头号”右派分子，与他1957年5月21日下午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所说的“政治设计院”有直接关系。

关于政治设计院，章伯钧是这样说的：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³

黄琪翔坚决否认听说过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以及自己参加了这个组织。他说：章伯钧“什么‘政治设计院’‘两院制’的反动主张，我是不与闻的，但他主张民主党派的‘恶性’大发展，我是赞成的，并且也为此做了些罪恶工作。李伯球在北京市委搞大发展，并且大点其火……我也是亲自参加过他召集的黑会的。”⁴

黄琪翔是位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做不出落井下石事。他虽然对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他毕竟不是能顺应形势发展的政

1 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王健文章：《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以及章诒和《赵是崎岖越平坦——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4 黄琪翔《我的自述》。

治家，也不懂得明哲保身。

首都民主党派等单位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了公开批判章伯钧的大会。这个大会本来是由黄琪翔主持的，可是，革命群众对黄琪翔对待章伯钧的温和态度十分不满，引起了愤怒，结果把主持人黄琪翔也轰下了主席台。黄琪翔说：“在和平宾馆的一次批判会上，最初是由我主持的，后来因为群众对我包庇章伯钧的态度表示不满，终于使我不能不从主席台上退了下来。”¹

7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新华社的长篇通讯，其标题是：

肩题：人民代表谈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主题：接受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

副题：费孝通储安平向人民请罪，毕鸣歧黄琪翔龙云

作自我检查

文中报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7月13日）分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黄琪翔交代和批判了他同章伯钧的关系。”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黄琪翔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标题是《请求人民的宽恕——黄琪翔的发言》。黄琪翔被迫做了检查。

黄琪翔在发言中说：“我在农工民主党的职务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和章伯钧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对此愿意彻底交代和批判。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他说：“章伯钧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出来并且受到了严重的谴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只是思想问题；大家批判，我也批判，实际上是不愿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不但如此，我因为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对人民没有真爱，对敌人也就没有真恨，所以就想替章伯钧解脱，以为这样才算个帮助‘朋友’；因此揭发也好，批判也好，根本上软弱无力，令人不能忍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在农工民主党内负有了领导检查章伯钧罪行小组的工作，显然是不相称的，工作方法也不可能不是错误的，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指责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我在此表示接受群众对我有益的教训。”

他说：“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绝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情，而绝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更愿意永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

通读了黄琪翔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检查，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黄琪翔在反右运动中把矛头对准了自己，始终在检查自己，而非是揭发他人。比如，在整风期间，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组织的座谈会，是到处点火“大鸣大放”的罪行，“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黄琪翔是被邀参加的，而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则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负责人。黄琪翔在揭发的材料上没有提及。

两天之后，李伯球同样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的讲话。¹

此后，黄琪翔不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问题，而是他也

1 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第10版。

跌落进深渊。还是在公开批判章伯钧的北京和平宾馆，黄琪翔重新站上了主席台。这次再也不用他来主持会议了，因为他本人也成为被批判斗争的对象。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的文章，标题是：

农工民主党又揭露出一个首要的右派分子

黄琪翔是章伯钧的“副帅”

该报道说：“在26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扩大会议，撕破了右派分子黄琪翔两面派的假面具，揭露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及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农工民主党内组织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黄琪翔的罪名已定：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内首要的右派分子，是中国头号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副帅”，与章伯钧、李伯球在农工民主党内组织了右派小集团。

黄琪翔加冕“右派”的罪行还有：他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明证”。¹再则，他热心于农工民主党的“恶性”大发展，²以及对章伯钧的同情。³

除此之外，黄琪翔成为右派的罪名还有他公开批评社会主义

1 毛泽东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王健文章《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中写道：1980年6月27日，民盟举行中常会，传达《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文件中说，民盟所谓“六教授”等右派问题均予改正，恢复名誉。对章伯钧、罗隆基未予改正。文件中说明：“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民盟中央在1957年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的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对反右派问题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正确的”，问题就是“扩大化”了。1982年11月15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农工民主党中央联合举行了章伯钧的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1985年11月11日，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在政协礼堂举行章伯钧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出席并讲了话，肯定了章伯钧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的“老大哥”苏联。而在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是批评不得的。还记得当年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新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还是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克隆着苏联人。甚至，“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都成为了年轻人的理想。

8月1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名单”。至此，章伯钧、黄琪翔被彻底排除出领导班子。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其标准是：“（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阴谋分裂人民的团结。（5）反革命小集团。（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提供帮助，泄露革命组织的机密。”¹

黄琪翔就这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遭遇到大会的批判，同时，他还要时不时地经历软硬兼施的折磨。可是，黄琪翔的内心是倔强的，他一直在抵制反右运动，具体的表现就是他采取了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给予我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我思想上没有接受教训。1958年我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是迫于形势不能不去，我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没有信心。我小心谨慎，念念不忘于当时的所谓三不得，即共产党反不得，社会主义反不得，右派当不得。我对思想改造，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而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今后不要再犯错误，至于要怎样才能不犯错误，我就不求甚解。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甚至对于当时已经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亦觉得无动于衷，认为国家大事，与我无关。”²

1957年7月，黄琪翔因为自己的所谓错误言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迫检讨。³可是他依然想不通，为什么

1 《中国那些年（1949—1978）》，p268。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p216。

“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愈激烈”？而他认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并不激烈，重要的还是发展生产”。他认为从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来看，人们在鸣放中是根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来的意见，是善意的。黄琪翔的精神很苦闷，身体一下子消瘦了许多。

显然，黄琪翔是一个比较“顽固”的右派分子，从新闻报道中看，他直到1957年的年底，才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文章，标题是：

顽抗四个多月仍然混不过关

黄琪翔终于承认章黄李右派集团阴谋活动

报道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在12月中旬连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黄琪翔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右派分子黄琪翔自从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真面目在今年7月被揭露以后，四个多月来一直负隅顽抗，拒不交代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企图蒙混过关。经过扩大会议的连续斗争，黄琪翔在他的两面派手法被彻底揭破以后，终于不得不承认被揭露的一些罪行和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表示愿意重新做人。”

报道说：“会议揭露出来的许多事实说明，黄琪翔是一个极端狡猾的善于使用两面手法的右派头子。他极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捏造出所谓‘民主人士难以在政府工作’的谰言，并说这‘是制度问题’。他假惺惺地说‘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接着却说：‘也要给人民实际的东西，目前活不下去，就会有问题’。他还说：‘现在是有不愉快，包括政治工作文化生活方面……工作好像是被迫似的，

非这样生活不可’。他经常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黄琪翔反对苏联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后出兵，并且硬说揭露美帝国主义在匈牙利进行颠覆活动‘是不公平的’。黄琪翔反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他污蔑中国现在不民主，并攻击人民对敌人的专政。他认为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小题大做，‘肃反运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了一点事就到处了解没有必要’。”还说：“黄琪翔在那次检讨中恬不知耻地说是他‘二十年间，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黄琪翔是一个军阀。长期依附陈诚。”

报道最后说：“黄琪翔在这次扩大会议开始的时候，态度表现得甚为恶劣。他虽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是无法掩饰的，承认章黄李右派集团是存在的，但却不交代具体事实，还采取了狡辩抵赖的态度，这些都引起了与会群众极大的愤慨。”

黄琪翔终于无路可走，他和大多数右派分子一样，只能低头认罪。这一年，黄琪翔正好 60 岁。

他的好友李以劭将军总结说：“在国内（50 年代初）进行三反五反斗争中，黄老（黄琪翔）安渡难关，未及树立改造自己的观念，世界观未变，警惕性较差。一九五七年，中共在整顿工商界、反革命分子肃清和改造社会后，继续改造知识分子，党内外、军政界、文化界人士的反右斗争中罗列几十万个右派，黄老被列为右派，接受作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备尝社会主义的艰难与批斗之苦。”¹

黄琪翔在思想上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他想为自己辩白，那是徒劳的，因为没人允许他辩白；即使能辩白，也绝不会有人相信他的肺腑之言。个人是渺小的，组织何其强大。大概直到这个时候，黄琪翔必须明白该来的灾难你是逃脱不掉的。

1 《传记文学》第 74 卷第一期，p54。李以劭文章《怀念黄琪翔将军及简述闽变经过》。

他说：在针对自己的批判大会后，“我思想上更是（想）不通。当时，某某人是农工中央的整风办公室主任，他对我表示关怀。他一方面要某某人和我通声气，多方安慰，并表示可以送资料给我看，引起了我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他又派某某人到我的家里来，说是‘帮助我’，要我交代反社会主义罪行，这更引起我的反感。我以为我既没有通敌行为，也没有参加反动组织，即令我有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也不属于敌我矛盾范围。”¹

郭秀仪回忆说：“1957年，‘反右’斗争中，琪翔被错划为‘右派’，思想上困惑，精神上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信给周恩来同志，倾诉内心的痛苦。周恩来同志复信给他，要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考验，鼓励琪翔要坚强地生活下去。”²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建议，决定罢免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撤销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黄琪翔的行政级别由五级降为九级。

1 见黄琪翔《我的自述》。

2 《流金岁月》，p89。郭秀仪文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同黄琪翔和我的交往》。

九、天安门观礼

被“反右”巨浪打倒在地的国内知名人士，远不止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这几位。

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人张申府，“云南王”龙云，当年“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以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金宝善、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程士范、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曾昭抡、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雷天觉等，纷纷落马成为著名的右派分子。黄琪翔也许不知道，和他一样被打成右派的人，全国一共有 552973 人。¹除此之外，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的人还有，如“中右分子”216000 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9 万人。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²

黄琪翔在北伐时期的老部下、周恩来在法国介绍其加入共产党的老共产党员、时在北京工业大学担任教授的沈沛霖先生，幸免被封为右派冠冕，结果他的二个儿子均被打成右派。沈沛霖回

532

1 2012 年 4 月 12 日《快乐老人报》：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 年和 1958 年共划右派 552973 人，1978 年后“改正”552877 人，不予改正 96 人，其中中央级 5 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2 胡治安《回忆“摘帽办”：解决 55 万人问题》原载 2009 年 12 月《中国新闻周刊》。

忆说：“经过反‘右’运动之深挖后，至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工业大学）全院共有四百余教职工划为‘右派’，几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当时京工对这些所谓的‘右派’的处理办法分为六类：一、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销原职，另行分配；五、降职降薪；六、免予处分。”¹这是中央制定的处理‘右派’方法。对照黄琪翔被处理的结果，黄琪翔符合第三、第四、第五条，即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职降薪。相对于那些因被打成右派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来说，黄琪翔显然还算是幸运者。

黄琪翔至此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看似只有四个字，确实重有千斤。在这样一个标榜燃情岁月里，人人都在口口声声大谈理想和精神，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去明辨是非。迎接那些“右派分子”的目光，绝大多数是鄙视，是愤怒，是仇恨。从科学的角度说，毒舌是毒不死人的，再凶悍的眼神也压不死人，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它们可以摧毁人们生活的意志，使之心理不堪重负。许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自尽。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值得留恋。

黄琪翔冤屈难申，当然会苦闷不堪。好在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位坚强而体贴的妻子郭秀仪，于是家庭就成为他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湾。

被戴了帽的“右派分子”黄琪翔，依然相信共产党，从未说一句对共产党不满的话。²甚至，当他看到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现象时，仍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要讲真话。

大跃进期间，黄琪翔去徐水、安国两县参观。看到人民公社在大搞“小、土、群”炼钢铁时，他又忍不住了，提问说：“按照列宁电气化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与我们有所不同。用小、土、群火炼钢铁，和新型钢厂的生产，也大不相同。这两者之间，究

1 沈沛霖《沈沛霖回忆录》，p328。

2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应如何区别？”弄得接待方很尴尬。

在河北香河县参观人民公社时，当地书记郑重其事地介绍养猪女饲养员用自己的乳汁喂猪，并十分自豪地称赞这位饲养员的革命觉悟之高。唯独黄琪翔当面提出异议。他说：“此事不宜宣扬。外国人正污蔑我们人畜不分，我们何必授人以柄！”¹

他的许多朋友听到黄琪翔这番言论，都在暗地里替他捏一把汗。

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后，海外媒体立即进行了报道。1958年1月2日《天文台》刊登特稿《黄琪翔被翻旧账》，报道说：“共党于（1957年）12月中旬在北平连续举行三次大会，对靠拢分子黄琪翔进行围剿。黄琪翔现在是‘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他和这个中共尾巴党的‘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李伯球同被共党称为‘章黄李右派阴谋集团’。”《天文台》的政治倾向台湾国民党，因此对大陆持攻击态度。该报道还说：“在12月18日斗争黄琪翔的会议上，共党找出一张1938年6月18日的汉口《大公报》，上面有黄琪翔的一篇论文《战斗与中国》。文中攻击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并称赞蒋委员长是全世界人士共同崇敬的一位东方巨人。共党根据这篇20年前的文章，断定黄琪翔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分子’。这种入人以罪的手段显然是蛮不讲理的，如果这种逻辑是合理的话，那么首先应当封闭《大公报》，甚至清算毛泽东，他在重庆也喊过蒋主席万岁。”可见，反右运动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事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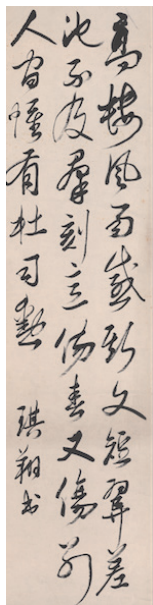
郭秀仪亲口告诉干女儿张新荣说：“你干爹被错划右派后，精神非常苦闷，极少出门，是为了免遭冷遇，所以断绝了与同事、亲友的一切联系。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反而是中共的一些老朋友，如贺龙、陈毅和习仲勋等人，时常来电话问候。尤其是习仲勋同志，还数次来家里看望，让我们非常感动。”²

此间，黄琪翔很少出门，时常在家铺纸研墨，练习书法，以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41-42，章师明文章《敬佩与怀念》。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黄琪翔行草作品：李商隐《杜司勋》诗。



排解内心的苦闷。他曾对郭秀仪说，我们今后就以你的绘画和我的书法共度余生吧。黄琪翔留存至今的行草作品《书李商隐“杜司勋”诗》，印证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深沉感慨。《杜司勋》诗，本是李商隐怀念杜牧的，抒发了诗人对昏暗时局的忧伤与不满。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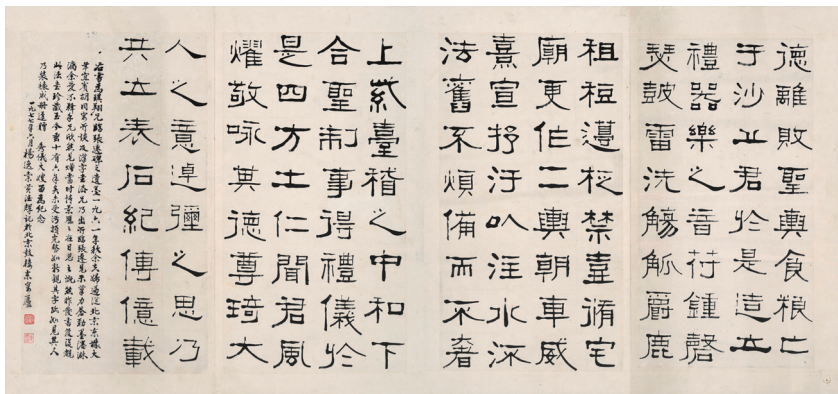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黄琪翔书写此诗，显然有借古喻今之意，伤春怀旧之情，以及表达了自己跟不上时代发展脚步的落寞与无奈。

命运有时像个神秘的魔坊，在不经意间，黄琪翔经历了一次人生的黑色幽默。

1957年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有几条。他的秘书王大鲁说：“我记得他曾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观点在他的思想上是明确的。孰料这竟成了他以为被错划为‘右派’的一条‘罪状’。”¹另一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65，王大鲁文章《感激与怀念》。



黄琪翔晚年的书法作品。

项罪证就是他批判过苏联“老大哥”。那时候，中国人最喜欢唱的是那首浪漫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暗喻着中苏两国和人民的“爱情”天长地久。

可谁又会料想到呢？一年之后的1959年，中苏之间的关系忽然发生了转变。就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分歧主要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以及中国是否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主动释放在押的美国犯人等问题。¹ 赫鲁晓夫还抱怨中国，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事前没有通知苏联；同年，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的空战中，缴获美国的“响尾蛇”导弹之后，一直拖延着不提供给苏联，等等。虽然在争吵的最后，赫鲁晓夫提议，双方各自销毁会议记录，以抹去这段不愉快的记忆，但是，中苏关系的恶化趋势已经暴露了出来。

536

“1959年，黄琪翔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消息，黄琪翔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一年的国庆，他又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他接到通知后，兴奋得连连说：‘真没想到’，‘中央的政策真英明’。”² 此后，黄琪翔又连续当选

1 《中国那些年（1949—1978）》，p225。

2 《黄琪翔传》，p225。

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黄琪翔原先的秘书刘清云、韦佩云夫妇看到了《人民日报》，获悉黄琪翔被摘帽，于是写信来向他表示祝贺。12月11日，黄琪翔给他们复信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良好祝愿。两年多来，我在学习、改造方面获得了点滴的成就，终于最先回到光荣的人民队伍里来，这的确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大喜事！通过这次教训，使我基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在生活上也经受了一番严峻的考验。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是十分有益的。我决心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学习、改造，争取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以报答党对我的无限恩情。”黄琪翔在这封信中介绍说：“我患失眠症近两年，半年来逐渐见愈，体重亦完全恢复过来了，（比）过去体重减轻三十磅，问候你们好！”¹

虽然黄琪翔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来。因为他的问题仍然还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只是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来处理而已。“右派分子”被摘帽，与“右派分子”被平反是两回事。被摘帽后的“右派分子”，简称为“摘帽右派”，说明你曾经犯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六项“罪行”，只是因为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才使你摘帽。你还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做人，接受革命的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再教育。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共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1）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做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

1 刘清云、黄浩明编著《黄琪翔》，p236。

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2）现在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做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黄琪翔以戴罪之身，还能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新中国的十周年大庆。这是黄琪翔“兴奋得连连说：‘真没想到’，‘中央的政策真英明’”的主要原因。

尽管黄琪翔于1959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是他的内心依旧不能平静。

事实上，农工民主党当时的成员大约有7000人，其中有1266名党员被划为右派，最后改正了1265名，唯有一人不得改正，此人就是章伯钧先生。直到黄琪翔去世十周年之后，国家又对黄琪翔所谓右派分子的罪名进行审查。这一次，是给他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以历史清白。按照唯物论世界观的说法，没有天堂和地狱，人死如灯灭。死去的黄琪翔，不可能知道自己经受的冤屈已经在他身后得到彻底雪洗。长期从事统一战线领导工作的老资格革命家李维汉（1896—1984）后来反思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不幸的后果。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

1 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见《中国那些年（1949—1978）》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p268。

不幸。”¹

到了1962年初，毛泽东强调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黄琪翔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上时代的步伐，从1962年至1964年，都在刻苦学习。

黄琪翔“对于那时提倡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越烈，以及阶级斗争是促进经济建设的要素，这类问题老搞不通。他认为思想问题，并不单纯先靠领导的提示所能解决，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能够从客观实际结合理论来证明事物发展真相，即所谓理论与事实结合来说明问题，才能使人信服。”²

他越是真诚地想解开自己的思想疙瘩，越是纠结，终究也没有解开自己的思想疙瘩。他内心陷入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黄琪翔在自己的自我检查中说：“由于自己的阶级属性，害怕阶级斗争，认为‘无情打击’，不容置辩。”同时他又觉得“这些作风对一般知识分子是残酷的，不必要的。”承认自己“当严重阶级斗争到来的时候，就幻想赶快结束，抱着厌恶和逃避的情绪。尽管明知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残酷情势下，无可逃避的。”³

摘帽之后，黄琪翔的生活恢复了自由，但仍然受到社会的歧视。人家总会在他和他的家人背后指指戳戳，他自己也总觉得低人一等。当黄琪翔夫妇听说，老战友连瑞琦的女儿连德枝快要结婚时，夫妇俩决定悄悄前去探望。

连瑞琦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⁴，曾留学德国。杨虎城将军的儿

1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

2 刘清云、黄浩明编著《黄琪翔》，p239。

3 刘清云、黄浩明编著《黄琪翔》，p239。

4 连瑞琦（1898—1984），字仲玉，陕西人。他是我国现代的实业家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早年追随邓演达先生是创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早期积极参与者和领导人之一，与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黄琪翔将军感情深厚。1949年上海解放后，连瑞琦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上海医药工业公司副经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连德枝说她的父亲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在德国获得了药学博士的，只有我父亲一个！”

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长的杨拯民先生在《我的父亲杨虎城》中说：杨虎城热心教育事业，资助优秀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深造。

“早在靖国军时期，1921年他还曾资助过屈武、连瑞琦去德国留学。他（杨虎城）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曾说过当国民党的官，难免要刮地皮，我把刮地皮的钱，用于供给穷学生上学，绝不会错。”说明连瑞琦去德国留学，是由杨虎城将军资助的。连瑞琦回国以后，一度成为杨虎城的助手，积极帮助和参与了杨虎城的许多政治工作。

连瑞琦在德国获得了药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胡佩芬是一位医生。早在连瑞琦与妻子胡佩芬在德国结婚之后，黄琪翔夫妇当面与连瑞琦、胡佩芬夫妇指腹认亲。郭秀仪说：“佩芬，你要生的是儿子，就是我们的干儿子；你要是生的是女儿，就是我们的干女儿！”果然，生的是女儿。她就是以后成长为新中国少年儿童十分喜爱的儿童剧表演艺术家连德枝女士。

连德枝于1938年出生在德国的维斯伯尔，回国后在上海读书。1953年连德枝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儿艺。她在上海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叫雷有余，考取了清华大学，专攻工程化学。这个叫雷有余的同学，后来就是连德枝的丈夫。

连德枝结婚那一年，年纪25岁，时在1963年。那时黄琪翔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不佳，所以郭秀仪精心挑选了一幅书画作品《荷花鸳鸯》，作为赠送给干女儿连德枝、雷有余夫妇的新婚礼物。这是一幅立轴，系郭秀仪与其老师溥雪斋合作的作品，尺幅约为3平尺，画面是一对戏水鸳鸯，背后是盛开的并蒂莲花。题款为：“德枝、有余婚礼志喜，秀仪作画、雪斋题。”

连德枝回忆说：“1963年我结婚前几天，突然接到干妈来电话，说她和干爹要来剧院看我，因干爹要出差，决定提前来祝贺。二老在百忙中还惦着我的婚事，令我又惊又喜。干妈还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们，竹帘上画着一对鸳鸯在戏水，一旁是盛开的并蒂莲……这幅画我一直保存了36年，‘文革’中，我把它藏在箱底，免遭劫难。如今这幅珍贵的画卷，依旧挂在我卧室的床头。每当

夜晚入睡前，或清晨起床时，我都要凝视片刻，仿佛它会给我带来好运，使我一生平安。我将在心里永远铭记两位老人对我们的祝福。这珍贵的结婚礼物，将伴随我们度过幸福的晚年。”¹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来到北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看望连德枝，干女儿当时正在宿舍里。她的宿舍在剧院后面一幢小楼里，一个狭小而整洁的房间。

郭秀仪说：“德枝，你干爹过两天要外出，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今天特意来赠送一幅画，祝贺你的新婚之喜，希望你们能够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连德枝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成就卓著。1956年她在著名童话剧《马兰花》中成功扮演小猴一角，荣获首届全国话剧汇演表演奖；1960年获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称号；1981年获文化部表演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及金质奖章。

不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习仲勋并没有忘记他的民主党派老朋友，他还邀请了黄琪翔夫妇去欧美同学会的文化俱乐部吃饭、跳舞。张新荣后来对郭秀仪说：“那天是黄绍竑伯伯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当时我没有想到您们也去了，原来是习仲勋邀请的您们。”²张新荣当时也是“右派分子”，受到习仲勋同志的款待之后，非常高兴。她后来感叹道：“这对于被整肃过的人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呀！”

1 《流金岁月》，p279。连德枝文章《伟大女性心中伟大的爱——记郭秀仪女士》。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十、李宗仁归来

1965年7月12日，已经极少参加公开活动的黄琪翔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要他于当日上午11时参加一个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

黄琪翔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看见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黄绍竑、朱蕴山、刘斐、覃异之等十几位国民党时期的著名将领和知名人士。中共方面，除了周恩来总理之外，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那时，张治中将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这次会议是保密的。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李德邻先生要回来了，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要和诸位通报这个情况。”

大家一听李德邻要回国，一下子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李德邻就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解放了大陆全境。蒋介石退守台湾孤岛之前，李宗仁就已经出走美国。如今，蒋介石在联合国仍然占据着中国的席位，并打着中国“合法代表身份”的旗号，在国际舞台上保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而身为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此次回归大陆，不啻又给国民党扇了一记耳光。

在周恩来主持的通报会上，黄琪翔看看周围在座的人，大都

是与李宗仁有历史渊源的人。比如张治中将军（1890—1969），在1949年4月，他是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了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共产党阵营；再如覃异之，也是桂系的将领，在1949年8月与黄绍竑等一起通电反蒋后来到北京；刘斐虽然是湖南醴陵人，但也属于国民党桂系的高级将领，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抗战期间曾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

黄琪翔再联想到自己，当然也算李宗仁的旧属。在抗战时，李宗仁是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而黄琪翔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归属第五战区指挥，李宗仁是自己顶头上司。而且，李宗仁与黄琪翔的私交也不错，曾经表示愿意在战火熄灭之后，与白崇禧、黄琪翔等人一起归隐，住在一处，相伴到老。为此，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帮助下，黄琪翔夫妇购买了桂林房产。

李宗仁原是桂系的核心人物，与多谋善战、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合称为“李白”。除了李宗仁、白崇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巨头，就是在坐的黄绍竑将军。他们三人即所谓桂系的“三巨头”。李宗仁在军中发家，与黄绍竑将军有着直接的关系。1924年，李宗仁任北京政府“定桂军”总指挥时，黄绍竑率领部下千余人加入该部，使其实力大增。随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联合，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统一了广西。“新桂系”至此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¹

李宗仁与蒋介石是一对老冤家。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李宗仁是右纵队指挥官。俩人是拜把子兄弟，曾经互换金兰谱。可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俩人见面笑嘻嘻，背后动干戈，彼此都是对方的定时炸弹。

1948年4月国民党行宪以后，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暗斗再起，

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43位战犯的后半生》，p25。

最后李宗仁成功逼迫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总统宝座也被李宗仁取而代之。他们的矛盾一度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据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蒋介石曾经安排特务在李宗仁的身边，准备暗杀他。

李宗仁虽然当上了代总统，依然处处受到蒋介石的钳制。身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设立七部电台，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架空了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当时还幻想通过与中共“和谈”，来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期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和谈代表，前来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¹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统治自此寿终正寝。此后，李宗仁先后退到桂林、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进行顽抗。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灭，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已被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2月宣布的43位战犯中，蒋介石第一，李宗仁排老二，并且指出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李宗仁以胃病复发为由，从南宁乘专机飞赴香港，当天住进太和医院。12月5日，他携其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及下属十余人由香港逃亡美国。蒋介石数次派人要李宗仁去台湾，被其拒绝，原因是他害怕成为张学良第二！

身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仍然在与蒋介石较劲，不肯罢休。“李宗仁赴美不归，还占据着‘代总统’的名位，这让急需名正言顺复职重当‘总统’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台湾‘监察院’、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次次地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都被李宗仁一一借口回绝。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

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于1949年4月在北平进行的停火谈判。该年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团自南京飞抵北平。13日至15日，双方代表团进行了实质性磋商，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20日签字。20日，政府电告南京代表团拒绝签字。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谈判终告失败。

再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由蒋复职。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立即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公开指责蒋复职是违宪之举。其实李与蒋打交道数十年，明知斥责无济于事，但他偏要做出‘总统’的样子，不过是想保持一点尊严罢了。”¹李宗仁被剥夺了“代总统”名位之后，在美国当寓公，经常和当地华侨老头老太打麻将度日。他的邻居中有一位华侨画家汪亚尘，应邀教授郭德洁学习中国画。汪亚尘夫人荣君立是荣毅仁的姐姐。汪亚尘还教过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学习中国画。

李宗仁这次回国，中间有位神秘的牵线人，就是李宗仁当年的机要秘书程思远。1956年，李宗仁通过程思远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1956年1月31日，周恩来派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金尧如第一次去程思远在香港的家中，建立联系。程思远当时生活在香港，随后他应邀五次来北京，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商谈有关李宗仁的回国事宜。1963年5月，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了欧洲旅游四个月，目的是麻痹美方特务的监视。直到1965年3月，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回国。²6月13日，李宗仁离美赴欧。6月28日在苏黎世与程思远会合。台湾此时已经侦察出李宗仁回国的意图，于是紧急派人给李宗仁送来白崇禧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中共的情报部门也获悉，国民党见白崇禧的电报不能阻止李宗仁回国“投共”，准备在回国途径巴基斯坦卡拉奇时实施暗杀。蒋介石命令台湾保密局长张炎元说：“在两天内迅速侦知李宗仁的住处，如确定在大陆驻巴使馆，务须弄清他们所乘飞机之机型、班次、时间和航线，尽一切可能在他去机场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再来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³

1 《43位战犯的后半生》，p32。

2 《43位战犯的后半生》，p35。

3 《中国那些年（1949—1978）》，p297。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立即与该国外方联系，并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特别关照。7月14日凌晨3时，当李宗仁所乘坐的瑞航客机刚刚降落卡拉奇机场，巴基斯坦保安部的军警就登机，将李宗仁等三人领出机舱，并用警车立即把李宗仁送进中国大使馆保护起来。蒋介石暗杀李宗仁的阴谋至此流产。

1965年7月12日的北京，在周恩来主持的关于李宗仁回国通报会上，章士钊先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事情定了吗？德邻会不会转去台湾？”

章士钊的弦外之意是：李宗仁会不会以共产党的邀请为名，转去台湾，以此向蒋介石邀功，博取政治资本。

周恩来回答说：“李先生不会去台湾！但台湾已经发觉了李的行动，我倒担心台湾的特务会整李的。美国放李回来，说明美国有很多的胡思乱想。美国对一些旧人总是胡思乱想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还说，“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

周恩来还向与会者介绍了这几年来，中共与之商谈过程中对李宗仁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即“四可”、“四不”和“五关”。这就是中共对李宗仁回国的方针和政策。

周恩来说，“四可”是：在1963年就与李宗仁讲清楚了，第一，他到欧洲后，可先回美国料理些事情；第二，李宗仁回国看看，也可以回去；第三，李宗仁可以留在欧洲为祖国做些事情，经济上困难时我们可以帮助；第四，他如决心回来，我们欢迎。周恩来讲的“四不”是：请李宗仁（一）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要摆脱美国；（二）不插手台湾问题。周恩来说，“李说他没有做对不起台湾的事，这是真的。美国曾要把他送回台湾，他不去”；（三）在国共两党之外，不搞第三势力；（四）不负中美谈判使命，不作中美间桥梁。“五关”是：如果李宗仁要回来长住，还要过五关，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和思想关。¹

1 见中央统战部编辑、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版《李宗仁归来》。

李宗仁全部答应了。因为他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故土。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笑着和副委员长张治中打招呼，说：张治中将军回来时，我周恩来没有能亲自去机场迎接，而李宗仁回来自己要亲自去机场迎接，希望张治中不要有意见。张治中笑着说，没有意见！

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还介绍了李宗仁回国过程的一些情况。

1965年7月17日夜，在巴基斯坦的密切配合下，中国已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头等舱全部包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飞机，零时30分，这架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向夜色中的中国领空飞去。李宗仁夫妇一行从广州降落后，再转机飞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已经在上海等着他了……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周恩来亲自率领100多人的庞大队伍去机场迎接，其中有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还有李宗仁的老友和旧属，如卢汉、邵力子、黄琪翔、黄绍竑、刘仲容、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还有“末代皇帝”溥仪等。

李宗仁下了飞机，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机场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李宗仁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

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¹

李宗仁夫妇回国后，先是住在北京饭店，后来又给安排了一个宽敞的院落，即西总布胡同5号。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李宗仁。他俩的这次握手，极具历史意义。一位是已经下台的国民党代总统，一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李宗仁谈到身居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泽东还说：“你的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²毛泽东知道李宗仁在流亡海外期间，写了回忆录，提出想看一看。这本书就是《李宗仁回忆录》，由李宗仁口述，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撰写，但最初是英文版的，也还没有出版，所以李宗仁无法奉献。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走走看看。

毛泽东说欢迎蒋介石回来，不是随口说说的，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中共就已经与台湾的蒋介石有了联络。当时美国希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蒋介石虽然有求于美国，但他仍深明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有鉴于此，周恩来在1955年5月13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战争，二是和平方式。同时，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信，委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通过台湾驻香港的许孝炎带给了蒋介石。随后，蒋经国派其密友曹聚仁（1900—1972）访问大陆，多次与周恩来、毛泽东秘密会见。1957年，大陆开始反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反共复国的大好时机”，同时，台湾社会不稳，蒋介石决定加紧军事反攻，以转移岛内民众的注意力。美国见状大喜，中共为促使“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努力失败。³

李宗仁回国后，那些身在北京的旧友、旧属们纷纷邀请李宗

1 《李宗仁回忆录》（下），p795。

2 《43位战犯的后半生》，p36。

3 《中国那些年（1949—1978）》，p168。

仁吃饭。傅作义在家宴请时，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徐冰夫妇、卫立煌夫妇、黄琪翔夫妇、蔡廷锴夫妇、罗青长、平杰三、李金德、王克俊和董其武等参加。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三十分钟的倾盆大雨，可是大家都按时来了。董其武、王克俊都是追随傅作义于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将军。部队被改编后董其武没脱军装，参加了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董其武给李宗仁敬酒。李宗仁说：“我已老朽，自知回国也为统一大业做不了什么大事，解放台湾还要拜托董将军和克俊你们啦！”董其武答：“李先生回国之壮举本身就是一颗重磅炸弹，是对解放台湾、祖国统一的最大贡献。台湾军政要员们难道不想一想，当年的代总统都回国了，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周恩来接着对李宗仁说：“其武说得对，你回国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最大贡献。”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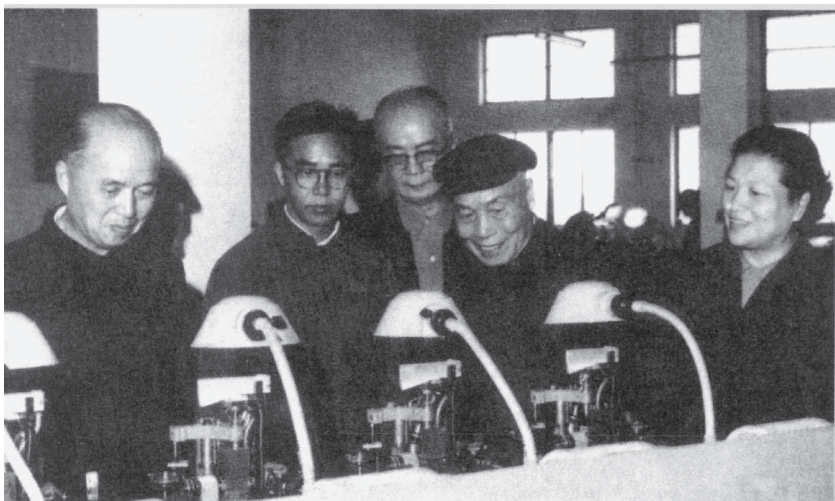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李宗仁先后三次去国内各地参观访问，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熟悉一下新中国的国情。第一次是1965年8月27日至9月19日，李宗仁夫妇去了东北参观访问。12月2日，李宗仁以个人名义在北京饭店举办回国答谢宴会。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夫妇第二次参观访问启程，去了故乡广西以及广东等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患乳腺癌发作，病情恶化，于是终止访问，于3月16日回到北京，进行紧急抢救。

3月21日，郭德洁（1906—1966）不治去世。1922年李宗仁部队驻防桂平时，经浔州水上警察厅厅长郭凤岗介绍，李宗仁认识了年方十六岁的郭德洁，并开始恋爱，至此走过44年的坎坷人生路。

李宗仁因爱妻郭德洁逝世而极度伤心，一时不能自理，因此在1966年5月上旬，中央又安排李宗仁去华东、江浙地区参观访问，让饱受丧妻之痛的李宗仁出去散散心，排遣情怀。陪同他第三次出访的人主要是李宗仁的故旧，其中包括黄绍竑、黄琪翔、

1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版《董其武传》（下），p900。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陪同李宗仁在上海参观。左起：金仲华、车间技术工人、黄琪翔、李宗仁和郭秀仪。

刘斐、陈此生、程思远等，黄琪翔夫人郭秀仪也陪同参观，她是这个参访团里唯一的女士。

黄琪翔郭秀仪陪同李宗仁出访，是周恩来总理点名安排的。程思远回忆说：“李夫人郭德洁女士逝世后，周恩来总理特嘱琪翔同志和夫人郭秀仪女士以及其他友好陪同德邻先生前往华东一游。那时回顾当年北伐、抗战，琪翔与李宗仁并肩奋斗，往事历历，如在眼前。”¹

参观团访问的地方有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抵达第一站南京时，就住在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山陵的行宫“美龄宫”。李宗仁这时才知道黄琪翔的夫人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是个画家。

晚饭后，大家闲坐聊天，李宗仁告诉郭秀仪说自己也是艺术爱好者，收藏过许多历史文物。1959年他自愿托程思远捐赠给新中国一批文物，总共12箱。想不到毛主席、周总理很客气，一下子给他汇来了12万美金。

这次参访活动，留下了许多历史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李宗仁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7，程思远文章《深切怀念黄琪翔同志》。



1966年，黄琪翔夫妇等与李宗仁先生在南京廖仲愷墓前合影。前排（右二）黄绍竑、（右三）郭秀仪、（右四）李宗仁、（左一）程思远；后排右起：刘斐、黄琪翔等。

551

在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1907—1968）的陪同下参观某工厂的精密仪器车间，照片上共五人，依次是金仲华、车间技术工人、黄琪翔、李宗仁和郭秀仪。

李宗仁的回国，最受打击的是身在台湾的昔日铁杆盟友白崇禧将军。1949年，白崇禧为力挺李宗仁出任总统，逼宫蒋介石，

要求蒋“总统毅然下野”，令蒋介石恨之切齿。可是在与中共交战中，白崇禧输得精光，最后被迫退守海口。就在此时，蒋介石在台湾来信邀请，并许诺“自有重用”。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飞赴台湾，从此再也没能离开这个孤岛。蒋介石一生二次（1927年、1949年）被迫下野，均与白崇禧在背后“捣鬼”有关，所以白崇禧逃到台湾，等于进了蒋介石的铁笼。白崇禧在台湾怎能舒心？台湾“国大代表”的弹劾案，弄得他整天一惊一乍，可是，白崇禧手里也有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出走在美国的前“代总统”李宗仁。只要李宗仁不“投共回国”，白崇禧就是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秤砣。如今，李宗仁已经“投共回国”，白崇禧在蒋介石的眼里毫无价值，惟有旧恨。在李宗仁回国的第二年，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死在自家的床上。

1966年6月，李宗仁参访团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通知，要求李宗仁等人马上回北京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这个会议，传达所谓“彭、罗、陆、杨”的问题，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组建的所谓“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揭批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陷害、打倒党和国家及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第一个事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立案。¹

参访团回京后，李宗仁曾邀请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吃过两次饭。夫妻俩在李宗仁位于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院的家里，认识了当时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胡友松女士。胡友松的母亲就是著名影星胡蝶。²

年轻貌美的胡友松因为家庭背景原因，生活坎坷，恋爱一直

1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2 胡友松（1939—2008），原名若梅，其生母为著名影星胡蝶，中学毕业后相继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复兴医院担任护士；1966年7月26日，时年27岁的胡友松于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1985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退休后学习中国画。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2008年在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去世，终年69岁。

不顺利，于是在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的撮合下，75岁的李宗仁与时年27岁的胡友松于1966年7月26日在北京正式结婚。胡友松成为李秀文（1891—1992）、郭德洁之后的李宗仁第三任妻子。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早就认识胡友松的母亲胡蝶。郭秀仪曾告诉胡友松，说：“胡蝶和我是好朋友。”1966年7月25日，李宗仁与胡友松办理了结婚手续。第二天，在西总布胡同5号院的李宗仁家里，他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参加婚礼的来宾人数不多，包括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刘斐、余心清、刘仲容、程思远夫妇等，都是与李宗仁关系比较亲近的人。

据胡友松回忆，婚礼事务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操办，厨师请的是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做了一席正宗的粤菜。黄琪翔夫妇订制了一个大花篮，提前送到，摆在大客厅里，整个屋子顿时绚丽夺目。

黄琪翔闻知像彭真这样的共产党人，居然也被打成了“阴谋反党集团”人物后，自然感到惊诧莫名，百思不得其解。黄琪翔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但他有过前车之鉴——就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痛苦经历，肯定再不敢乱说乱动。眼下，共产党领导人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么自己还能逃过这一劫吗？他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叶扁舟上，周围是惊涛骇浪，完全不知道前方会出现什么样的礁石和漩涡。

彭真与黄琪翔有一点亲戚关系，即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弟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文松（1919—2011）是黄琪翔堂妹黄甘英的丈夫。

果然，在紧随其后的日子里，厄运又降临到黄琪翔的头上。

第九章

文革中含冤辞世

一、文革风暴

参加完李宗仁与胡友松的婚礼，黄琪翔在静观事态的变化。

1966年4月，“当时报章已在连篇累牍地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对此等‘批判’俱习以为常，认为与前几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的学术批判相仿，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然，事与善良人们所愿违，‘文革’之火，经人煽动，愈烧愈烈。六月一日及其后，《人民日报》用特大号字体发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等一系列社论，号召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通篇杀气腾腾。又广播和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将北大党委指为邓拓一样的‘黑帮’，刹那间，全国批判运动哄然而起。”¹黄琪翔也明白这个道理，枪打的一定是先飞出树林的鸟儿。他吸取了“反右”时的教训，自己再也不吭声、不表态，静静地观察时局的变化。

忽然间，红卫兵运动狂飙突起。北京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日期等。而“所谓红卫兵，是文革初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其发起者最初为北京中学中的

555

1 沈沛霖《沈沛霖回忆录》，p384。

一批高级干部子弟，长期以来，自命不凡，以接班人自居，将封建时代之‘血统论’，奉为至宝，鼓吹对所谓‘阶级敌人’的‘造反有理’。凡所谓‘红五类’子弟，皆可参加，其狂热而又幼稚的做法却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打破‘四旧’。于是，首先从北京开始，‘除四旧’及抄家的狂风，刮遍全国各城市。”¹

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为“红卫兵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的运行体系，予国家和社会以极大的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黄琪翔已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悄悄跑去找程思远商量如何应对？“程谓，不如意事常八九，总要挺立不拔，坚持下去。黄也表示有思想准备，但绝对相信共产党。果然，共产党还没动黄一根毫毛。”²这里所指的共产党，是指共产党的党中央，可是在文革爆发之后，党中央已经名存实亡，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自身难保，也被打倒在地，于是天下大乱。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说：“进入8月，红卫兵闹得更厉害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铺天盖地地来到北京搞串联，8月18日，毛主席穿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从此红卫兵来京的潮流就愈发不可收拾。”“没办法，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承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供饭。”显然，周恩来总理也不能分辨当时形势的发展，看不清斗争的方向，所以他的夫人邓颖超给秘书赵炜“订下了三条原则：一不和人随便来往；二不

1 沈沛霖《沈沛霖回忆录》，p387。

2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和人通信；三是有人来找不见。”¹

黄琪翔身在乱世之中，无处可以躲避。1966年8月，大约三四十名洋溢着革命激情的红卫兵小将，呼喊着一“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口号，闯进黄琪翔家。他们把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从房间里揪出来，围在中央，进行声讨批斗。

这批红卫兵小将其实是一些北京中学里的高中生，年纪在十七八岁左右，身体还没有发育好，嗓子还在变音，胡子尽是些稀松的细毛。他们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军帽，衣袖高高挽起，臂膀上套着红袖标，上面是毛泽东手书的“红卫兵”三个黄色大字。他们把黄琪翔包围起来，情绪疯狂地用手指着黄琪翔的鼻子，厉声痛斥他是国民党军阀、反革命分子和蒋介石的走狗！

这些红卫兵小将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黄琪翔的历史背景，也不知道黄琪翔将军一生对国家和历史的贡献，而他们对黄琪翔的指责，全是无中生有。他们只知道黄琪翔曾经是国民党将军，是“摘帽右派”，这就足够了！国民党将军，就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狗。“右派”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对待敌人，绝不手下留情！

黄琪翔想辩驳，但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抗不过数十人的齐声怒吼，就像是一滴水掉进大水缸里，毫无作用。他看着这些比自己孩子年纪还要小的孩子们，内心真是又急又气又心痛又悲愤。可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倾听着他们的怒吼。

红卫兵小将把黄琪翔骂够了，自己也骂累了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他们又作鸟兽散，纷纷离开了黄琪翔家。

这是“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小将第一次“光临”黄琪翔家，也是最“客气”的一次，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进行抄家，没有动手打人，也没有把他们全家人扫地出门。但是，这已经给黄琪翔和他的家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摧残。

大约又过了一周，另一批造反派再次“光临”黄琪翔家。这

1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赵炜《西花厅岁月》，p193—194。

是一群真正的无耻暴徒。他们翻箱倒柜，四处查找所谓“反革命”和“四旧”的证据，把生活必需品翻得满地皆是，一片狼藉。他们对金银首饰的搜查兴趣，显然超过其他东西，且态度之恶劣。只要主人家对他们的暴行稍有质疑，就要遭遇暴力的回应，不分青红皂白。

家里，除了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外，当时还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他们的小女儿黄平，一个是他们的外孙于峰。黄平12岁，于峰11岁，被反锁在屋里。孩子们听见造反派在外屋殴打黄琪翔，也听见砸花瓶的声音，还有就是郭秀仪痛苦而凄厉的哀叫声。

黄琪翔被殴打时，他一声不吭，是个铮铮铁汉。那年，黄琪翔已经是68岁的老人。

郭秀仪后来回忆说：“他们不光用拳头打，脚踢，还用木棍打。黄琪翔在被毒打时，一声不吭，也不还手。我就去抱着黄琪翔，并告诉造反派说：‘黄琪翔不是反革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请回来的’。他们还是用木棍打，打到了我的手上，我疼得一下子倒在地上。后来去医院检查，我的手骨折了，是粉碎性骨折，而且是打在我右手上，正好是我画画的那只手！”¹黄琪翔见妻子被打成骨折非常心疼，叫她以后不要再保护自己，还宽慰说，“我是军人，被打没什么。”郭秀仪也宽慰黄琪翔说：“琪哥，你不是说粉身碎骨也要跟着共产党吗？现在咱们做到了。”

动乱中，没人知道造反派拉走了黄琪翔家多少东西，多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品。据说造反派留下一张抄家清单，却是很不完整。关于黄琪翔夫妇收藏的齐白石作品，红卫兵在抄家时没有装走。他们的女儿黄莺回忆说：“红卫兵说这些画是‘四旧’，在箱子上贴了封条，不许动。”

郭秀仪后来回忆说，她最心疼的是一张周恩来于1938年送给他们夫妻的照片，是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的合影，上面周恩来用毛笔写着：“赠琪翔兄，秀仪妹留念，周恩来、邓颖超。”

1 《流金岁月》，p107。又，关于黄琪翔被造反派殴打的细节，是在本书作者的追问之下，郭秀仪亲自说的，时在1992年。

郭秀仪说，被抄走的照片就多达三四千张，而且从此一去无回。造反派在搬走影集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张底片在地上，郭秀仪趁没人的时候悄悄拣了起来，塞进了口袋——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照片，在 70 年代末被广泛采用，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见证。¹

造反派“义正词严”地告诉黄琪翔，你们住的这所房子是劳动人民建造的，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汗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不配。”所以，必须滚蛋！

“1966 年 8 月底，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两人都遭到毒打，然后被赶出了家门。”²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一大家子共十几口人，只得四散。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以及郭秀仪二姐郭秀华夫妇四位老人被迫搬去北京辛安里农工民主党的职工宿舍。

这里没有单独的厨房，也没有室内卫生间。他们干女儿张新荣曾悄悄去探望，回忆说：“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位于辛安里一个院内，是一个三层小楼。院外还有一个门，通向职工宿舍。”“那是前后两个大杂院。干妈（郭秀仪）他们住在最后一个院内。这里一明两暗的屋子，干妈夫妇住一间，二姨妈夫妇住一间。屋内除了简单的几样厨具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厨房，更没有卫生间，做饭只能在屋外不宽敞的屋檐下。这个院子挺大，院子里只有一个公用厕所。我猜想早上起床后，难免会有不少人要排队等候。”³

抄家行动是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其实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暴行。“据不完全统计，从 6 月至 10 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折和公债券就达 428 亿元，黄金 118.8 万余两、古董 1000 多

1 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在南京黄琪翔家花园。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合作抗日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高官张群来黄琪翔家做客谈事，随后在黄琪翔家花园合影留念。黄琪翔将军当时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总书记。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郭秀仪将它拿出来公开发表后，这张照片立即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十几家单位制作成大幅照片向社会展示。此照片见本书 P215。

2 《流金岁月》，p30。

3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¹“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1967年春末，“造反”当局还在北京展览馆主办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分为4个展馆展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闻名全国的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率领首都红卫兵代表参观了展览。

被“扫地出门”后，黄琪翔的家院随后被北京市的两家单位强行占用。前院一度被北京市的新市委占用，后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办公地；后院则成为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的办公地。

黄琪翔被赶到机关宿舍居住的第二天，被宣布隔离审查。与黄琪翔同时接受隔离审查的老同志李乃曾回忆说：“1966年8月下旬，黄琪老和他夫人搬到农工党机关宿舍第二天，造反派刘某某就宣布黄琪翔被隔离审查，不许回家。他被关在三楼顶西头的一间小屋里，规定他每天清晨七点接受劳动改造，清扫机关大院。白天不是大会批就是小会斗，被斗者和陪斗者都要‘坐飞机’，然后回到小屋里写交代罪行材料，晚上12点前，造反派……分别到各个小屋检查交代材料。我们接受他们的审讯和拷问，稍有不满意就遭受声嘶力竭般训斥和痛打。”²

李乃曾还说：“在批斗黄琪翔的大会上，我们是陪斗。造反派辱骂黄老是蒋介石的走狗，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动军阀，让他老实交代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有哪些勾结和反党言论。在另一次批斗黄琪翔的会上，造反派说黄琪翔不老实，在交代罪行材料上说‘章黄李右派集团’根本不存在，说他翻案，遭到批斗，并鼓励大家揭发检举黄琪翔。当时黄琪翔的部下……都有揭发材料。

1 2008年第一期《文史精华》丁大华文章“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2 张新荣于1983年调到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后来担任了总务处长。这些内容是李乃曾亲口告诉张新荣的，张新荣写入《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当时的负责人某某在大会上说：‘黄琪翔你至今执迷不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拒不交代与章伯钧的勾结，不揭发章伯钧。你知道我每次见到周总理时他都在问：黄琪翔怎么样？我说你思想抵触很深。’”

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蒋中光先生也被审查。他不堪折磨和凌辱，“有一天他终于从三楼窗户跳下去自杀，但没被摔死，却成了残疾人。听说蒋中光就因为与蒋介石‘三同’而遭受横祸。这三同是：同姓、同乡、同是日本士官军校毕业。其实他们彼此不认识。”¹

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老同志感慨说：“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期间，民主党派都是重灾区。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尤其是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造反派，论批斗人最凶、打人最狠者，他们是首屈一指的。”²面对不时遭遇造反派悍将的殴打，黄琪翔都是在默默忍受。为了不让妻子看见自己被殴打时衣服上留下的血迹，从来不会做家务的黄琪翔，自己悄悄在单位里把衣服洗净，然后等衣服晾干后才回家。因为他知道，妻子郭秀仪也不例外，作为“反革命”的家属，郭秀仪处处受到歧视，终日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地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身心备受煎熬。³

就在此间，不堪受辱的黄琪翔将军，决心要以自戕的形式来抗拒这个黑暗的年代。

在当时，黄琪翔的许多好友已经选择自杀的方法来与这个时代抗衡，甚至连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也纷纷走上这条黄泉路。

1966年8月，黄绍竑将军遭到红卫兵的抽打罚跪后，不堪凌辱，两次服毒不死，终于在8月31日用剃刀刎颈，自杀而死，终年71岁；

老舍先生于1966年8月24日，不堪迫害投了北京太平湖自杀，终年67岁；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3 《流金岁月》，p30。

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于1966年8月31日投湖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9月上旬失踪。他死于何地？至今不明；

道光皇帝的曾孙、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的老师溥雪斋先生已经73岁，1966年8月30日不堪迫害离家出走，死于何时何地至今不明……

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的著名文人邓拓先生，1966年5月16日，在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是“一个叛徒”后的第二天，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

甚至连毛泽东本人的秘书田家英也不例外。1966年5月22日下午，“文革”干将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田家英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绝望的田家英即自缢而死……

“文革”爆发后，黄琪翔再也没看到他的堂妹黄甘英。这位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城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女战士，在秦城监狱里被关了8年大牢。

李以劭撰文说：“一九六六年夏，国内又开展文化大革命，黄老（黄琪翔）从摘帽的右派分子又列入牛鬼蛇神五类分子之一，接受专政长达四年。十年动乱期间，黄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红卫兵几十人汹涌而来，冲入黄宅，对他进行迫害，并把他赶出家门。他百般无奈，只得迁住农工民主党宿舍，并接受批斗。从此，黄老便开始非人生活。他经过了非法扣押、严刑审问、强迫劳动、残酷殴打、大会斗争、小会批判、检讨交代、查抄籍没等折磨虐待。”¹

这天晚上，黄琪翔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冷静地对妻子郭秀仪说：“秀仪，我考虑了许多天，与其让我这么活着被人凌辱，还

1 《传记文学》第74卷第一期，p54。李以劭文章《怀念黄琪翔将军及简述闽变经过》。

不如就此了却残生，也是个痛快。”¹

一向温婉贤惠的郭秀仪，突然站到黄琪翔面前，严肃地说：“你是一个军人，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确不怕死。可是，你要想想，死并不难，活下去才需要勇气！你一向拥护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可我知道啊，周总理也知道。我相信你的问题最后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就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我们心中无愧！”

郭秀仪还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而一死了之，那么请你想想，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活着的人怎么办？我可以现在就向你保证：如果你自杀的话，我一定在你的遗体旁宣布和你离婚；如果你真的被迫害死了，我就会像一个战士那样，一定替你鸣冤。”

郭秀仪心里明白，黄琪翔产生了厌世情绪。他的心理越是低落，越是需要鼓励，越需要斗志。

刚直不阿的将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黄琪翔最终向妻子保证，说：“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我要相信漫漫黑夜终将过去。”²

黄琪翔后来对至爱亲朋说过：“要不是为了秀仪，在1966年我一定会像季宽兄（黄绍竑）那样选择自尽。我是不能忍受那样的屈辱。”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郭秀仪对丈夫更加细心呵护。干女儿张新荣女士回忆说：在那以后，“黄伯伯（黄琪翔）到机关去接受隔离审查，离家前黄伯母对黄伯伯说‘我了解你的为人，相信你到机关会实事求是地写交代材料的。我在家认真地绘画，等你回来向你交作业。’”³这似乎是在用哄孩子的口气说话，却能给予身心俱疲的丈夫以无限温暖。其实，那时候郭秀仪因为右手

1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104。

2 《流金岁月》，p132。

3 1995年，郭秀仪与本书作者谈话中说过，因为在1966年8月右手被造反派打成了骨折，治疗后手指的关节依然不能活动自如，所以就封笔了，不再绘画。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齐白石女弟子郭秀仪封笔始末》。其实不然，郭秀仪自1966年以后并没有真正封笔，而是不再奢望成为国画家，只是把绘画视为自己的休闲爱好而已。从她内心来说，1966年以后，自己想成为真正国画家的念头已被彻底打破，所以等同于封笔。



“文革”期间，郭秀仪在北京建国门外简陋的家中作画，摄于70年代。

被造反派打成骨折，作画起来非常困难。

黄琪翔夫妇顽强地生活着，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季方回忆说：“当时，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制下，政治紊乱，社会窒息，同志之间来往断绝，死生疾病不相知，真有隔世之感。”¹

突然，周恩来总理派人来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指名要见黄琪翔。可是，人们不知道黄琪翔被造反派弄到哪里去了，结果没有找到。于是来人找到他的夫人郭秀仪。他问郭秀仪有什么困难？

郭秀仪后来回忆说，“当时考虑到总理日理万机，不愿意让他再为自己的事操心，于是咬了咬牙，说：‘请转告总理，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工作人员看出郭秀仪内心的苦楚，没多说什么，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季方文章《热爱祖国的黄琪翔同志》。

就留下一句话，说：“总理要你好好照顾黄先生，可以经常陪他去散散步。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总理。”

实际上，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正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瞄准”，开始翻旧账，揪辫子，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借机打倒他。周恩来被控的最主要罪状，就是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他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靠边站。

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王明获得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支持，推翻李立三路线后并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实行一系列左倾残酷政策。王明在党内不仅打击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甚至还要求各个根据地开展肃反运动，以无中生有的罪名杀害了一批革命干部，包括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革命同志。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班子决定改组中央局，任命周恩来为书记，但周恩来在上海的工作没有结束，所以由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职务。4月17日，代表中央的王稼祥来到赣南，以项英贯彻中央精神不力为由，决定毛泽东担任中央局书记。11月1日至5日，中央局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赣南会议”。会议由项英和任弼时主持，却继续贯彻王明的极左路线，撤消了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职务，调任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周恩来当时没有参加“赣南会议”，而且，他是在一个月后的12月间才来到赣南，与毛泽东被撤职的事毫无关系，¹也不存在所谓抢夺毛泽东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造反派开始胡作非为，混淆历史事实，让周恩来背负极大的心里包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派人来看望黄琪翔，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安危。

刚回国不久的李宗仁，不知从什么渠道听到关于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将军受到凌辱和迫害的消息，他想拉着章士钊一起去问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章士钊说：“万万不

1 团结出版社2001年2月版《蒋介石大传》，p645。

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果然，李宗仁的新婚妻子胡友松去医院买药，差点被红卫兵从车里拖出来，随后还有六个红卫兵冲进了西总布胡同5号院的李宗仁家里……¹

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即指示对党外民主人士采取特别保护措施。1966年9月19日，李宗仁和胡友松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被保护起来，同时被送进301医院的还有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周恩来关照他们不要相互走动，还为他们使用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是他对党外民主人士采取的特别保护措施之一。保护对象为：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 (2) 部长、副部长；
- (3) 政副；
- (4) 国副；
-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 (6) 两高；
- (李宗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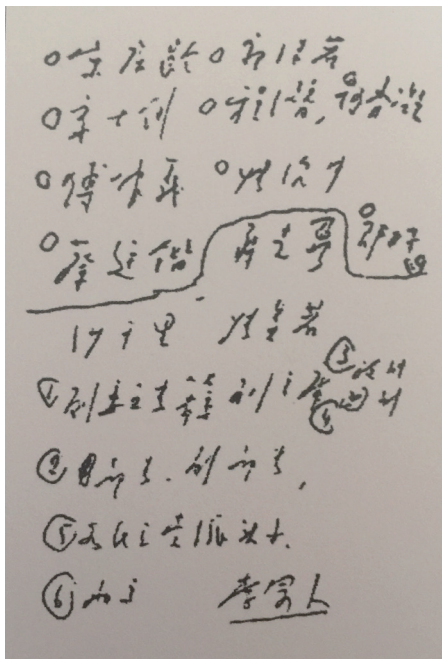
其中，“副主席”指共和国的副主席，“政副”指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据说，这份名单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拟定的。²按照周恩来的这份保护名单要求，黄琪翔符合保护对象之第二条、第五条。

“文革”期间的周恩来，一方面，他必须坚定忠于毛泽东主席，

1 《43位战犯的后半生》，p37。

2 全国政协办公厅编《人民政协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p136。

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思路办事。因为毛泽东的威望此时已经到了无人能够企及的地步，走上了神坛，毛泽东思想成为绝对权威。如果周恩来稍有疏忽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在接见蒙哥马利的时候，曾亲口说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把已经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逮捕入狱，以致含冤而死。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竭尽所能地帮助那些被打倒的人，给那些在水火中挣扎的人施以援手。



周恩来手写的这份保护名单。

197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书中真实介绍了周恩来当时的状况：“在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和斗争，处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个方面的大事。本来就很少的睡眠时间更少了，一般每天只有二、三小时；有时甚至一连几昼夜不停地工作，连续地批阅文件、找人谈话、开会、接见……没有时间吃饭，工作人员只好在玉米面粥里放一点菜泥和肉末，倒在茶缸里送去，让总理一边工作、一边吃点东西。有时给总理蒸几个包子送去，可是总理没有时间吃，凉了再热，热了再凉。几次回笼，包子都碎了，当总理乘车到别的地方去时，赶紧送到车上，让总理利用乘车的时间吃几口。在艰巨的斗争中，在繁重的工作中，敬爱的周总理一天天消瘦了，健康不如以前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造反派得知周总理特意派人来看

望黄琪翔，十分惊讶。显然，总理的这一措施起到了威慑作用。造反派于是决定“优待”黄琪翔，叫他当个“走读生”。所谓“走读生”，就是不再被完全隔离，每天可以回家睡觉。这样，黄琪翔每天上午7点去机关，一个人呆在小屋里，被勒令写所谓“交代”、“反省”和“检举”材料。晚上11点后才被允许回家。

“文革”开始后，黄琪翔、郭秀仪的生活待遇一落千丈。黄琪翔被取消了高级干部待遇，看病必须排队取号；华沙牌汽车被取消；保姆、厨师等一律被辞退；工资也只剩几十块钱一个月，因为郭秀仪没有工作，所以黄琪翔的工资要四个人花——除了黄琪翔夫妇外，郭秀仪的二姐夫妇也需要他们供养。黄琪翔、郭秀仪家人的伙食第一天是窝头加咸菜，第二天仍然是窝头加咸菜，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郭秀仪后来说过：“伙食差点没有关系，最要命的是心情的焦虑，整天让人惶恐不安，不知道造反派会把黄琪翔怎么样？时刻提心吊胆。”

在迁往机关职工宿舍时，黄琪翔领了工资，家里总共还剩下200元，却要安置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到各处去生活，然而，黄琪翔还是拿出其中的100元，给了厨师，算是遣散费。这张收据在老人们去世后才被子女找到。大家看到收据，心里顿时很酸楚，也很敬佩——当时家里已经困难到这等地步，可老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

事也凑巧，1966年冬天，郭秀仪去地安门菜市场买菜，在市场门前邂逅了干女儿张新荣。张新荣的父辈是黄绍竑的好友。多年前，张新荣和黄绍竑女儿也常去黄琪翔家，所以她们都很熟悉。那时的张新荣还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情窦初开处于恋爱阶段，正在北京的大学读书。

张新荣回忆说：“1966年底的那次重逢，激动得我们俩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原来，1957年张新荣与动物学家林永烈结婚后，因丈夫被调动去青海工作，她自己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北京回到故乡天津，小夫妻俩于1964年才调回北京。1966年10月，张新荣曾经让丈夫穿上“护身符”——即“四清”

运动时发的绿军装，骑自行车去黄绍竑家和黄琪翔家探听情况，结果发现两处大门紧闭。林永烈也不敢久留，就匆匆回来了。

郭秀仪再次见到干女儿时，张新荣已是三个男孩的妈妈。张新荣也很不容易，回北京后，她的丈夫林永烈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每年初春至入冬前，都要去边疆的野外工作，所以她必须以一个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所有的重担。可是，她依然在挂念着黄琪翔夫妇。

张新荣回忆说：“我们俩约好每天上午10点来菜市场买菜、碰头。之后，有三个星期没见干妈来，我很不放心。有一天菜市场有虾卖，这可是难得的事。我买了一斤虾，给干妈送去，顺便看看有什么情况。就这样我找到辛安里的农工民主党机关。我的到来，干妈很惊讶又很激动地问我：‘你怎么敢来看我们？’我说：‘这么多天没见您来菜市场，我不放心，今天很难得碰上菜市场卖虾，所以就买了点送过来。’她接过虾后，又不时向屋外张望。看到干妈这样紧张的样子，我也不敢久留。干妈说：‘我也就不送你出去了。’这时她又看看屋外说：‘没人！’我就急匆匆地走出屋外。”¹

郭秀仪自己的遭遇，不敢声张，只在没人之际悄悄告诉了干女儿张新荣。张新荣写道：“在黄琪翔被隔离审查期间，他的妻子在家里也过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来自造反派女干将某某的监督、辱骂、讽刺，给她在精神上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位造反派女干将住在前院，每天过来（后院）查东查西。由于郭秀仪从来没用过蜂窝煤炉子，不知该如何点火？弄得她烟熏火燎也生不着炉子。好心的赵家婉（他是机关干部周涤凡的妻子）住在斜对屋，就过来帮忙，并告诉她要买点炭煤就容易多了。不料，这位造反派女干将看到此景，就大声疾呼：‘赵家婉你不许帮她！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她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官太太。’然后又对郭秀仪说：‘郭秀仪，你过去一直过着资产阶级官太太的生活，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家里有保姆有厨师，现在也该让你尝尝劳动人民的生活，这是在改造你！’郭秀仪不语，任凭乱吼。过几天，工人师傅来送煤，这位造反派女干将也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后院。平时，工人师傅都会给各家把蜂窝煤码好在指定的地方，可女干将却跟送煤师傅说：

‘她是反革命军官家属，不要给她卸煤，让她自己搬！’郭秀仪只能忍气吞声，自己一块一块地把蜂窝煤搬到自家的屋檐下。”¹

关于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这位造反派女干将，张新荣是这样描述的：“在文革中，她身穿褪色的绿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臂上套着红袖箍，一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装束，整天耀武扬威地在机关以及宿舍前后院到处乱窜，大小事全管。她是机关里臭名昭彰的……可是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成了造反派的骨干，又因告发（同事）的大小事而受到重用。”²

黄琪翔做“走读生”后，晚上可以回家睡觉。但是，年近古稀的他遇到了大麻烦。一是晚间去公用厕所的路上没灯，二是下雨下雪天路滑，三是晚上受寒伤风了怎么办？郭秀仪“立即想到不如买个带盖的搪瓷盆当作尿盆，次日清早再倒到公厕里去。没料到，有一天清早，当郭秀仪端着尿盆走向公厕时，这个女瘟神大声喊叫道：‘郭秀仪你站住！不许你往公厕里倒屎尿。怎么就你特殊，不愿上公用厕所？还是忘不了你官太太的专用厕所吗？’郭秀仪刚想解释，就听女瘟神大喊‘端回去！’郭秀仪只好端回屋去，另找时间再倒掉。类似这样的遭遇不胜枚举。”³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帮助和妻子郭秀仪的激励、搀扶下，黄琪翔终于熬过了1966年至1968年那些被残酷斗争的日子。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造反派内部也开始残酷斗争，大字报漫天飞舞，大标语随处可见，各地不断发生规模大小不同的武斗，死伤无数，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揪出党内一小撮”，实际上针对的是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3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中共党内领导层。赵炜回忆说：1966年“到了12月，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2月4日，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红卫兵绑架后不知去向。彭真是在1966年5月被免除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当时由于毛主席不点名批评了他，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所以彭真就挨了批判。”到了1967年“先是刚刚过完元旦，陈伯达、康生、江青1月4日在接见广东一拨红卫兵时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大街上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揪斗陶铸的大字报；1月8日深夜，造反派为了揪斗谭震林又冲进了中南海西门；余秋里、贺龙紧接着也受到了冲击，很多人被搞得有家难归。”¹1967年5月，江青还拿着1932年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旧报纸，企图打倒周恩来。事实上，这是当年国民党特务炮制、伪造的假新闻，“党中央早就很清楚”。²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

而像黄琪翔这样的民主人士，客观上已经被彻底地批倒批臭，在公开场合里他们也表示了“低头认罪”，所以针对他们的斗争已经降低了力度。

郭秀仪遵从周恩来的指示，每天简单地吃完晚饭后，就陪同丈夫黄琪翔出门散步。他们住在辛安里机关宿舍，位于北京地安门附近，离北京著名景区什刹海相距不远。什刹海是燕京的胜景之一，也写作“十刹海”，原因是它的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称。什刹海是内陆湖泊，有“西海”、“后海”、“前海”三个水面，其间以水道相通。因地邻闹市，沿堤尽植垂柳，是北京人休闲的好去处。他俩经常去那里散步，这给饱受迫害之苦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以极大的心理抚慰。

干女儿张新荣的家，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一个有着前后门的大杂院里，就在什刹海的边上。大杂院的前门斜对着北海公园后门，而大杂院的后门正对着什刹海。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去什刹海散步，

1 赵炜《西花厅岁月》，p200。

2 赵炜《西花厅岁月》，p208。

必定要去张新荣家坐坐。看见昔日的大小姐张新荣也会用扁担挑水，黄琪翔就笑说：“真不错，蛮像个样子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尤其喜欢张新荣那三个活泼天真的孩子，看着他们跳“忠字舞”，听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唱样板戏，总是很开心地给他们鼓掌，喝彩。

每年的7月16日，什刹海里都要举行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大型游泳活动。张新荣的三个男孩水性都好，被选中参加庆祝活动。特别是最小的儿子季弢，才六七岁，是游泳队伍里最末的一名小兵。黄琪翔、郭秀仪获悉后很高兴。一个周日的上午，黄琪翔看见游泳归来的小季弢，湿淋淋地穿着用旧衣服缝补的三权裤，上面已经有了两个破洞，就笑着说：“你这么小就听毛主席的话，学会了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有志气，我们去买一条尼龙游泳裤奖励你吧。”

小季弢兴奋得手舞足蹈，可张新荣却坚决不答应。张新荣知道，当时他家是靠黄琪翔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一条尼龙游泳裤要卖七块多钱，而黄琪翔家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再说，孩子穿尼龙游泳裤实在太奢侈，也太扎眼。¹

郭秀仪就打圆场，拉着张新荣，叫上小季弢，他们四个人去和平饭店吃了顿午餐。结束时，郭秀仪还特地带回三份肉饼给家里的另外三个男人，即张新荣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说是要给他们增加营养。在当时，能够吃上肉腥就算是补身体了。

在政治高压下，曾经叱咤风云几十年的黄琪翔将军不得不处世慎微，言辞谨慎。而性格豪爽的张新荣对造反派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老干部、老将军的做法很不满，甚至抱不平。她对黄琪翔夫妇说：“共产党人出生入死革命了几十年，一夜之间就全都成了反革命，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都被打倒了，现在又攻击周总理，‘中央文革’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实际上这不是把毛主席架空吗？我怀疑有人在搞阴谋。”

1 《流金岁月》，p266。张新荣文章《缅怀往事》。

郭秀仪赶紧说：“不要乱讲话啊，没有根据的事说了是很危险的。”其实，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即使你说了有根据的事也是很危险的。

经历“反右”和“文革”两大政治运动之后，黄琪翔显然体会到政治的严肃性，附会妻子说：“是啊，我们还是要多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认识，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的力量 and 政策。”这些话，既是对张新荣的忠告，也是一种爱护。

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黄琪翔终于“解放”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邓大姐曾亲口跟她讲过，“1938年，我同恩来一起到武汉时与黄琪翔、郭秀仪两位朋友相识。当时，郭沫若、黄琪翔我们三家是芳邻。我同郭秀仪、宋庆龄、李德全、史良等进行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儿童保育工作。”赵炜女士还证实说：解放后，黄琪翔在政府任职，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又受到冲击、迫害和折磨，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得到了“解放”。

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黄琪翔，饱受各种煎熬之后，他已经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实质，也对人性的自私和盲从有了深刻的认识，变得非常豁达和超越。他曾经对妻子郭秀仪说：“运动中有些家人、朋友、同志和部下，曾无中生有地对我进行污蔑和批斗，你不要恨他们。这些人将来有困难，如果咱有能力，仍要帮助他们。”¹这段简单的话语，确实非常深刻，需用心体会。对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反映到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就不仅仅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凸显人性的善恶。在特殊的政治高压下，一些人表现了人性恶的方面，其实他们大多不是坏人，事情过后灵魂深处多有自责。黄琪翔的这句话体现了他对政治的透悟，对历史的透悟，更是对人性的悲悯。

1 《流金岁月》，p150。郭秀仪文章《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实际上，黄琪翔所说的“有些家人、朋友、同志和部下”都是有名有姓的，郭秀仪了然在心。“文革”结束后，郭秀仪遵照黄琪翔的遗言，放弃怀恨，她没有去揭发、控诉任何具体个人在“文革”期间的恶行。

二、魂兮归去

黄琪翔经受长时期精神折磨之后，再加上年近古稀，身体健康开始明显走下坡路。他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由于黄琪翔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被取消了高干医疗待遇。尽管在 1959 年被摘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待遇并没有得到恢复。他若要去医院挂号、看病，就非常困难。

清晨 4 点，郭秀仪就要起床梳洗，然后赶到公共汽车站等公交，再去北京人民医院排队挂号。等领到医院挂号单后，她还要回家来接黄琪翔，再陪同去医院。这对于郭秀仪来说，身体不堪重负。特别是，那时兴起一股打“鸡血针”之风，排队等挂号的人特别多。

他们的干女儿张新荣体谅老人的困境，主动替他们去北京人民医院排队挂号。黄琪翔、郭秀仪随后赶到张新荣家集合，再一起去医院瞧病。张新荣为什么挂到号后，还要再次陪同老人去看病呢？因为坐公共汽车的人太多，又加上各地红卫兵来京大串联，经常发生拥挤，甚至发生过把老年人挤坏、踩死的事。张新荣说自己不放心。

张新荣回忆说：“清晨四点半，我骑车到人民医院挂号。挂完号后我骑车赶回家，见干爹干妈已在等我，然后我接上他们一起挤上公共汽车到人民医院。医生诊断干爹为高血压、心律不齐。

就这样，从1967年至1970年间，我们就用这种办法让干妈陪着干爹一步不离地去医院看病或拿药。”¹

“有一次，干妈问我：‘你明天去医院挂号时，能不能帮李伯球也挂个号？’我说可以。我当时不知道在反右运动中，李伯球曾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让黄琪翔彻底交代与章伯钧‘密契’的事。这是无中生有。干妈他们并没有因此记恨，而且还在帮助他。这是以德报怨，多么高尚的人格！”²

黄琪翔的心情仍然非常压抑，不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他们的住处，经常看见那些趾高气扬的“造反派”。这些人凶狠地批斗过他，在“检举”中造谣中伤他，甚至还残酷殴打他，特别是造反派女干将这种人还在整天盯着他，叫他们夫妇“不许乱说乱动”。黄琪翔希望换个居住的环境。考虑再三，他决定给老朋友、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写封信。

信写好了，却不知道该怎么送达？

郭秀仪听说在天安门附近有个专门的“首长信箱”，可以将信直接送达中央领导人的手里。她早晨悄悄出门，从地安门步行到天安门，然后围绕着天安门转了半天，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所谓的“首长信箱”。她最后只能就近找个邮局，用挂号信寄出。信封上写“国务院办公厅邓颖超转”，还在信里加了个便条，上写：“邓大姐，我有封信请您转交给总理。”

这一招果真灵验。很快，周恩来派人找到了黄琪翔，询问有什么要求？黄琪翔的要求很简单，就一个，想麻烦总理帮他换个居住环境。

周恩来随后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分配给黄琪翔一套新的居所，它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灵通观。这里是当时北京居住条件最好的楼房，有暖气、电梯，还有直接进入每个家庭的煤气，里面住的绝大多数是著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高干的家属。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1970年5月，黄琪翔从国管局领取了房门钥匙。他的新家是坐北朝南的一套三居室，进门后是一间门厅，不大，约有8平方米的样子，左边分别是卫生间和厨房；再往里的东向是一间卧室，面积约14平方米；西向是一个套间，外屋是客厅，里面是主人的卧室；卧室里还有个储藏室。全部建筑面积正好是100平方米。从此，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告别了什刹海的黄昏。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看了这套新房子后高兴极了。虽然，这新居与他们在“文革”前的房子，以及上海、南京、香港、桂林和老家梅县的房子相比，无疑是最小的，甚至可以说是蜗居，但今非昔比啊，经历了风雷激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黄琪翔能够住进自己的这个新家，可以逃避那些总像是监视着你背影的目光，能够逃离那些在批斗会上振臂怒吼的人们，可以让自己心灵得以喘息，并开始享受生命的安宁。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的避风港湾，是一个闹市里的武陵源。

这里的新邻居，其实是老朋友。如蒋光鼐夫人黄晚霞，蔡廷锴夫人罗西欧，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李觉何玫（国民党将领何健的大女儿）夫妇，章伯钧夫人李健生，钟惠澜，中医大家施今墨夫人张培英，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钟复光夫妇等。大家见面很热情，也很贴心，因为彼此的出生都不好，不属于光荣的劳动人民家庭，所以同病相怜。施复亮是民建成员，他的儿子就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施光南（1940—1990）。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随即行动起来，雇了六辆平板三轮车，还动员自己的亲友们一起来搬家。张新荣带着她的儿子们也来当起了义工。可是，刚要开始搬家时，农工民主党机关造反派女干将又似幽灵般出现了。张新荣回忆说：“郭秀仪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搬出宿舍时，某某又出现了。她对郭秀仪酸溜溜地讽刺说：‘这回好了，你又可以去过你资产阶级官太太的生活啦！你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别忘了黄琪翔的罪行还没有交代完，以后他每天还

要到机关检查、交代罪行。’”¹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就这样逃出了机关职工宿舍。

张新荣说：“我和孩子们帮他们搬到了新居。当晚，我们一起动手在煤气炉上烧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从此，他们结束了使用蜂窝煤炉子烧饭的生活。”

晚饭后，黄琪翔坐在椅子上，看着快乐地来回奔跑、收拾屋子的妻子郭秀仪，心里非常愉快。他眼神里流露出对妻子的感激之情。他对张新荣说：“这几年真苦了你黄伯母，如果没有她，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黄琪翔深情地看着妻子郭秀仪，那情形深深地感动了张新荣。她说，这一幕成为她今世难以忘怀的记忆。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非常喜欢张新荣的孩子们，而这些孩子也非常懂事，时常在什刹海里用手摸鱼捉虾，一旦收获到“战利品”后立即拉着母亲给黄爷爷、奶奶家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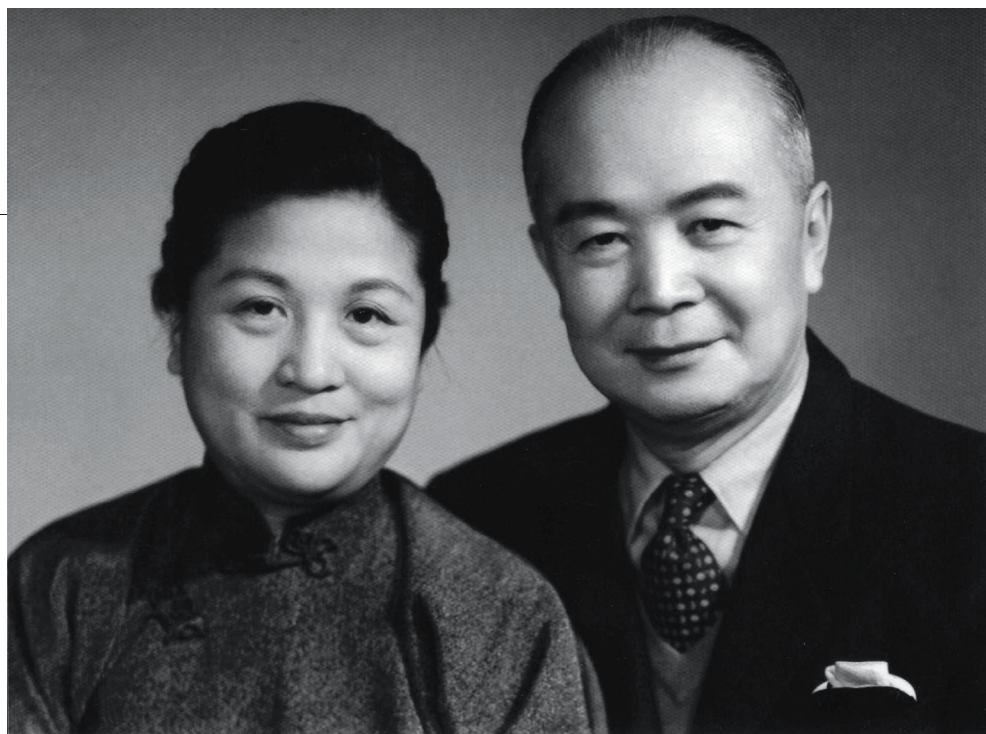
西向客厅的窗台旁，有一张五柜的写字台，成为黄琪翔、郭秀仪两人公用的书桌。窗外，摆着两盆花草，黄琪翔平时就坐在这里读书看报。

年届七旬，黄琪翔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已经很透彻。人性之丑恶，在于愚氓和自私。在某种环境和条件下，人性之恶一旦被激发开来，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人间所有美好的情感都将被残酷撕碎。生逢此时，无处躲避。要么为抗拒潮流做出你自己的牺牲，要么纵身激流为虎作伥，第三条道路在当时的确很难寻觅。郭秀仪说：“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是琪翔做人的一贯准则。”黄琪翔希望能在自己的晚年，平静地度过。

可是，为了住上这套房子，黄琪翔仍然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

张新荣说：“黄琪翔搬家后仍要回到机关参加学习会和批判会，造反派找不出他的其他任何问题，就开始斗争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他是公子哥习气，贪图享受、到处买房、吃喝玩乐，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1965年，黄琪翔夫妇摄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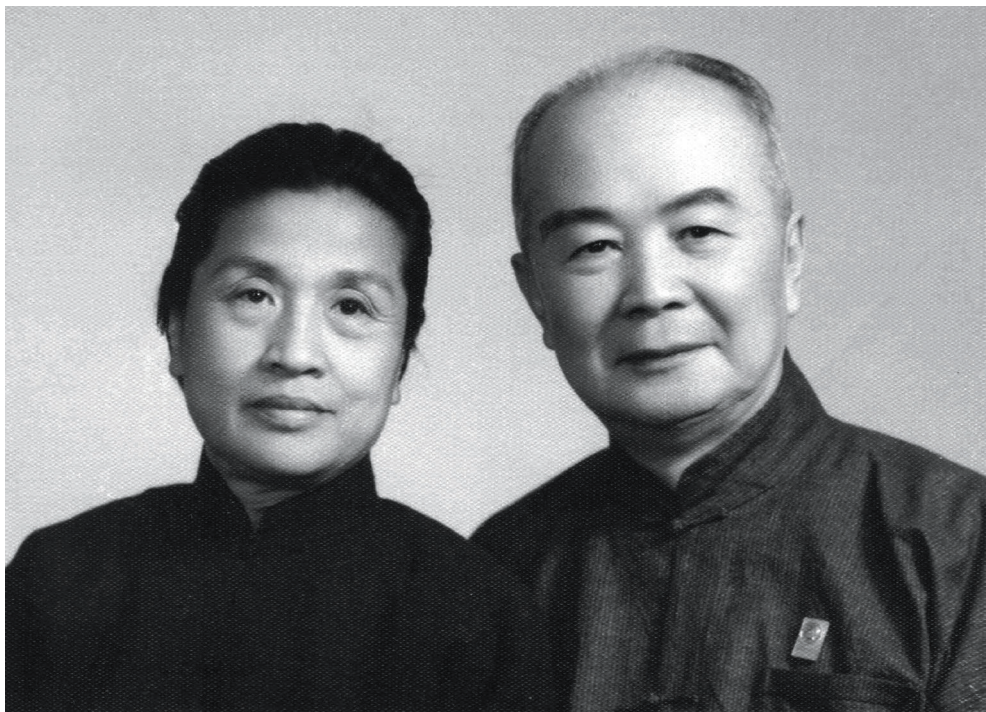
还让他自己批判自己。”¹

黄琪翔的老友李以劭熟悉此间情况，他也回忆说：“一九七〇年五月，周恩来得知此情特予照顾，通知黄老迁往灵通观西大楼居住，‘造反派’们仍不甘心，通知学习组负责人借题发挥，批判黄老贪图享受，是资产阶级复辟先锋。在长期迫害下，黄老身心被害殊甚。”²黄琪翔总是忍气吞声，把愤恨消化在心里，没有告诉自己的任何亲人。实际上，黄琪翔将军在新居里仅仅住了只有半年的时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以为，黄琪翔住进新居后，可以放松心情，缓解精神压力，从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料在当年的冬天，黄琪翔因为一次寻常的感冒而住进了北京医院，

1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2 《传记文学》第74卷第一期，p54。李以劭文章《怀念黄琪翔将军及简述闽变经过》。



1969年冬，黄琪翔夫妇摄于北京。这是黄琪翔夫妇一生中的最后一张合影。对比这两张照片，不难感受到“文革”运动对他们内心的摧残。

一周后病情好转，医生已经通知他出院了。

1970年12月9日下午，他高高兴兴刮了胡子，做好了明天回家的准备，可是到了当天晚上，医院又给他打了一针，黄琪翔感觉非常难受，于是在大喊一声之后，竟然意外地去世了。

黄琪翔将军辞世的时间是1970年12月10日的凌晨，终年72岁。医院诊断为黄琪翔死于心肌梗塞。

医生给黄琪翔打的是什么针？现在已无人知晓，也无法核实，而奇怪的是，与黄琪翔同住在一个病区的另一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先生，与黄琪翔一样，也是在打了一针后，几乎是与黄琪翔同时去世的。陈其尤终年78岁。

黄琪翔的猝然离世，极大地打击了郭秀仪。但郭秀仪内心极坚强，她把丈夫送进冰库“安睡”以后，自己就回到了家里，开始独自料理丈夫的后事。

邻居们闻此噩耗，纷纷前来安慰。郭秀仪强忍着泪水，没有

痛哭。

邻居李觉将军¹是个好心人，见郭秀仪身边缺少帮手，就悄悄给张新荣打电话。当时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话，人们相互间沟通，全靠胡同里的公用电话。

张新荣说：“10日清晨，公用电话的刘大爷跑来叫我去接电话，说是有急事。原来是李觉伯伯打来的。他说‘琪翔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今天凌晨故去了，郭大姐极为悲痛，你快点过来！’”²

张新荣一边流泪一边骑着自行车赶到黄琪翔家，推开门一看，李觉何玫夫妇、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李以勋将军、钟惠澜等都在家里安慰着郭秀仪。

上午11点，郭秀仪写好了一封信，把张新荣拉到一旁，说：“你黄伯伯去世的事，咱一定要报告周总理，你快把这封信送去！”并交代了送信的地点，是中南海附近的一个办公小楼。

1970年的12月，正是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张新荣二话没说，立即穿起大衣，骑着自行车，顶着逆风，把信送到了指定的地方。

才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就派军代表来到家里，告诉郭秀仪说：“黄夫人，总理请您节哀顺变。总理已经指示有关部门：一、黄琪翔先生的骨灰可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二、由全国政协出面，举办先生遗体的告别仪式。”

果然，全国政协主办了黄琪翔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显目位置上，赫然摆放着共和国总理和夫人敬献的花圈。随后，《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黄琪翔先生逝世”的哀讯。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期间，像黄琪翔先生这样

1 李觉将军（1900—1987）是个国民党军队里的传奇人物。192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而黄琪翔也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比李觉大几届，是校友。李觉将军善战，打过许多有名的战役。1949年，李觉任第一兵团副司令，积极奔走在湘系和桂系军阀之间，协同程潜、唐生智、陈明仁等湘籍高级将领一起，举行湖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李觉历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区高参、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李觉夫人何玫，就是何健的大女儿。李觉与何玫结婚时，他已经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干将，而何健又是湖南省主席。何健嫁女，男的骑马，女的坐“生花轿”；另外，男家送了很多聘礼，女家也打发了很多嫁妆，在省城长沙，轰动一时。

2 《流金岁月》，p269。张新荣文章《缅怀往事》。

既被打成右派、又被残酷迫害的民主人士，能够享受到如此的哀荣，的确不容易，也属罕见，显然是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

后来，陈铭德和李觉先生再次来到家里，安慰郭秀仪说：“郭大姐，琪翔兄去了，您别太过悲伤。其实他在私底下对我们说过，如果不是为了你，他早在1966年就不想活了，而在您的安慰和支持下，他才又多活了四年啊！”

陈铭德（1897—1989）是民国报业巨子，抗战胜利后，他成为拥有“五报八刊”的报业系统大老板。陈铭德任总经理，夫人邓季惺（1907—1995）任协理，而现在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是邓季惺之子。

第十章 百年余辉

一、为黄琪翔平反昭雪

在黄琪翔去世的第六个年头，即 1976 年，中国迎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三位杰出领袖同在这一年里辞世：1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898—1976）在北京逝世，享年 78 岁；7 月 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1886—1976）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9 月 9 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1893—1976）在北京逝世，享年 83 岁。而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遭遇世人唾骂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覆灭。

其实，早在 1976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这一天，为悼念全国人民真诚爱戴的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执政，首都人民群众掀起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向毛泽东夫人江青等“四人帮”集团发出怒吼。

583

在毛泽东死去的半个多月之后，10 月 5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逮捕“四人帮”，而“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1915—1991）。10 月 6 日，“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呜呼哀哉。

当“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公布之后，好似晴空一声春雷，



1986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郭秀仪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亲切交谈。右一为赵炜。

使得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欣喜万分，积郁于心的愤懑终于得以畅怀。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

郭秀仪说过：她一生最为艰难的岁月，不是在抗日战争与敌人面对面的战斗时期，也不是二战结束后，她前往废墟一片的德国柏林时期，而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这十年中，她不仅生活落魄，身体被造反派殴打，更在于她的精神承受的折磨，而最大的悲痛是在“文革”中，她失去了亲爱的丈夫黄琪翔。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伴侣黄琪翔，郭秀仪感觉就像失去了生命支柱。

584

1977年5月24日，饱经政治风霜和足具政治智慧的邓小平，与中央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共产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恢复了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

1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观点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华国锋提出的。



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召开，郭秀仪在委员驻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受到儿童们的热烈欢迎。

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黄琪翔遗孀郭秀仪开始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1978年2月24日，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于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04—1997）为全国政协主席。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郭秀仪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随后，1983年郭秀仪继续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并且在以后第七届、第八届继续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郭秀仪是这样解释她政治热情的来源。她说：“我丈夫在1949年回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时就说过，‘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跟着共产党！’我现在是继承他的遗志。”

1980年，鉴于黄琪翔在反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¹郭秀仪给邓小平写信，说明情况，要求党和政府为其丈夫彻底平反昭雪。我们还记得，在1966年黄琪翔不堪造反派的侮辱，准备以死抗争时，郭秀仪坚决反对，并表示，如果你黄琪翔被迫害致死的话，作为妻子她将会像一个战士那样为丈夫鸣冤。郭秀仪给邓小平写信的本身，就是在履行她对丈夫黄琪翔的当年诺言。

邓小平接到郭秀仪的来信，立即作了亲笔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为黄琪翔先生平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下发文件，为黄琪翔先生彻底平反，推翻历史上强加给黄琪翔的一切不实之词。黄琪翔所谓的历史问题得以彻底解决。随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热爱祖国的黄琪翔”文章，重新肯定黄琪翔将军的一生，并礼赞他为祖国为人民所作的贡献。

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郭秀仪非常高兴，在大家准备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时，她交给张新荣一个包袱，里面是100张郭秀仪亲笔画的国画《寿桃》，极具齐白石艺术神采。郭秀仪嘱咐：“要给每位来宾赠送一幅。”这些画作非常珍贵，那是1966年黄琪翔被迫害时，郭秀仪用她那被红卫兵打伤的右手画的。

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琪翔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阎明复的讲话极为重要，因为他是代表了中共中央致辞，也就成为党和政府对黄琪翔一生做出的历史性评价。从史学角度看，这叫作盖棺论定。

阎明复在致辞中说：

1 1959年，虽然中央摘除了黄琪翔的“右派”帽子，但是并不彻底，还是“摘帽右派”分子。

今天，农工民主党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黄琪翔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向黄琪翔先生在海内外的亲属和生前友好表示诚挚的问候！

黄琪翔先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黄琪翔先生的一生，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隆重纪念他，缅怀他对人民事业作出的业绩，对启迪后人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坚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

.....

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的司法、体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黄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人豁达大度、温文尔雅，识大体、顾大局，他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¹

参加纪念黄琪翔诞辰 90 周年纪念大会的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他们也发表了讲话。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1916—1997）在会议上发表了《爱国主义精神流芳百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黄琪翔同志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他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期，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参与过我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

黄琪翔同志献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爱国

1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黄琪翔》，p180。阎明复的讲话《反帝爱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



1988年9月2日，“黄琪翔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588

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¹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朱学范（1905—1996）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孙中山先生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黄琪翔》，p182。

的忠实追随者》的讲话。他说道：

黄琪翔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与我们民革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深受全体民革同志的尊敬……他以实际行动继承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和不断进步的精神，老而弥坚，晚节可风，值得我们学习。¹

习仲勋同志也参加了这次纪念大会。据张新荣回忆，当她将国画《寿桃》交给他时，习老问“这是什么？”张新荣就把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告诉了他。习老连说：“好好！难得难得！”散会后，习老又去跟郭秀仪打招呼，他握着郭秀仪的手，大声说：“郭大姐，您太了不起了。我听说您把自己的房子都捐给了全国政协，要向您致敬！”²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黄琪翔》，p186。

2 张新荣手书《黄琪翔郭秀仪在文革中》。

二、郭秀仪为两岸和平大业奔波

郭秀仪此后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她从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算起，到2003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任期结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的时间长达25年，这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是极罕见的现象。2003年，郭秀仪卸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已是92岁的老人。同时，她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以及其他单位也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1987年，她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第二、三届副主席，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期间，郭秀仪多次奔波海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竭尽自己所能。

1998年3月4日，郭秀仪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小组发言中，汇报了自己在美国所作的统战联谊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听取了郭秀仪讲话后，当场予以赞赏。¹会后，江泽民主席与郭秀仪合影留念。

郭秀仪一生中，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都有过交往。这一次，是她与江泽民主席的

1 《流金岁月》，p59。

第一次接触。

郭秀仪晚年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与台湾的蒋夫人宋美龄见面，想亲口告诉她大陆所发生的巨变，籍以推动两岸和平关系，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的小女儿黄平已经到美国留学并定居，郭秀仪因此能够经常前往美国探亲。而宋美龄此时也已经定居美国。

为谋求与宋美龄相聚，郭秀仪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985年，郭秀仪第一次到美国之际，就非常希望与宋美龄相见。她曾与家在纽约的原国民党将领李汉魂夫人吴菊芳约定，俩人偕伴去拜望蒋夫人宋美龄，却被告知，蒋夫人因患病，不便见客。郭秀仪不气馁，又联系到故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希望能够帮忙传话给宋美龄。恰巧那时候正是“江南事件”发生不久，孔令侃一听说郭秀仪来自祖国大陆，立即说“不方便”，退避三舍。

转眼到了1997年，郭秀仪再次来到美国，欣闻3月20日是蒋夫人的百龄大寿，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她暗自揣测，也许这是一个相见的最佳时机。

为了再见蒋夫人一面，郭秀仪又找到了老朋友的女儿陈素贞女士。

陈素贞的父亲陈劲节将军，是黄琪翔的战友、部下。¹陈素贞女士与宋美龄身边的宋武官相熟，郭秀仪便通过陈素贞请宋武官转交给宋美龄一封问候信，然后开始等待蒋夫人的回音。

事实上，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后，李登辉上台，大搞台独活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美龄处事因此格外谨慎。特别是，郭秀仪当时的确有着政治身份，她是大陆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回话终于等来了。

宋副官说：蒋夫人年事已高，不便见大陆来客。宋武官又通

1 陈劲节将军为广东顺德人，曾在北伐军第四军任职，黄琪翔于1927年任第四军军长。陈劲节在叶挺部担任军需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劲节曾任国民党江南兵站统监部的统监，中将军衔。1942年陈劲节任中国远征军的后勤部副部长。

知说，如有寿礼，可在3月18日上午送到宋副官的办公室。

郭秀仪委托陈素贞女士扎了一百朵红玫瑰的花篮，赠送给宋美龄，同时，她知道曾经是国民党“外交部长”沈昌焕也来到纽约，为宋美龄祝寿。郭秀仪就给沈昌焕写了封问候信。过去，沈昌焕曾在中国远征军工作过，与黄琪翔很熟。

她很希望能够与宋美龄再见一面。大家可以不谈政治，只是叙叙旧，或者谈谈她们共同喜爱的书画艺术。因为她俩已经数十年没见面了，而且已都到了风烛残年的岁数，今日不知明日事。

事隔不久，宋美龄赠给郭秀仪一本画册《蒋夫人》，由陈素贞转交。

郭秀仪问：“蒋夫人带话了吗？”

陈素贞女士摇了摇头。

晚上，郭秀仪仔细翻看画册《蒋夫人》。画册里刊登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宋美龄历年所画的国画作品；二是宋美龄参加妇女运动的历史照片。

郭秀仪忽然记起，在写给宋美龄的问候信中，曾谈到自己在1951年开始跟随齐白石学习国画的事，也回忆起1938年在宋美龄领导下从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这当然也属于妇女运动历史的一部分。不久后，郭秀仪带上宋美龄赠送的那本《蒋夫人》画册，独自回到北京。那本画册成为她与宋美龄友情的见证。郭秀仪将它珍藏在一个牛皮纸信封内，在信封上端端正正用毛笔写了“蒋夫人百年嵩庆”几个大字。¹

郭秀仪至此确信：此生无缘再见蒋夫人了。2003年10月24日5时17分，宋美龄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

1 2003年7月11日，郭秀仪将这本《蒋夫人》画册转赠给了本书作者，并在扉页上写道：“赠孙炜小孙子留存”。

三、郭秀仪的晚年

1987年12月24日，“黄琪翔将军纪念馆”在将军的家乡广东梅县梅江中学举行落成剪彩仪式。郭秀仪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章师明，以及黄琪翔的堂妹黄甘英等人应邀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这一盛事。

这次梅县之行，对于郭秀仪而言五味杂陈。时在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黄琪翔携夫人郭秀仪回到梅县，那时他们的新家“仪园”刚刚落成。从此之后的42年时间里，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过，如今物是人非。当初是夫妻结伴而来，眼下她已孑然一身；“仪园”依旧在，已成了废墟一座。不过，晚年的郭秀仪依旧保持着乐观开朗的个性，这次重返梅县，她表现得热情洋溢。

郭秀仪对家乡人民说：“如果说黄琪翔的一生中做过有益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家乡父老们对他的培育。”¹怀着这种感恩之情，郭秀仪给“黄琪翔将军纪念馆”捐赠了一批展品，其中包括黄琪翔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遗物、墨迹、书籍以及海外华侨赠送的纪念品等。她还和来宾们一起在纪念馆门前栽下两棵青翠的柏树。

1 《流金岁月》p45。



2003年5月2日，郭秀仪93岁生日，自己动手切生日蛋糕。

594

郭秀仪在地方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黄琪翔将军家乡水车镇的许多地方，对家乡的变化赞不绝口。借此机会，郭秀仪还专程去梅县雁洋镇雁上村，参观叶剑英元帅的故居，敬献了花篮，以示不忘旧情。

1994年11月，王大鲁、刘清云著《黄琪翔传》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95年9月，郭秀仪应邀参加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全体观众起立，向100位抗日老战士致敬。在这些抗日英雄中，郭秀仪是仅有的三位女战士之一，也是唯一获得过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勋章”的女士。

2004年11月，郭秀仪因患肾衰竭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郭秀仪乐观开朗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人。她住的是高干单间，每天见到的人是医生、护士和两个请来的护工，以及她的家人。她经常与众人开玩笑，一起唱歌。大家打心底里喜爱这位可亲可敬的慈祥老人。

2005年，郭秀仪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她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高兴地戴着纪念章拍照留念。她兴奋地回忆起抗日战争的那些峥嵘岁月，并回忆起国家和人民给予她的荣誉。

郭秀仪晚年最开心的事，是她在抗日战争中救助的难童们时常来看望她，亲热地叫她“郭妈妈”。她常骄傲地说：我有3万多位子女（她参与领导的儿童保育会在抗战中救助过3万多难童），现在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

2006年11月16日凌晨1时，郭秀仪女士以96岁高龄在北京辞世。

200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载：郭秀仪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是著名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黄琪翔先生的夫人。”这是党和国家对郭秀仪女士一生的高度总结，也是客观的历史评价，包含了后人对她的景仰之情。

四、百年余辉

1998年8月3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黄琪翔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名誉主席卢嘉锡等参加了座谈会。

2007年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后人成立“翔仪基金会”。同年，基金会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郭秀仪画册》，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郭秀仪画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等参加了画展开幕式。

2008年适逢黄琪翔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保定军校纪念馆马永祥馆长提议与“翔仪基金会”合作，在军校纪念馆院内特辟一室作为“黄琪翔将军纪念室”，5月该纪念室落成，展出由其家属捐赠的近百件图片、实物、雕塑、书法字幅等史料。揭幕那天，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何维为展览揭幕并致辞。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琪翔的堂妹黄甘英女士专程赶赴保定参观展览。黄琪翔的后人也从香港专程赶来。据悉，该展览在保定军校纪念馆内作永久展出。

9月2日，由“翔仪基金会”捐助的新教学大楼，以及“黄琪翔、郭秀仪纪念馆”在梅州市梅县水车镇梅江中学内落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为新教学楼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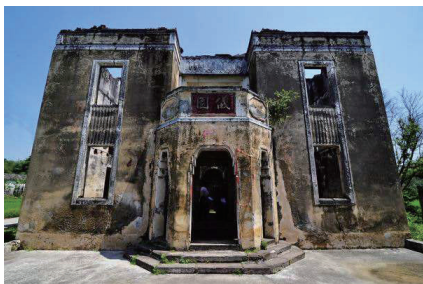
名“黄琪翔、郭秀仪纪念大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鲁丽为黄琪翔、郭秀仪纪念馆题名“翔仪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王宁生，黄琪翔将军的堂妹黄甘英及梅州市领导共同为新建的教学大楼、纪念馆“翔仪堂”落成剪彩。从海外及国内赶来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亲属、黄琪翔在梅县的亲友一同参加剪彩仪式并参观纪念馆。下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梅州市举行纪念黄琪翔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陈宗兴、黄甘英、黄向明等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共同缅怀黄琪翔先生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

2010年，梅州市将黄琪翔、郭秀仪纪念馆“翔仪堂”公布为梅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月，由翔仪基金会支持，孙炜著《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10年至2011年，翔仪基金会两度联手保利拍卖公司在北京新保利大厦举办“郭秀仪画展”、“流金岁月——黄琪翔、郭秀仪影像展”、“黄琪翔、郭秀仪收藏展”等活动。

2014年6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准黄琪翔故居“仪园”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地。同年10月20日，由翔仪基金会出资，岭南著名雕塑家廖慧兰女士创作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大型石雕像在“仪园”广场落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陈竺为雕像题词“流金岁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致辞，并与梅州市有关领导、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会、梅州市委会领导马光瑜、邹浩元等及黄琪翔、郭秀仪家属代表共同为雕塑揭幕，并参观“翔



黄琪翔郭秀仪故居“仪园”的原貌。



“仪园”广场前矗立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雕像。

仪堂”。刘晓峰副主席为纪念馆广场上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雕像题词“风范长存”。

2015年12月10日，黄琪翔、郭秀仪故居“仪园”被广东省公布为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8月24日梅州市人民政府立牌。

.....

如今，黄琪翔、郭秀仪故居“仪园”已经成为梅州市一处著名景点。各地来此瞻仰、参观和游览的人数逐年在攀升。

人们自发地来到“仪园”，可以在“仪园”的残垣断壁、黄琪翔郭秀仪雕像、“仪园碑”等纪念物前拍照留念，徘徊流连，更重要的是，人们得以缅怀黄琪翔夫妇坎坷、辉煌的一生，感念其爱国为民的伟大情怀。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精神不朽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这种爱国为民的伟大思想和矢志不渝的一生追求！

后 记

今年是先严黄琪翔将军诞辰 120 周年。作为纪念他的重要活动之一，我们重新编撰并出版了这部《北伐名将、抗日功臣——黄琪翔将军传》。

第一部《黄琪翔传》于 1994 年问世，2008 年再版。这部 12 万字的传记对父亲献身革命的一生仅只作了简要的叙述。而且作为久远的历史人物，“黄琪翔”之名现已鲜为人知，故此难以引起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关注与重视。

新版的“传记”则增添了大量重要史料及珍贵图片，全书洋洋 40 万言、照片、图表 100 余帧，而且画龙点睛，冠以“北伐名将、抗日功臣”之题名。如此方可较为全面、详尽而且一目了然地突出父亲作为一位卓越的革命者，为祖国的兴盛和人民的福祉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终身的壮丽人生。

父亲刚从保定军校毕业，就在孙中山先生伟大革命思想的感召与鼓励下，毅然决然投身正义战争。北伐时期，他任第四军 36 团团团长，与独立团团长叶挺并肩战斗，下醴陵，克平江，智夺汀泗桥，直取武昌。战绩辉煌，勋劳卓著。不久，年仅 29 岁的父亲就升任闻名全国的北伐军第四军（铁军）军长（叶剑英时任参

谋长)。

他是当之无愧的“北伐名将”。

抗战八年，他从未离开过枪林弹雨的前线，一直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参与并指挥了“淞沪抗战”、“襄东阻击战役”、“宜(昌)枣(阳)会战”等重大战役。歼敌无数，屡建奇勋。1943年，中国远征军建立。卫立煌与父亲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长官统帅滇西远征军。在盟军的配合下，经过长达六个月的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滇西缅北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先发制人、敲山震虎，一举歼灭五万日寇精锐部队的大决战，在抗日战争中，史无前例、绝无仅有。(蜚声中外的“平型关战役”消灭日寇一千余人，林彪将军因此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当代名将。举国欢庆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一万二千余人。)

是次战役全体将士的丰功伟绩，在抗日战争史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而父亲也显示出他威武虎将手擎国旗，足踏倭寇，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浩然正气!

他是实至名归的“抗战功臣”。

本文仅对传记新定的“书名”作出简扼的诠释。至于父亲在北伐与抗战的各个战役和战斗中如何运筹帷幄，英勇歼敌的详情以及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传记”都有详尽的描摹，本文不复赘述。

父亲的一生是追求革命与进步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不懈奋进的一生。他为人刚正不阿、襟怀坦荡、乐善好施、古道热肠，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传记”忠实记载了父亲的革命人生，秉笔直书，自出机杼，使读者真实而形象地看到一个革命者英勇奋斗的艰苦历程，从而更加激励人们振兴中华的崇高热情，从而矢志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国富民强、光耀全球的东方明珠。

父亲的忠贞、勇武、谋略与刚强，他的高洁、磊落、宽厚与豪爽，他的豁达、谦逊、诚恳与善良使他由一个平凡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不平凡的一代英杰、国之栋梁。

这种不平凡源于他对真理，对正义的执着追求；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正是这种“追求”与“热爱”使他视死如归，永不言败。

父亲谆谆教导我们：“‘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它属于中华民族的亿万民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全在于此！”言犹在耳，刻骨铭心。

这不朽的格言将永远鞭策着他的子孙后代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励精图治，奋勇前进！

这部《传记》能够以翔实而丰富的内容问世，我们的外甥于峰居功至伟。为了查找有关先严的生平事迹，十年来他不辞劳苦，辛勤奔波于中、港、台三地近百余次，搜集了大量的报刊、杂志、文件、信函、图片等各种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机密档案乃至罕见孤本整整三大箱，为《传记》得以顺利与圆满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诚挚地向所有为本书的编辑与出版作出过贡献的前辈、朋友以及有关人士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特此鸣谢：

(1) 驾鹤西游的尊长：陈卓凡先生、杨逸棠先生、王大鲁先生、黄景香先生

(2)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农工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先生为本书作序

(3) 农工中央：游宏炳先生、姜天麟先生、张意愿先生

(4)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王晓华先生、林宇梅女士

(5) 重庆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厉华先生、林勇先生、王石庆先生

(6) 香港：丘浩章先生、晏欢先生

(7) 台湾：中央通讯社温鸿恩先生、台北文化局曾德宜先生、台北时英出版社刘松福先生以及陈东明先生

(8) 大连：马睿古旧书局马睿先生

(9) 北京：张新荣女士、卫智先生、余戈先生

(10) 协助本书作者孙炜先生排版、编辑工作的：付裕女士、
刘践先生

黄琪翔之子

黄向明

2018.6.15

北伐名将 抗日功臣

黄琪翔将军传

编辑出版

作 者 孙炜

封面设计 文刀

制版印刷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5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7.75

印 数